

感懷集

葉明勳
著



感懷集

葉明勳
著



目錄

1. 封面
2. 目錄
3. 感懷集
4. 感懷集 新聞篇
5. 吾道力行方有功
6. 任內最難忘的一件事
7. 不滅的燈
8. 三種力量的凝聚
9. 元首與記者
10. 新聞界當代奇兵
11. 中央社台北分社溯往
12. 保持光榮的歷史
13. 感懷集 紀念篇
14. 不容青史盡成灰
15. 後世忠邪自有評
16. 聞道長安似弈棋
17. 誰知明月照溝渠
18. 初履斯土
19. 多少蓬萊舊事

20. 爲有源頭活水來
21. 慈湖似應立碑
22. 感懷集 懷人篇
23. 雍雍大老林柏壽
24. 謙虛其心，宏大其量
25. 新聞界泰斗陳博生
26. 報壇尊爲南潘的潘公弼
27. 魏景蒙的真性情
28. 世新傳播學院創辦人成舍我
29. 一代奇才葉公超
30. 楊亮功忠言空許
31. 連震東三兩事
32. 吳三連的風格
33. 辜偉甫與榮星花園
34. 陳錫恩與東海大學
35. 嚴靜波先生以誠待人
36. 嚴靜波先生的另一貢獻
37. 天地能知許國心
38. 感懷集 雜感篇
39. 驚濤歷盡看台灣
40. 吾國與吾黨
41. 老人與寶島
42. 十字街口

43. 思前賢，看今朝
44. 卓越、遠見、天下
45. 遐思
46. 談大老與大器
47. 容量與民主
48. 思往事，論千秋
49. 宴客的藝術
50. 台北缺少了什麼
51. 講話的藝術
52. 也談「除三害」
53. 爲「勤儉」招魂
54. 「青年才俊」與「專家學者」
55. 傲骨與傲氣
56. 選戰三忌一願
57. 數點梅花天地心
58. 夏威夷重遊有感
59. 一樣膚色兩樣情
60. 豬年私願
61. 選災
62. 附錄

引言

今年是我到台灣的五十周年，這段漫長多難的歲月，驀然回首，如滄海橫流似的在我的腦海中翻騰著。

從台灣光復至大陸變色，政府遷台，繼以勵精圖治，經濟起飛，以迄目前社會繁榮，百業相競，轉型為多元化的民主開放時代。多少憂患，多少悲歡，數不盡的人間變數，對我無不是身歷其境，盡收眼底。人在斯土，心在斯土，那些發於風雨同舟、休戚相關的感觸，先後便留下了不少具有紀念性的文字。其中有出自肺腑的感懷之言，思舊傷逝之作，亦有應邀貢其一得之愚，或激於良知，對現實對世俗提出一些芻蕘之見，就教於有識之士。

過去我曾將那些舊作彙編成《憶事懷人》、《真意集》兩種付梓，後來又陸續地寫了若干篇，談不上有什麼價值。現在重加整理，合印命名為《感懷集》，所謂修辭以立其誠，其意即在珍視自己對所感所懷都具有至誠之心。陸放翁有兩句詩：「書生事業無多許，二寸毛錐老未休」，大概就是如今取以自我解嘲的心情罷。

葉明勳自識

八十四年新歲

感懷集 新聞篇

吾道力行方有功

——九一記者節五十周年感懷

我廁身於新聞界從服務中央社開始來算，轉眼已經五十年，而九一記者節的誕生至今轉眼也到了五十周年。所以，逢此佳節，撫今追昔，自己雖屬老兵之列，未免感懷特多。

五十年來，台灣新聞機構，與我最具歷史淵源的，一是中央社，一是新生報。中央社已故首任社長蕭三爺（同茲先生），對我的一生是最具有影響力的長者，他的光明磊落風範，與恢宏謙沖氣度，無不足以令人見賢思齊。過去胡適之先生於中央社在台慶祝創立三十周年紀念茶會上，便曾蒞會說過：「如果要我以政府當局的立場頒發最大的勳章，我會發給蕭同茲先生。」其推崇至此，我們可知蕭三爺對新聞事業的貢獻與建樹。中央社因有蕭三爺的領導，視部屬如子弟，推心置腹，關護備至，彼此之間便瀰漫著極為濃厚的人情味。當年很多有為的青年，大學新聞系畢業後，踏入社會的第一道門，多數就是中央社，而後歷練成為成功人物者，不乏其人。無論時間長短，他們談到中央社仍然未能忘情，對蕭三爺仍然存有服膺領導的至情。此中因素，實由三爺崇高的風格與大公的精神，有以致之。所以，我離開中央社雖已超過了四十年漫長的歲月，但中央社的傳統精神，仍然環繞著我，中央社很多的好友，我與他們那條互通訊息的線始終維繫著，或以傾心之談，或以盃酒之歡，彼此

彷彿還是同在一條船的人。一旦中央社有事，自然也特別投入了風雨同舟的情誼。

至於新生報，它的前身就是日據時代總督府所辦的台灣唯一的日文大報——台灣新報，台灣光復後，始由政府接管，派台灣省已故首任副議長李萬居先生為社長，也成為唯一的省營大報。當時台灣人口不到六百萬，該報的發行人數則為十八萬份。萬居先生長我十多歲，我們與前國大代表林忠三人，都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由陪都重慶首批同機來台接管新聞機構的人員。萬居先生接管台灣新報（即新生報前身），林忠接管台灣廣播電台（即中廣前身），而我是接管日本同盟通訊社台灣支社，後來即改隸為中央通訊社台北分社。新生報雖具有雄厚的人力，財產資源，但光復後改為中文版，中文的人手一時便有捉襟見肘，不足應付的感覺。所以，創刊號問世後，與我們同機來台的大公報李純青、費彝民，掃蕩報謝爽秋，中央日報楊政和等新聞界碩彥，包括自己在內，都成為新生報撰寫社論的臨時工。新生報董事會成立後，我忝為董事之一，至今四十多年仍然保持這種長達將近半世紀的關係，目前新聞機構中是很少見的。

但是，最近半年，已負盛譽的中央社與新生報，卻因報導的內容與標題的遣詞，不為我們的民意代表所認可，兩位社長竟被迫登門道歉與在議會上被謾罵，以求息事寧人，為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了充滿傷痕的一頁。這個問題的癥結，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這個多元化的社會，太重視民意代表的權勢，一切以民代掛帥。他們可以不負言責，咄咄逼人，大放厥詞。而記者倘使筆下偶有不慎，觸其逆鱗，便不得不默默的俯首認

罪，備受言詞鞭笞之苦。這是歐美各民主先進國家所未見，而在台灣的民主殿堂，卻是司空見慣，能不令人感慨係之，新聞自由云乎哉？

像這種對新聞界構成傷害的事件，竟發生於兩位資深而學養俱豐的社長身上，實非意料所及。當時新生報的標題只含有指責的字樣，但社長卻被迫到省議會的大堂，如受審問似的遭到某些民意代表的肆意羞辱，潑水謾罵，幾至無地自容。究其原因，無非報社的經費預算，議員們握有否決扼殺的大權，為顧全大局，不得不吞聲受辱。至於中央社往日雖有光榮的歷史，但時至今日，改制問題輾轉稽延，非迅謀解決不可，關鍵也在某些中央民代的一關。若干民代因對中央社所發佈的某則新聞不滿，社長為顧全大局，便不得不率同一干主管登門道歉，其所祈求者，無非只望改制問題不為衋衋諸公所阻撓而已。

過去記者之所以為人敬重，尊為無冕之王，乃是由於記者的言論與報導，對社會具有教育功能，端正風氣的貢獻。於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們便奉為記者應有的典範，記者亦以此自重自律。但在今日，社會的價值觀念改變，各界給予記者的定位在那裏？記者的處境，有時真是難以想像。記者於正義真理的大纛之下能否堅持原則，堅守立場，不遷就於現實被迫的情勢，已非記者憑一己的情操所能決定。陶淵明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千古傳為佳話，但他所代表的只是個人的意願，記者所代表的卻不是個人，而是整體的新聞事業的精神。所以，我們殷切的期待我們這個進步的社會，從廟堂之上以至里巷之間，尤其是民主殿堂中的衋衋諸公，對記者同仁們給予應有的尊重，這是像人權在民主國家一樣的應該受到尊重。新聞事業的可貴

在那裏，記者的定位在那裏，我們都不容一味無知的予以否定。尊重記者，了解記者，多接近，多溝通，在我們這個民主社會，無論對政府、對大眾、對民意代表，都是有益而無損。記得陸放翁自規詩有「此心少忍便無事，吾道力行方有功」的詩句，無異是今年記者節我們心情的寫照，吾道力行方有功，怎樣的力行，怎樣的貫徹新聞自由的精神，這是我們自我提升應有的期許與省思。

(原載八十一年九月一日中國時報)

新生報與我

在台灣發行的各報中以新生報的歷史為最久，而我與新生報的交誼也是歷史最久的一人。追溯三十四年創刊之日開始，我即參加董事會，至今瞬已四十年，仍為董事會一份子，四十年的董事歷史，求之當世，恐亦不可多見。

新生報的前身，是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出資所辦的《台灣新報》，擁有十八萬份的發行量，而且是一份唯我獨尊的官方日報，物質條件自然比較充裕。台灣光復，規定自屬於當時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所接管，也就是後來改組為省政府的新聞處。我是三十四年十月五日首批偕同政府人員到達台灣的，當時的身分是中央社特派員，同行的新聞界人士，計有陪都重慶中央日報楊政和、上海大公報費彝民、重慶大公報

李純青、掃蕩報謝爽秋，與準備接管廣播電台的林忠諸氏，以及後來出任新生報首任社長的李萬居先生。台灣受降典禮既定於十月二十五日舉行，接管台灣新報的新生報（報刊爲于右任先生所題，以示新生之意），自然必須同日發行創刊。以匆匆半個多月的時間，一份完全採用日文的日報，要以嶄新的面目，更新爲中文日報，與台灣同胞相見，這是何等倉促艱難的事。於是上述的新聞界人士，從社論到撰稿，無不義不容辭的爲新生報而出力，當時爲顧慮台灣同胞閱讀中文報紙，尙難普遍的適應，權宜之計，不得不暫時附刊部分的日文版。我的職責，不但急需儘速的將台灣光復最新的消息向全國報導，而且還須接管日文同盟通訊社的業務，建立中央社台北分社，發行新聞稿，同樣的也須採用中文、日文兩種不同的稿件，人手設備，都在極端的欠缺下進行著。而這些新聞稿，提供的對象，便是以新生報爲主，新生報也以此視爲新聞的主要稿源。所以，彼此合作往還，無日無之，新生報與我，幾乎視爲一體，形成了骨肉相連的情緣。

當時長官公署當局的構想，台灣只需一份代表政府溝通民意的新生報便已足夠，不希望另有外來的報紙發行。此事後經黨中央陳立夫、許孝炎先生熱心的奔走，當局終於不再堅持。於是，三十五年乃有中華日報在台南創刊，但是，中華日報的先天條件，遠不及新生報，辦報缺乏財力物力爲其後盾，難免如無米之炊。新生報於此時卻能伸出援助之手，將台南的房舍、印報設備，撥交中華日報使用。社長李萬居兄當時能從大處著眼的見識與精神，不但如今身在異邦的中華日報首任社長盧冠群兄仍在感念，就是我這個第三任的社長，也未能忘懷他的支持。天道無常，斯人不可復見，思之黯然。

大陸淪陷的前後，台灣形勢險急，人心憂惶，而此時昔日多少的風雲人物與龐大的機構都紛紛的渡海而來此。各報中如具有全國性的、代表性的中央日報，以及異軍突起的民族報、全民日報等都相繼的在台與讀者見面。新生報由日文轉型為中文僅止數年的日報，它的發展，顯然受到了外力的衝擊。而讀者則又多以好奇喜新的心態去欣賞各報，於是新生報在潛意識中無疑的如失去平衡，憑添了一份失落感。雖然，這是短暫的，這是如過眼雲煙，瞬息即逝的，但亦足以顯示辦報的艱辛是經歷了各種不同的歷程。事實上，新生報純然是屬於省營的日報，應該有它特殊的立場與風格。標新立異，爭奇鬪豔，以博取讀者的喝采，都不是新生報所欲為，也不是新生報所應為。可是人類的情感，往往最容易接受環境風氣的干擾與影響，有時真會茫然的淡忘了自己所走的方向。就像欣賞一場精彩而劇烈的球賽，置身其間，很難永遠的保持著超然的冷靜態度是一樣的。新生報與我，具有四十年的情誼。所以，我的關懷因亦最切。

如今，新生報經歷任社長與同仁們的努力，如經過風雨洗禮後的晴空，萬里無雲，碧澄悅目。立論的正確，報導的翔實，取材的宏富，編排的精巧，無不燦然可觀，獨具風格，日新又新，而且已確定了自己所應走的方向。台灣新聞報，原為新生報南部的分版，如今也已獨樹一幟，斐然有成，為台灣南部讀者提供了不負眾望的服務。惟有耕耘，始有收穫，信非虛語。

回首四十年的歲月，多難的國家真不知遭遇了多少次的變故，但是，台灣由動亂而安定，由安定而繁榮，終於成為舉世矚目的亞洲燈塔。新生

報對於社會自有其不容抹煞的貢獻。而且爲國家扶植養成了不少的傑出人才；他們有的至今仍堅守著自己的崗位，有的雖已易地而奉獻，但仍以新聞事業爲其終身職志，有的新聞崗位雖爲其起點，卻已發展到另一領域，放其異彩，都是歷歷可數，有目共睹的事實。我以四十年的老友，謹在此爲新生報的發展致以至誠的祝福。

(原載七十四年九月四日新生報)

任內最難忘的一件事

我擔任中華日報第三任社長的時間，是在民國四十年七月一日以迄四十四年七月一日，歷時共四年。

當我到任之初，還是像筆路藍縷的時代，員工們欠薪達三個月之久，急待補發，第一天晚上到中山北路編輯部小坐，褲子也被那條冒出彈簧的舊椅子戳破了。

如說任內最難忘的事，就是到任前承先總裁 蔣公的召見。這不是以榮寵自炫，而是與中華日報後來發展的方向是有關的，而且顯示 蔣公絕不是堅持己見，不易接納下情的。因為中華日報創刊後，北版經營的狀況，始終虧損，南版則蒸蒸日上，當時的問題很多，而且台北已有中央、新生等大報，佔盡風光。 蔣公認為如在台北再有一份黨報，不易為人重視，不如放棄北版，改為重點發展，將台南的中華日報南版易名為《農民日報》。但是，當時我卻提出相反的意見，因為改弦易轍，勢將成為地方性的報紙，而且業務編採各方面都有實際的困難。 蔣公便同意我的意見，要我試辦看看。這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真相外人並不是很清楚的。

另有幾項興革，也與中華日報後來的發展有關，這裏並須附筆一提：

（一）社論、副刊在南北兩版統一刊出，摶節開支，社論曾請名家楊幼炯、潘公弼、黃雪邨先生等主持。

(二) 增闢體育、娛樂兩版，副刊側重專欄的連載，以期風格上求其突破。如陳定山先生的〈春申舊聞〉等都先後刊出。

(三) 統一人事財務管理，南北兩版人才交流調用，財務則作統一分配。

(原載七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中華日報)

不滅的燈

兩年前，中華日報創刊四十周年時，我曾寫了〈任內最難忘的一件事〉一篇短文。

那篇短文中提到我在民國四十年夏接任第三任社長以前，先總裁 蔣公曾予召見。當時中華日報的處境，北版的經營，虧損累累，而南版的業務則蒸蒸日上。 蔣公認為如在台北再辦這份報，不易為人重視，不如放棄北版，改為重點發展，將南版易名為《農民日報》。我基於中華日報發展的立場，便提出了相反的意見，如果改弦易轍，勢將成為地方性的報紙。 蔣公欣然同意我的建議，要我去試辦看看。這是未為外人所知而塵封已久的往事，從這件事上，顯示 蔣公並不是堅持己見，不易採納下情的人。而在三十七年後的今日，中華日報果然不謀而合的實踐了 蔣公的昭示，回復到他老人家所指點的道路。追懷他老人家的洞燭機先，冥冥之中，如有一盞永遠不滅的燈在我們的心上照耀著、指引著。

另有一件事，也與中華日報的發展是有關的，就是三十七年以前的今日，組織上曾有一道分水嶺，前此設有副社長，董事會與社長副社長如在集體領導，雖可收集思廣益之效，但有時未免事權難臻統一，步調難趨一致。於是，當連震東先生任董事長時，便不再設副社長，董事會責成社長全權負責。中華日報以後的發展，就是從這條路上邁步而往，由筆路藍縷以至新建大樓，規模大備。光明的前途，也像有一盞不滅的燈

永遠在照耀著、指引著。

(原載七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華日報)

三種力量的凝聚

——中國時報創刊四十周年有感

我以忝列爲新聞界前哨的老兵，到台灣已經有四十六年之久，四十六年來，國家由風雨飄搖中而趨於安定繁榮，社會由寧靜的農業轉型而爲尖銳的工商業快速的發展，一切都在急遽地躍升著、蛻變著。以新聞界來說，由台灣光復的初期，而至政府遷台，民間報業的崛起，由限制發行，而至報禁開放，順應時代的潮流，乃有今日羣雄並起，百家雜陳的盛況，自然這是很可喜的現象。

因爲社會一切的建設或成長，惟有競爭始有進步，惟有邁向進步始可臻於精益求精、至善至美的境界。這是文明進步永恆不變的法則，也是我們共同所期待的嶄新風貌。

但是，報業有異於別的行業，它有光華絢爛的一面，也有艱辛苦澀的一面。它不可以一日鬆弛，也不可以片時疏忽，隨時都需要如拉緊著弦的弓，弓上的箭，不可以亂發，不可以不發，一點都不容有半點的差錯。所以，已故報業先進潘公弼先生，曾調侃的說，報紙成功的歷史只有一天，可謂一語中鵠。就是說這一天中如果不奮發圖強，做好一切的準備——包括言論報導發行等方面，這份報紙自然不爲讀者所支持，也無法與讀者繼續相見了。

中國時報創刊至今欣值四十周年紀念，如以一天的歷史來計算，就是累積一萬四千六百多天的歷史，這是一份極為成功、極為可貴的紀錄。創辦人余紀忠先生，與我交誼逾四十年，他對這份報紙所秉持的執著精神，與所花費的艱澀心血，我認為至少具備了三種力量，他的成功，就是這三種力量的凝聚。三種力量，一是魄力、一是毅力、一是定力。魄力、就是顯示具有前瞻性而不為人所見的遠識，與人所不能而能為之的不畏困難的精神，而且胸懷寬廣，用人惟賢，廣攬有識有學之士，以獨特的風格，別出心裁的出現於讀者的面前。否則，如無以取勝，便不易為廣大的讀者羣所注目，也不易獲得讀者們普遍的掌聲了。至於毅力，乃是任何事業不可缺少的成功因素，無視艱難，無視阻礙，鍥而不捨的持之以恆的努力。中國時報從創刊到無遠弗屆的廣設發行網，它的歷程，過去便曾有一段崎嶇而漫長的任重道遠的道路，如果無此毅力，不能以一貫之，絕沒有後來如登泰山石級愈走愈高的境界。目前中國時報所追求的方向，是致力於導向讀者接受開明理性的政治理念，目標顯明，屹立不易，而其本質內涵則為提倡民主自由，冀以共同促進台灣的建設發展，成為時代前端而為大眾所必需的喉舌。實現這種理想，就是需要定力，始能拓展抱負，同心同德，實踐力行，充滿自信的為勾勒其所設計的鴻圖大展而竭其才智。

我是中國時報忠實的讀者，天天見面，這份情誼，也持續了四十年的歲月而延綿不絕。它的成功，無不是翹首以待的樂觀其成的。

（原載七十九年十月一日中國時報）

元首與記者

記者被尊為「無冕之王」，這種榮譽，時至今日，我們能否受之有愧，這是很值得檢討的嚴肅問題。老報人成舍我過去曾以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視為標準報人的風格。而今有些記者竟被人諺稱為製造業、相命業、屠宰業，然乎否耶，我們需要自省、自律。

這裏，使我想到了昔日兩位國家元首對記者的重視，一位是先總統 蔣公對大公報張季鸞，一位是美國故總統羅斯福對中央社任玲遜。這些往事對新生一代的記者來說，應該知所見賢思齊。

大公報戰前是以言論公正聞名於全國，即由張季鸞主持筆政，重要社論，多出於張氏之手。他以憂時憂國的超然立場，與真摯的文字，發為正義之聲，成為當時輿論重鎮。西安事變時，該報曾以張氏所撰社論大量空投西安，力斥其非。謀國之忠，以迄抗戰，未改立場（大陸變色後，面目已非）。抗戰時，蔣委員長對張氏甚為禮遇，常邀張氏單獨共餐，暢談國事，因深知政府的立場與動向，為文遂能深入而恰如其分。張氏作古後，蔣公視察西北時，曾往其墓園憑弔，新聞界之受元首如此重視，殆無第二人。然張氏生前從不談委員長對我如何如何，仍然保持著布衣傲王侯的清高風格。

任玲遜為中央社華盛頓特派員，抗戰時，因在白宮行走，常與羅斯福總

統共進早餐，綜談天下大勢。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我國訪英團（包括王世杰、王雲五、胡政之、杭立武等）於訪英謁邱吉爾首相後，曾轉道赴美訪羅斯福，羅與胡政之（大公報負責人）慷慨其言：「中國記者任玲遜在美所做之事，對你們國家的貢獻，可能勝過三位大使。」一時傳為佳話，而任則從未以此自炫。

任玲遜因與羅斯福常接近，所獲有關戰事的資訊，很多以密電提供參考，由中央社總社轉呈最高當局（能見此者僅限黨政高層人士）。這種電訊，常為我駐美使館送回資料中所未見，有之亦在半個月到達。但任亦從未以此居功，或自稱其能。這種風格，令人可敬可佩。

以上所說的啓示是：記者之受尊重，需要政府方面經常與之接近、瞭解，否則只有增加隔閡，對政府有損無益。而記者欲以提升層次自許，本身尤須先加充實與檢討。

（原載八十一年八月十七日自立晚報）

新聞界當代奇兵

——有感於惕老引退

王惕吾先生與我雖有同庚之雅，但習慣以「惕老」稱之。我們訂交至今將近半世紀，相識之初，我是中央社台北分社負責人，而他則從兵荒馬亂，大陸瀕臨淪陷之際，浮海來台創辦民族報。當時彼此都有一份憂心國事的沉重心情，如說始於患難之交，也未嘗不可。如今台灣危而後安，經濟繁榮，舉世矚目。我雖一事無成兩鬢斑，而惕老則已儼然成為中外聞名的報壇巨擘，回首前塵，我在懷舊的情緒中對惕老的成就充滿著欽佩之忱。

惕老在今年九月宣布交棒引退時，我適在北京，返台後得悉此訊，十分關懷，想想惕老四十多年致力新聞事業，對報業所作的貢獻，豈能不置一詞。於是特就己懷，撰此短文。惕老一生最為人推崇之處，我認為有幾點：

（一）有遠見，有魄力——聯合報系在他的領導下，現在海內外共有八種報紙發行，規模之大，人才之多，通訊網之廣，無人不知，為報業所閃爍的光彩，在中國報業史——也是中文報業史上前所未見。除辦報外，還有文化基金會、雜誌、出版社、通訊社、資訊公司等，都是卓然有成的文化事業。他常以軍人自任，認為軍人只要對國家、對社會有益的事，義無反顧。顯示他具有魄力的性格，但如無遠見，即無所作為。

（二）忠於公，勇於事——記得三十多年前政府制訂出版法修正案，此案對新聞事業自然有許多的約束，惕老激於義憤，認為這是以行政權力干預新聞自由，曾聯合新聞同業起而反對，甚至不顧自己報紙的存亡，還是堅持立場。當時聯合報曾先後發表了九篇社論，陳述利害，其言鏗鏘，所產生的影響力，政府自然不能不予重視。這種公而忘私，不計成敗，不屈不撓，為同業爭取新聞自由的精神，確為報人樹立典範。此只其一，其實，惕老處事，只要義之所在，光明磊落，勇往直前，絕不妥協。在他一生奮鬥的歷程中，就是持此精神，獲得成功。

（三）重人才，愛部屬——在當前人才濟濟，各顯身手的新聞界中，我們如稍加注意，便不難發現很多穿梭於朝野之間，才氣橫溢，能說能寫的新生一代，不少都是聯合報系培養出來的。這種情形，雖出於個人的學養與努力，但惕老愛才、惜才的領導，亦有鼓舞的作用。而且惕老胸襟坦蕩，對於人才外流，楚材晉用，並不介意。眾所周知的已故作家高陽，當初如非惕老大力扶助，便無安定的寫作環境，自然後來亦不會如此多產，享有盛譽。所以，惕老如戰場的主帥，能用兵，能制勝。他所主持的田徑協會，多年來出錢出力，為國家培養不少人才，得以揚眉國際體壇。

（四）順潮流，識民情——惕老走的路，絕不是落在時代後面，他瞭解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大眾的需要欲望也在變的道理。所以，民生報與經濟日報，都是應運而生的時代產物。十六年前籌劃民生報時，惕老屬意我去擔任發行人，但事與願違，我只擔任了常務董事，未免有辜厚意。如今民生報欣欣向榮，果不出惕老所料，幾乎有人跡處都有民生

報，成爲街頭巷尾、老少咸宜的普遍讀物，也使我共享一分喜悅。我深信報紙是屬於大眾的，只要掌握現實，切合群眾需要，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我以惕老喻為新聞界當代奇兵，當不爲過。四十多年來，我們彷彿見其在戰場上馳騁縱橫，出奇制勝，神采奕奕。他曾自稱以一個職業軍人改行從事新聞事業，自然，這是自謙之詞。放眼世界各國，不論任何成功的事業，其領導人物往往都不是本行，因爲領導需要有眼光，有胸襟，有人望，而不是在乎本行與否，有眼光然後能見其遠，有胸襟然後能容其大，有人望然後能以服衆，發揮群體力量與團隊精神，成功與否，就是決於此，察於此。這種精神，在國內亦已屢見不鮮。新聞界前輩蕭同茲先生，學工出身，新聞事業亦非其本行。然而中央社在他的領導下，廣攬群才，從草創以至鼎盛時代，人才之多，享譽之隆，幾與國際著名的通訊社並駕齊驅，當時新聞界以中央社馬首是瞻，衆望所歸，同茲先生領導的即非憑所學，而是在他有眼光、有胸襟、有人望。今日惕老所創的新聞事業，對報業的貢獻，同樣的因他有眼光、有胸襟、有人望。

惕老引退以後，南陔頤養，其樂陶陶，就像曾國藩尊翁所說的「且將艱鉅付兒曹」。今年惕老覽揆之辰，我亦因未返台北，未及道賀，願以此文爲之添壽。

（原載八十二年十一月八日聯合報）

中央社台北分社溯往

今年四月一日，中央社六十周年，我想借此機會，談談台北分社在中央社發展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民國三十四年秋，抗戰勝利，台澎重回祖國懷抱，蕭故社長同茲先生派我為駐台特派員，我的任務除採訪台灣光復的新聞外，還要為中央社建立在台的據點。

當時的台灣，入境如履異國，一切景物都充滿了日本風味。日本宣佈投降後，日本軍民，莫不吞聲飲恨，等待悲慘命運的來臨；台灣同胞於此時，則不啻撥雲霓而重見天日，家家戶戶，無不掛燈結綵，扶老攜幼，翹首以待漢官威儀，那種出於赤誠的感激涕零的情感，真是動人心弦。

三十四年十月五日，我便在這種情況下搭乘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的專機，由戰時陪都重慶經上海飛抵台北。第二天前進指揮所全體同仁就在台北賓館（前日本總督官邸）舉行光復後首次升旗典禮。典禮後，由前進指揮所副主任范誦堯將軍和日軍參謀長諫山中將舉行交接談判。同行各人隨即各自展開任務。中央社是國內主要新聞的供應機構，大陸上國人急於得到來自台灣的消息，而我處於孤軍奮鬥之境，人地生疏，言語不通，又未攜帶電務員發報機，加上政府未正式接管日方機構，無法運用原來的台北電報局發新聞，幸而預先在重慶安排好，獲得松山空軍先遣單位電台商准協助，一連串的新聞電訊，才得從他們那裏

轉播到重慶空軍總部，再由該部送到中央社總社，翌日就可在海內外各報刊出。而同行的其他四位記者（重慶中央日報楊政和、掃蕩報謝爽秋、重慶大公報李純青、上海大公報費彝民）則憑海運郵寄送達他們的通訊報導，在時間上已遲了很多。

此後三、四個月中，我單槍匹馬的展開了工作，一面忙於採訪，向重慶總社發台灣重大的新聞稿，一面網羅工作人員，籌備成立台北分社。因為無法在台找到適當人才，只好電請長官公署福州聯絡處就地代為招兵買馬，約請報務及譯電人員來台。這些人由林鈞藩領隊，冒著生命危險，乘小汽艇衝過台灣海峽的風濤，在淡水登陸，我好似得到一支援軍。此外，關於尋找辦公處所，雖然和長官公署洽妥接收日本同盟社台灣支社，但該社社址（在今台北市博愛路東方大飯店對面）以及一切設備，在戰爭中遭到盟軍飛機轟炸，早已蕩然無存，除數十位員工待遣散外，可以說一無所有，一切都得從頭做起，我真嘗到白手成家的苦況。

同盟社台灣支社既毀，經幾波折，始覓得西寧南路二十號木材會館作為辦公之用。總社未遷台前，我們便在那幢老舊的樓房裏，度過了好幾個寒暑。來台的同仁多屬單身，為了裝設電台以及為同仁提供宿舍，又覓得幾幢房屋，分散在中華路、中山北路、長安東路、濟南路、永康街、泰順街、廈門街等處，現在都已歷滄桑之變，不復再見舊時景觀了。

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中央社台北分社正式成立，成立酒會在中山堂光復廳舉行，當時有中央監察委員李文範、台灣行政長官陳儀、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台北市市長黃朝琴、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新生報社長李萬居、中宣

部駐台特派員盧冠群等數百人參加，一時冠蓋雲集，賀客盈堂，為台灣光復後難見的盛會。

分社成立後，人事和業務逐漸納入正軌，社內分設秘書室（蘇珩）、總務組（林文澄）、會計室（林鈞藩）、編輯組（組長先為王繼樸、後為汪煥鼎）、採訪組（張任飛）、譯電組（組長先為熊懋、後為林啓星）、報務組（黃仁傑）等單位，人員總數最高達到七十餘人。剛光復的台灣，大多數人還不能閱讀國語文，分社不但要發中文稿，同時還要發日文稿，供給報社和電台，當時經費拮据，人手缺乏，艱苦可知。

此外，分社又在寶島各重要縣市先後設立特派員辦事處，計有基隆（特派員先後為汪土星、謝宗傳、李志方）、台中（陳伯懋、蘇珩）、台南（王繼樸、陳伯懋）、高雄（魏培德、謝宗傳）、花蓮（魏培德、李爾康），每處都設有電台、報務員，務使我們新聞觸角能深入全省的每一角落。

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本來是查緝私煙酒因執法人員處理不當釀成人命的個別案件，不幸成為暴亂，逐漸蔓延全省各地。這在成立剛一年的台北分社，可以說是一次嚴格的考驗。事件發生後，雖然立即宣佈戒嚴，但是部分失控羣眾到處打殺，不但在街上殺人，也偶爾會衝入機關民宅，造成流血事件，很多機關單位也都被他們所劫持，電力及通訊系統全被切斷。這期間台北分社外勤人員，冒著生命危險，照樣採訪新聞，其他部門的工作也都配合無間，全體人員將通訊設備自西寧南路分社移到中正西路二號（即今市議會），藏在日式房子的天花板上層或「榻榻米」下面，在此期間與總社的通訊乃得以維持始終不斷。當時街

道一片死寂，全市一片漆黑，「二二八」的訊息，便在顫動的燭光下，由「榻榻米」下面的發報機拍發到南京，再由總社轉達南京有關單位。

回想最危險的一天晚上（三月三日），整個台北市有如死城，長官公署各處處長都秉燭困守公署（今行政院），靠少數憲兵壘沙包防守，當公署被圍攻時，子彈嘶嘶作響的飛過我們工作所在地（即今台北市議會，在長官公署斜對面）的屋頂，我當時曾命報務員發出一通訣別電報給南京中央社總社蕭社長：「再見了！」

由於平日和各方面相處融洽，建立了良好關係，事件期間，公署遣派憲兵保護，所以我社同仁雖每天冒險繼續工作，却無任何人受到傷害。尤可強調的是同仁之中同心協力、無分畛域的情況。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雷樹水，他原為同盟社台灣支社的台籍職員，經分社續聘後，公餘曾在社內義務為大家教授日文，當此事件期間，同仁們枵腹困守，面對無處購買食物的困境，全靠他不計個人安危，出外張羅。

事況穩定後的第二天（三月五日），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救濟總署台灣分署署長錢宗起和我三個人，乘了一輛吉甫車，同往醫院探視受害人，楊代表中央宣慰，錢發救濟金，我採訪。全市仍是一片死寂，所能見到的只是若干屍體，仍橫在馬路上無人收拾。

三十八年五月，首都南京陷敵，大陸局勢逆轉，我奉社長蕭同茲先生電召，自台北前往廣州拜晤，同時奉召的還有紐約分社主任湯德臣。同茲先生眼見局勢日非，決定將總社遷來台灣，要我早作準備；同時又囑咐德臣兄將海外各單位緊縮處理。當時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但是，高瞻遠矚，言語之間，仍然顯示了他過人的睿智與鎮定。

三十八年終總社撤退來台，在名義上台北分社只是協辦單位，但總社派來的工作人員，因人地生疏，所以實際上大部分工作仍要由分社同仁力任其事。撤退來台的人員眷屬爲數不少，都需要安頓，那時各機關紛紛遷台，找房子已不大容易，何況還要從惶亂中求安定呢！更難的是接運疏遷來台的物資大部分是電訊器材，這些器材有的在基隆，有的在高雄卸貨，因爲時局緊張，來船大都不能久停，匆匆卸貨後就急著開走；我們人手原就不足，碼頭上又是一片混亂，電訊器材都很精細，如果不盯著下貨，不但容易失落，稍不小心，也可能損壞，所以在卸貨期間，基、高兩地的分社同仁，幾乎都是夜以繼日，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的工作，沒有一句怨言，沒有一個人要求津貼或加班費。

總社遷台一切就緒，三十九年中央社改組，同茲先生調爲中央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曾虛白先生繼任社長；交接前我向蕭社長辭職，理由是他交給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不久，爲簡化組織，台北分社宣告撤銷，我交卸了分社主任的職務，原來的分社同仁也泰半他就，台北分社在前後將近五年的歲月中，經歷了台灣的光復和大陸的淪陷，在這個大時代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爲中央社在台建立了基石，台北分社全體同仁服務的精神，真教我感念！

轉眼同茲先生已作古十年，今天紀念中央社六十周年，我們不能不想起同茲先生，他和中央社的關係太深了，所以有人稱他爲「中央社先生」。中央社三十周年在台北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紀念會時，胡適之先生說：「如果要我以政府當局的立場發一枚最大的勳章，我會發給蕭同茲先生。」今年爲同茲先生九十冥誕，我謹以此文紀念同茲先生，也祝

中央社前途光明燦爛。

(原載七十三年四月傳記文學月刊)

保持光榮的歷史

——中央社成立七十周年有感

中央社成立七十周年紀念將於本年四月一日舉行，特提出對中央社社慶與社務發展的幾點意見。

（一）毋忘中央社光榮歷史：中央社鼎盛時代，應追溯到故社長蕭同茲先生所領導的對日抗戰時期，當時人才濟濟，通訊網廣及各戰區與同盟國各重要的首都，報導的迅速翔實，足與美聯社、合衆社、路透社抗衡。同事們都以中央社爲榮。所以，胡適之先生在三十周年社慶時，便曾說政府應該發一枚最大的勳章給蕭三爺（同茲先生）。今後如何賡續這段光榮歷史，須憑大家共同努力。

（二）發揚中央社傳統精神：中央社在蕭三爺領導時代最特殊之點，就是同事們以社爲家，人人愛中央社，彼此都有憂患與共的情感，充滿了人情味。主要這是出於蕭三爺的精神感召。所以，有人稱他爲「中央社先生」，這種精神，歷久不衰。希望這一精神永遠薪火相傳下去，對業務的發展是具有潛在力的。

（三）毋忘台北分社奠基艱辛：中央社今日在台的規模，實爲當年台北分社所奠基基礎的延伸。南京總社遷台，除了重要人員之外，只有運來部分電訊器材。台北分社在當時各分社中最具規模，全島分設五個辦事

處，通訊網遍及全省。光復之初，中央社雖銜有接收日本同盟社支社的任務，但一切燬於戰火，全憑分社同事赤手空拳，共同努力建立基礎。

（四）配合時代發展業務：當前時代改變，中央社的業務已經不能走老路，必須配合時代潮流的需要，改弦易轍，另闢新的發展途徑。現任唐盼盼社長有眼光、有計畫，中央社同仁對他的領導是深具信心。

（原載八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國時報）

感懷集 紀念篇

不容青史盡成灰

——二二八事件親歷的感受

本文作者葉明勳先生，於台灣光復時，以中央社台灣特派員身分，在台採訪，對光復初期的台灣社會有相當深入的瞭解，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並親自採訪整個事件經過，直可謂身歷其境。鑑於各界追述二二八事件，偶有失實之處，作者特秉良知，以不偏不激的態度，追憶當年的感受，藉供讀者參考。（聯合報編者）

我們處於時代在變，社會在變，國家的處境也在變的今日。看看國際風雲的變幻人心詭譎的紛爭，有時兀坐沈思，彷彿如被滿天陰霾的雲層籠罩著、窒息著，感受到的只有經濟繁榮，物質炫耀，生活安逸，人性暴戾，構成了那個光怪陸離，瞬息萬變的世界。人類的智慧，雖已竭其所能，昇華到玄妙莫測，最後仍然無法避免消失於歷史的隧道，各種善惡真偽也終於在那裏現形。以往鑒今，就是歷史留與我們的教育意義。但是，年輕一代對於這些陳跡，並不關心。幾年前，美國對高中學生曾作調查，發現他們史地常識的貧乏，幾乎笑話百出，如南美和歐洲的國名，很多東西莫辨，甚至南北戰爭，也有混淆不清，大概這是科技掛帥下的後遺症吧。我們年輕一代，是否也有同樣的缺憾，遠的不說，近的如對日抗戰八年的浴血奮鬥，大陸淪陷的慘痛，都能人人瞭解那些血淋淋的悲慘真相嗎？恐怕有人就視為這是塵封已久的歷史故事，渺不可

及，早已缺乏一份切身之痛的真實情感。大陸的淪陷，這個責任，似乎也應完全落在中國國民黨的身上，而對當時蘇俄卵翼中共的幫兇，中共背信詐騙的叛亂，與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反而一概抹煞，茫然無知。而且認為這些都與現實無關，現實的視野，已被利令智昏的功利主義所圍堵。只有那些以身受之的白頭中老年人才有此懷古的愴情而已。昔人曾有亡其國者先亡其史的警語，能不令人感慨係之。再說，台灣光復以後發展的情形，年輕一代，恐怕亦僅限於見其盛。譬如目前社會的繁榮安定，生活的富足改善，他們忽略那段艱辛努力的悠長歷程，那裏真不知凝聚著多少人的智慧和心血，豈能不加珍惜；同樣的，四十一年前，那次被視為歷史瘡疤的二二八事件，經歷世局滄桑之後，益覺迷離撲朔，任憑信口雌黃，作各種真偽莫辨的報導和推測。這種積非成是的流傳，以我一個身歷其境的人來說，懷於良知，想到早年于右任先生「不容青史盡成灰」的感慨，真有心所謂危的感覺。我們對於任何事件的分析或判斷，至少須從三方面來探討，就是對當局的認識、主觀的狀態與客觀的環境。二二八事件，如能先從這三方面來看問題，然後不難抽絲剝繭的找出癥結所在。這不是情感的，如果羈入情感的因素，便易產生偏差，對歷史真相的探索，不會是很正確的。

行政長官自嚴壁壘，管道淤塞，抱負難展

先說對當局的認識，當局就是對主政人物的瞭解。

我是三十四年十月五日偕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人員由重慶首批飛抵台灣的，當時的職務是中央社台灣特派員，同行還有幾位新聞界碩

宿，現在多數已經老成凋謝了。所以，對光復後的台灣，瞭解不能止於浮光掠影。主政人物行政長官陳公洽（儀），也曾與我多次單獨談話。當他離台的前一日，又邀我談了兩個多小時。我們今日追溯二二八事件，便須先談對他的認識。

陳公洽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早期的留日學生，據聞與日本戰犯東條還是日本陸軍大學的同班同學，並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歸國後，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都曾任要職。主持閩政時，銳意建設，提倡國語，不乏具有突破性的作為。當時風評雖不一致，但福建從此貫穿了不少的公路，入境問俗，可用國語，都是事實。當他離職時曾慨言：「五年後，閩人當思我。」後來未到五年，閩人便在懷念著他，也是事實。他在萬方矚目下，啣命來台接收為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國土，當時都認為是最適當的人選，一則因他最瞭解日本，日本政壇亦多舊識。二則在地緣上他是與台灣唇齒相連的福建具有淵源的人。當他蒞任之日，步下飛機。便對記者們說：「我到台灣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他雖精通日語，但對台灣的日人從不說一句日語。台灣在他的心目中，這裏同胞們經歷了日人長期的統治和壓榨，飽嘗亡國之痛，一旦重歸祖國懷抱，最渴望的就是自由和民主。所以，他施政所追求的目標也以此為導向。譬如迅速的成立臨時參議會，重視民意，過去囚禁在火燒島（即今綠島）及各處的人犯，一律予以釋放，恢復自由。於是，在政治層面上頓然形成了全面解禁的景觀。從正面來看，人人如重見天日，享受著充分的自由生活。而在負面則導致社會秩序的紊亂，影響治安的工作，那些作奸犯科之徒，便在潛伏著乘機蠢動，為民衆生活帶來不安。而另一棘手的經濟問題，卻忽視這是大戰之後的社會，當時台灣物資缺乏，民生凋

敝，很多生產機構戰時已被破壞，未能恢復生產，導致失業問題不易解決。加以交通陷於混亂停頓狀態，對外無異自行封鎖，外貨既不能輸入，本身物資又匱乏，供求便已失去了均衡的作用。接收以後，政府的行政效率顯然運作不靈，呈現著無力感，許多失調的問題，陸續的出現，都未能適時採取有效的對策。最顯著的是過去日人對生活必需品以管制、配給來控制戰時的物價，民衆喘息於高壓之下的生活，尙能苟安。一旦予以廢棄，又無外援的力量，於是商人居中操縱囤積，物價無法穩定，反而自亂步驟，直接的影響民衆的心理，民衆只重現實，並不瞭解政府的苦衷，對政府自然逐漸失去了信賴。其中另一因素，就是受日人的牽制，因爲日人在台灣已經根深柢固，忽然挖去了根，地位財產都已失去保障。這股力量，台灣同胞是無法取而代之的，它的影響，也是愛莫能助的。

這種情況，行政長官坐在望之儼然的辦公室中，能否瞭如指掌，胸有成竹，都不無令人疑慮的。別人說他剛愎自用，就是說他是自信心極強的人。憑心而論，他的確將自己全副的精神都投入了公務上，他的生活，只能看到嚴肅的一面，沒有享受。中午留在辦公室裏，只要足以果腹的便餐也就足夠。他患有糖尿病，但並不重視自己的健康，雖然，這樣的圖治心切，部屬之間，諾諾稱是者則多，一土諤諤而具有諍臣典型者則少。於是，下情難以上達，很易築成了一道隔閡之牆。不但如此，就是高層次的管道，也往往爲之淤塞。譬如當時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先生，老成謀國，向他提出很多興革的建議，都未以行動證實他的採納。中國國民黨省黨部李主任委員翼中，亦未獲得應有的配合，遑論政通人和，同心協力。這些管道，如能運用得宜，有裨省政建設的發展，自然是相得

益彰的。但是，所見的卻是自嚴壁壘，事必躬親，缺乏那種天衣無縫、渾然天成的境界。合衆社記者，便曾批評他是「台灣之王」，因為當時的警備總司令是行政長官兼的，無異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語雖近諛，卻是頗爲傳神的。我們深慨政治真是一項高度綜合的藝術，有時只憑學養、見識、熱忱，仍然難以展其抱負的。所以，陳公洽雖爲重建台灣而盡瘁，但突遭二二八風暴以後，只得心灰意冷，擱置手繪的藍圖，剩下兩袖清風，黯然掛冠的回到上海了。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由希望而失望而反抗

至於主觀的狀態，台灣久經日人殖民政策的統治以後，一旦重歸祖國的懷抱，重見漢官的威儀，那種感激涕零，出於耿耿丹心的至誠熱忱，掀起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如火如荼的高潮，街頭巷尾，到處可見，感人之深，絕不是四十多年後出現群眾遊行的今日所能想像的。台灣同胞認爲光復後的台灣將是一個最理想、最開放的自由民主的世界，一切作爲，不再像過去備受統治者桎梏的迫害，可以隨心所欲的安享屬於自己的生活。但是，卻忽略了這是大戰之後，瘡痍未復，百廢待舉的世界。重建家園，必須以政府和民間共同的努力，無法立竿見影，一蹴可幾。當全省各處燃燒著慶祝光復的火燄逐漸熄滅之後，冷酷的現實，也終於無情的暴露了它殘缺的一面。

而且，自由民主的真諦，必須經歷長期的政治教育的培養和涉練，始能獲得全民的共識。光復之初，台灣同胞只樂聞自由民主的名詞，無異新生的寵兒，人見人愛，卻不知真諦在那裏，界限又在那裏。因而下層社

會經常發現借用自由，以民主爲擋箭牌，行爲上逾越了法律所賦予應有的範疇。如果不知守法，缺乏守法的精神，不以守法爲基礎的自由民主，自然無異癡人說夢，幾近無知。然而，當時我們不能以此準繩衡量滿懷熱忱的台灣同胞，縱使四十多年後的今日，叫囂自由民主的人，又有多少人能自奉準繩，自我約束。何況當時剛跨出殖民地的第一步，面臨兩個不同型的社會，一切都是新的，新的觀念，新的標準，都需要時間逐漸的教育，逐漸的培養，那些缺乏認識的現象，如今思之，只要出於真誠，也就不足以令人咄咄見怪的了。

日據時代，台灣同胞有很多優秀人才爲日人所聘用，所以，任何機構都含有台籍人員，但屬於高層次的，仍然寥寥無幾。這是日人統治的政策，與真才實學是無關的。光復以後，政府處理的原則，一律留用。至於其他社會上負有聲望的人，政府未能廣爲延攬，可能出於實際困難，譬如捨取標準，何去何從，而且擔任公務，對他們也不是很熟練相宜的。於是，只有借重他們在省市參議會上展露其才華。如果說這些遺珠之憾，構成若干的不滿或失落感，自然是無法避免的，也是屬於情感化的。事實上，凡是久居大陸的台籍人士，政府已儘量讓他們重蒞故土，爲桑梓而貢獻其碩學宏才。

我們當時來台的人，彼此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台灣同胞對祖國的熱愛太感人了。這種熱愛，自然抱著無窮的希望，但當希望落空，或無法兌現時，希望成爲失望，希望愈大，也就成爲失望愈大，情緒隨而從高潮降爲低潮。這些希望，爲什麼落空，爲什麼無法兌現，這是當時台灣同胞難以理解的。政府既未坦誠的公開說明，也未適時的加以疏導或安撫

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的大眾情緒。當時並不像現在這樣的重視溝通，這是遺憾。

記得當時新生報曾有一篇社論，申述日據時代台灣同胞對日人統治的反抗，曾發生二十多次的流血事件，顯示台灣同胞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但是，二二八風暴，以實質來說，不同於對異族的反抗，只是對現實的不滿和失望的一種宣洩而已。因為不滿和失望的累積，就是怨尤，怨尤到了某一種程度時，就像石門水庫的儲水量過量時，必須洩洪，鎮壓等於臨時築堤，如果以此治水，必將窮於應付，這是有違祖先的遺訓。

有人認為台灣同胞的倔強秉性頗與閩南地區的民情相似，遙想當年，他們的祖先相率追隨鄭成功飄海來台，乘風破浪，氣壯山河，內心都在燃燒著反清復明的火燄。這種火燄，寓有忠貞之氣，綿延百世，直到永遠。後來台灣各地不時出現的泉州、漳州幫派的械鬥，實質雖不同於反清，而所激發不容於他人侵佔的強烈自我主義，同樣的在熱血沸騰著。這種潛在力，我們不僅見於此，也見於目前的大陸各省，大陸淪共以後，或大或小的抗暴運動，為歷史留下見證，就是有力的表現。小說家所描繪的民氣可用，亦即指此，大則可用於救國救民，小則可用於私人集團，鼓勵群眾，供其驅策。我們習聞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是禍是福，關鍵決定於領導階層掌握的方向正確與否，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都在一念之間，後果絕不是當初所能逆料的。

抑且，群眾行動，從來都是缺乏理性的，也是盲目的。二二八風暴，有一些失意而具有政治慾的火爆性人物，利用群眾對現實的不滿、失望而匯合的激憤，從中煽動、蠱惑，造成缺乏理性的盲目暴亂。暴亂的目的

在那裏？是衝動，是被利用，也許永遠無人提出正確的答案。既然形成暴亂，政府爲維護社會的秩序，保障人民的安全，我們也無意苛責以武力鎮壓。因爲演變至此，古今中外，也很少不以出之以武力來應變的。

民情缺乏溝通疏導，禍起基層，遺恨何及

最不可原諒的，就是街頭巷尾，居然有人高唱日本歌，舞著武士刀，幾乎忘卻自己是炎黃子孫，身上流著是中華民族的血液。這種與日本浪人無異的行徑，有人認爲這是日人蓄意助紂爲虐。根據資料探索，日本戰敗之初，旅日台灣同胞四、五千多人，半數以上是沒有戶籍的。三十五年由日遣送回台的二二七人，其中部分並不是參戰的，而是當年的特級流氓，日人訓練他們到大陸去當最壞的角色，目的有三：一是壞事做盡，替日人頂罪，二是破壞對台灣同胞的情感，三是困擾台灣的治安（見五二年四月份文星雜誌）。像這樣充滿炸彈性的火種，投入台灣，我們雖未盡信，危險性是可想而知的。另一不可忽略的事實，就是當年被徵參戰遣散回台的人，先後約略有三十萬多人，他們的就業問題，政府缺乏妥善的照顧或安排，像這樣血氣方剛的人羣，一旦遊手好閒，自然構成社會問題。有人認爲這些問題與流氓的未能肅清，也是導致二二八風暴的另一因素。然乎否耶，治史者不能不予重視。

至於客觀的情勢，我們初履斯土時，都會驚訝日人銳意經營所花的心血，雖然他們的政策是殖民的，但無疑的已向現代化的里程邁步著，這是備受戰火蹂躪的大陸各省所不能及的。可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裏首當其衝，迭遭盟機的轟炸，到處只剩下百孔千瘡的殘垣斷壁了，——

尤以總督府最為突出。戰爭在人間最殘酷、最淒涼的一面，真是令人不堪回首。台灣同胞雖未淡忘那段逃警報、啃地瓜，日夜驚惶的艱苦日子，但一旦光復來臨，他們以過去視為恍若隔世，如從黑暗走到光明，如在重獲新生迎接著幸福的歲月。所以，現實仍然是浩劫之後，滿目瘡痍未復的世界，也被大家太情感化的忽略了。

一年以後，慶祝光復的熱潮，已經逐漸的消褪，面臨新的生活環境，一切是陌生的，希望獲得的也不是很滿足的。於是，有人便在開始不滿或失望。而這裏卻包含著兩種潛在的因素。其一，接收人員都來自大陸，他們對台灣還是很陌生的，各種行政管理、程序及手續，都是搬運大陸那套積習已久的老舊架構，適用與否，未加深究，既不瞭解日人所遺的成規，也無法革新汰舊，行政效率因而面臨新的考驗。從主管到基層，都缺乏新的精神、新的作法，未能做到真正換血的工夫。那些沓泄因循的積習，仍未根除。於是，各種青黃不接，便無以善其後。其二，日人已成為戰敗國的日僑，都須遣送回國，未被遣送的日僑，只有寥寥無幾的專門人員而已。這股龐大的人力騰空以後，多少機構形成了真空的狀態，尤其生產機構，萎縮的生產力，一時難以復甦，加以戰時的破壞，益見支離破碎。我曾參觀過一些機構，設備破損，人員零落，一副爛攤子的印象，至今尚在。所以，顯示人力是需要充實的，而另一面失業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日人被遣送後，接充人員，政府也許考慮事實困難，似乎並未在台灣同胞中廣為羅致，在情感上，就是很容易造成隔閡的。如這些問題，政府的處理，顯然缺乏公信力。也就是說，當此過渡時期，不少脫節、紊亂的現象，政府都未能落實接收的工作。所以，面對困境，很難出現新的拓展、開創另一個新的局面了。

政府這些實際的困難，台灣同胞是十分隔閡的，也是無法獲得理解的。

至於接收人員留與台灣同胞的印象，人人都具有泱泱大國的風度，儼然是漢官威儀嗎？當初來台接收的人，據聞曾經流行著「一流人才做二流事」的口號，就是希望都有好的表現，能為台灣同胞塑造好的形象。只是軍公人員太多了，那麼多的人，都能自律自愛，以此自許，畢竟是戛乎其難的事。尤其基層人員，有些積習難改，仍殘留著官僚時代的壞習氣，便成為害群之馬。如二二八前夕的緝煙事件，誤傷行人，即其實例。如能具有今日只許挨罵，不許還口的憲警涵養，區區緝煙小事，何至形成野火燎原，一切暴亂自然早已消弭於無形。遺憾的是最接近民衆的人，就是這些基層人員，接收人員的形象，也許就被他們的顛預無知和不能自檢的行為破壞了。

我們都知道首先令人失望的，就是看到第一批登陸基隆的國軍儀容，他們的服裝都很破舊；哪裏像一支堂堂的勝利之師。殊不知我們的八年抗戰，就是憑這樣的隊伍與日軍衝鋒陷陣，與日軍作殊死戰，台兒莊諸役，也是憑這樣的服裝擊敗日軍。但是，那些祖國以血肉之軀而抵抗的苦撐日子，所流的血、所吃的苦，都不是海天遠隔的台灣同胞所能瞭解的。當時大家看到這些登陸的士兵，應該是像看到劫後的破碎家園，不是失望，而是感慨。多難的祖國，它為抗戰承擔太多的災難了，戰勝日本的不是武器，而是正氣，而是潛在的民族精神和毅力。這些感慨，自然也絕不是當時台灣同胞都能心領神會的。

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之別，本來無此界限。光復以後，街頭巷尾，到處掛滿了補習國語的招牌，台灣同胞，無分男女老幼，都在詰屈聱牙的學

習著國語，而接收人員也能熱情的學習著閩南語，彼此相聚，如見遠客，其樂融融，從無隔閡，自然談不上什麼地域觀念。新生報於光復一年後，曾作饒有意義的統計，就是日人雖然統治台灣半個世紀，但台灣同胞在一年之間與外省人通婚的紀錄，卻超過了半世紀與日人通婚的總數，顯示彼此的情感是多麼的水乳交融。二二八事件以後，後來外省人三字，竟成為很突出的敏感名詞，而且還沾上一點政治意味。這是從何說起，如果說對政府有什麼不滿，因政府裏辦事的多屬外省人，便歸罪於外省人，但外省人並不代表政府，當時全國各省的公教人員，也沒有一省都屬於本省籍的，自然是風馬牛不相及了。從知識份子到農村，似乎都沒有這樣的偏見。也許這是居心叵測的人所製造的名詞。中國歷史上，有幾次北方居民大舉南遷，如五胡亂華，如金人侵宋，他們從遙遠的黃河流域，扶老攜幼的避亂南遷，所到地區極廣，後來都在當地生根，從未聞有外省人與本省人之別。閩南語的母音，根據音韻專家之言，具有中原的古音，以此推論，今日來自閩南的台灣同胞，其祖先何嘗不是來自中原。如果尋根，我們的根，可能都是源於那個遙遠的中原。中華民族所以能成其大者，就是因能凝聚攝取各方面的潛在力量，為外力所不能奪、不能移。台灣後來的經濟繁榮，舉世刮目，答案也就是在此。如今山河淪陷，紅禍橫流，大陸人士，相率來此，又像歷史上大舉南遷。所謂本省人與外省人，事實上，無異過去泉州、漳州的糾葛翻版而已。

往者不可諫，須為歷史尋根，毋偏毋激

以上所敘就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前，個人對當時台灣情勢發展親歷其境的感受。

四十年動亂多難的歲月已經遙遙而去了，台北市歷經滄海桑田之變，昔日那份海天寄跡的幽思，已為物質文明的浮囂所取代。二二八的噩夢，也已渺無痕跡。但對年輕一代，仍如一團疑雲，這裏特敘真相，作為註解：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廿七日晚，專賣局緝私人員六人偕警員四人，至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煙，女販求情未許，民衆圍觀，群情激憤，混亂中開槍傷及路人，群衆擁至警局，要求懲兇。

——次日二十八日，群衆聚集龍山寺、延平南路遊行，繼至專賣總局，又至分局，企圖搗毀。中午擁至行政長官公署（即今行政院）門口叫囂，被迫開槍，作鳥獸散，所遺木屐近百雙。下午繼續遊行，見外省人便打，台北幾成恐怖世界。復佔奪公園廣播電台廣播，警備總部宣佈開始戒嚴。

——三月一日，台北市參議會邀省議員等組緝煙調查委員會，推選黃朝琴等向行政長官建議善後處理問題，長官即向民衆廣播，答應建議。

——三月二日，暴亂逐漸蔓延全省各地，外省人到處被毆，成立處理委員會。

——三月三日至七日，如進入暴風圈，暴亂不斷擴大，長官公署惟有不斷的讓步。

——三月八日，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率同憲兵第四團兩營由福州抵基隆。

——三月九日，國軍二十一師由上海抵基隆鎮亂，至十三日，發生抗拒，多有傷亡。

——三月十四日，警備總部公報：「開始肅奸工作，希望民衆檢舉密報，全省綏靖工作進行順利，各地臨時組織已自動解散。」

——三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蔣經國處長偕行，至四月二日，離台返京。

——四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宣佈改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為台灣省政府，首任主席魏道明於五月十五日抵台。

此次暴亂，當年台北市長游彌堅認為這是很小的事件，因為大陸各省類似這種偶發的緝私糾紛，已經司空見慣，但在台灣卻成為很高震撼性的風暴，實非意料所及。中共方面近年曾多次叫囂，認為這是他們所導演的傑作，中共雖以暴亂起家，但當時他們還是不成氣候，謝雪紅之輩，乘機插上一腳，實在談不上有什麼影響力。中共無非藉此大攪統戰，欲以惑亂國際視聽而已。所以，我們無需予以重視。

去年（七十六年）四月間，美國亞洲學會在波士頓舉行第三十九屆年會時，曾將二二八事件列為討論主題，經過賴澤涵、馬若孟、魏萼三位教授以兩年半的時間，從台灣到國外廣為蒐集有關資料，並訪問當時政府與地方的有關人士，也曾到過肇事地點勘察。他們兩易其稿所作的結論，認為此次事件，與民國二十三年山東威海衛所發生的暴亂頗為相似。威海衛於一八九八年租與英國，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歸還我國，由於思想、觀念的差異，當地居民產生了很多次的反抗行為，背景與當時的台灣頗為相似。

我以一個身歷其境的人現身說法，從廟堂到市井之間所獲的感受，認為這是對現實不滿的一次逾越的反抗行動，對現實為什麼不滿，其中包括政治的、經濟的、觀念的、心理的等潛在的因素，具見前文所敘。這些因素由於對當時社會的突然改型，對戰後的生活環境，對政府的施政初衷，都缺乏充分的、理性的瞭解和認識，以致形成了隔閡的鴻溝，復因失望而導致誤會，缺乏溝通的管道與紓解的力量，於是，鴻溝的裂痕日益擴大，終於難以遏阻。自然，無可否認的，另一股主導的反抗力也在驅策著，這是熱中於政治而未能逞其私慾的具有反抗性人物作祟，他們利用群眾對政府失望的直覺激憤，加以煽動、蠱惑，因而如波助瀾，轉而成爲一次缺乏理智的暴亂。後來，中共的羽翼，與一些甘爲日人作鷹犬之流，也夾雜在內，叫囂搗亂，自逞其能，在意識上，沒有目標，並不包含什麼分離主義。台獨一群欲以自吹自擂，也想將此次事件扯上了關聯，與中共所玩的統戰把戲，同樣的都是一副小丑嘴臉。

歷史的教育意義，就是曉諭後代子孫不能重蹈前人的覆轍，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放眼古今中外，任何歷史的軌跡，都遺留著殘缺或醜陋的一瞥。我們不必諱言殘缺或醜陋，因爲這是警惕，負面也是同樣的具有教育意義的。在渺遠的歷史隧道中，那是不可能重現的陳跡，與現實已經永遠的隔離。所以，我們無需擔憂，無需抱憾。現在，我們於四十一年後的今日，追溯二二八事件，也須以同樣的心情，只希望爲歷史尋回失落的一面。至於追究責任等說法，這是對歷史的責任，對歷史的交代，歷史上的成敗得失，千秋自有定論。最後我們還須補充一提的，就是當時抗戰在急轉直下的情勢下勝利，政府在遍地瘡痍中忙於接收，各地接收情形，遭受中共嚴重的毀詆或破壞，國人昧於真相，容有爲人所

詬病。但在台灣大體上步驟是未亂的，都希望去做好的。如果既非身歷其境，只憑傳說臆測，便將一些失實的史料刺激年輕的一代，自然有違歷史的良知。所以，年輕一代對歷史必須求真求實，像胡適之先生一樣的重視事實的根據，追究到底。但是，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那裏？很多人既不知什麼是二二八事件，政府至今仍缺乏有系統的完整記載，公諸於世。去年因逢二二八四十周年紀念，從美國到台灣都有各種的追記或評論。探秘發隱，的確有不少的琳琅滿目的大著，可惜很少是身歷其境，缺乏真實的體驗，那些洋洋大作，未免就有失實之處。回想于右老「不容青史盡成灰」的警語，青史成灰，畢竟是人間莫大的遺憾。時光易逝，轉眼又是一年，撫今追昔，本文之作，但求秉於良知，不偏不激，不隨不阿，寫出個人感受。我雖非歷史學者，卻願能為年輕一代揭露歷史真實的一面。

(原載七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聯合報)

後世忠邪自有評

——從陳公洽談到二二八事件

自從監察院公佈前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當年二二八事件的報告之後，衆議紛紜，萬方矚目，社會各界廣泛的掀起了各種不同的迴響。當時最重要的關鍵人物，當然是主政的行政長官陳公洽（儀）。他在離台以後，前往南京轉往上海便住在湯恩伯的寓所，也進入了中山醫院治病。三十六年夏，我在赴京述職回台路經上海時，曾到醫院去看過他。談到二二八事件，不禁黯然動容，認為這是他從政以來最大的失敗，也是此生難以彌補的缺憾，對於外界對他的種種批評，都未置可否，只見感慨溢於言表。今日回想四十年前的陳跡，真是百感交集。撰寫此文，既不是秉於春秋之筆的大義，也不是含有任何蓋棺論定的褒貶之意，只因歷史的情感鬱結而成爲胸中塊壘，似有一份良知在驅策，雖然我已寫過〈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文，但覺意有未盡，仍欲一吐為快。自愧爲新聞界老兵，落落一生，無補時艱，多少前塵往事，回首惘然，都已渺如過眼雲煙，只願傾其往昔之所知，爲關心歷史者正告，視之西窗夜雨話舊的題材，固無不可，當作茶餘酒後的談資，亦屬無妨。

松井石根之言，促成陳公洽主閩

細數陳公洽的平生，最重要的階段，一是在福建八年，一是在台灣二

年。遙想當年，風雲際會，政府爲什麼任命他爲福建省主席，則須追溯到平定閩變前後的政壇動態。閩變者，就是民國二十二年李濟琛、陳銘樞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以抗中央。以整個情勢而論，只是政壇上一瞬即滅的泡影，並不是什麼驚濤駭浪。未及一年，即告平息。當時九一八事變發生已經兩年，日本包藏禍心，侵華日亟的猙獰面目也已暴露於世。而政府則在忍辱負重，勵精圖治，基本的國策是先安內而後攘外，東南各省，因離剿共的地區稍遠，積極的建設，各地情形，可以說是很安定的，也是很繁榮的。那段歲月，就是後來爲人稱頌的大陸時代黃金十年。閩變發生後，附近各省都未受影響，只有隔海相峙的台灣，已被他們所拉攏。政府爲求救亂，自然也須早日扭轉台灣的情勢。於是，便由李擇一銜命來台，李氏早年留日，爲國內知名的日本通，日本政壇且多是他的舊識，台灣軍區司令長官松井石根即其中之一。當年舉國側目的塘沽協定等對日重要的商談，李氏也無不參與。其時蔣委員長坐鎮南昌剿共，因楊永泰之推薦，始受知於蔣委員長。李氏既銜命來台，便化裝爲日人，另邀兩日人同行，由上海搭輪先至長崎，然後來台。不料抵台之後，日人政府方面已爲閩變同黨所包圍，不得其門而入。後來透過當地名紳辜顯榮的關係，始由辜氏邀請松井石根於其寓所與李氏晤面。辜氏當時雖爲日本貴族院的議員，但對隔海的祖國仍有一份依戀之心。九一八事變後，蔣委員長曾授意辜氏，希冀他能從中排解日人的侵略野心。所以，辜氏曾由他的三女婿黃逢平陪同到過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先後晉謁蔣委員長與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前立法院院長胡漢民，談話的記錄，光復後仍爲其哲嗣辜偉甫所珍藏。李擇一台灣之行，果然不辱使命，經其陳述利害以後，松井石根已允支持國民政府，談話

之間，松井石根並問及陳公洽近況如何？李氏便以陳爲當時的軍政部次長相告。當他馳電向蔣委員長覆命時，即提到松井石根對陳公洽關懷之意。閩變平定後，政府爲重視福建對台灣的關係，從各種跡象分析，松井之言，與任命陳公洽爲福建省主席多少是有關的。

陳公洽主持閩政後，民國二十四年，日人爲紀念統治台灣四十周年，特地舉辦了一個博覽會，藉以炫耀他們在台的建設，總督中川健藏曾邀陳公洽前來參觀。他搭乘逸仙號軍艦由閩抵台，自然貴爲總督座上之賓，總督官邸（即今台北賓館）一時冠蓋雲集，日人在台那副統治者的傲態，也盡入他的眼底。十年後，台灣光復，陳公洽以行政長官重臨舊地，他所不喜的總督官邸，那副豪華的氣派，仍未淡忘。所以，當初他的官邸，不設在台北賓館，而另選於台電公司日籍董事長的舊居。二二八後，始遷延平南路。兩地居民，因而常見那位樸實無華的日籍長官夫人，提著籃子去買菜。據聞大陸淪陷不久，她便已悄然返日，生活清苦，舊屬任顯群等人，曾予濟助。

那幢曾爲台電所榮寵的官邸，後來由台電總經理劉晉鈺遷入，但因陳劉二人都不得善終（劉因共諜案正法，同時有台糖總經理沈鎮南等人），從此人去樓空，視爲凶宅，誰也不願再搬進去住。其地在今台北市和平東路台電總管理處舊址附近，已改爲診療中心，話舊者每爲歎歎不已。

信賴沈仲九，陷入紅色泥沼，種下禍根

陳公洽在福建致力建設，雖不乏績效，但不能稱爲成功，主要原因不出於：一爲處理人事問題，一爲財經政策失當。前者，因所任用的主管人

員，多數屬於江浙地區的人，很易引起具有鄉土意識的當地人士反感。而後者，尤以厲行實施管制所設的生產局、公沽局、運輸局等機構，影響物價波動，最爲各方所不滿，當時雖有戰時的因素存在，但現實未爲大眾所接受，遂貽人以指責的口實，甚而產生歧見。南洋僑領陳嘉庚，因曾創設廈門大學及集美學校，爲朝野所重，他以關懷桑梓心切，對當時的省政便提出不少嚴厲的批評與責難。政府因時值抗戰，重視團結，需要華僑的支持，於是導致三十年的省府改組，主席易人。

陳公治的處理人事問題，雖未因主管的籍貫便顯示他有地區的觀念，但是卻充分的暴露他的剛愎自用的個性。譬如當時國民政府林子超（森）主席曾推薦兩位久孚衆望的閩人爲廳長，一爲民政廳廳長高登艇，一爲教育廳廳長鄭貞文，據聞當時福建省內的任命各縣縣長，有的竟不爲民政廳廳長所知，同樣的，各校校長的任聘，也有不爲教育廳廳長所知。又如財政廳廳長張果爲因反對他的厲行管制政策，便不爲他所悅，掛冠而去。這種作風，自然不會令人心服，也只有爲他自己種下失敗之果。他在用人方面，還有的特點，就是一為重視訓練人材，很多的基層幹部，都是出於省府所辦的訓練所，只要受訓時表現傑出，都不難擢升爲高級幹部。一爲對部屬鄙視小報告，相傳有出任海澄縣長者，深知他的好惡。便先爲自己偽造一連串貪污劣跡的小報告，不斷的投向主席辦公室，真像曾參殺人，不得不疑，後來終於下令徹查，結果並無其事，此人暗喜計已得逞，便玩起真的，密告到時，自然成爲「狼來了」的翻版，省府無人肯信。這個故事，給人的省思，就是曾國藩所說知人之難。凡在領導階層，用人不疑，與鄙視小報告，都是值得欽佩。但一旦君子與小人不辨時，君子則有所不爲，小人則無所不爲，善惡互異，偶

而不察，禍至無日，當代之爲官者，真是不能不謹慎了。

陳公洽因深信部屬，錯用了人，不免僨事而未能自覺者，此只一例。他在這方面無可挽回而鑄成大錯的莫過於過分信賴沈仲九，爲自己種下殺身的禍根。沈爲思想左傾以無政府主義自詡的人物，陳公洽從福建到台灣，以至後來的浙江，對他無不言聽計從，寵信有加。他在福建時，名義雖只省府顧問，但在幕後卻操縱了人事大權，很多的人事部署，隱然都是出於他的主意。施政方面，也是同樣的具有影響力。所以，陳公洽遭人之怨，他自然應該負責的。其人爲一典型的紹興師爺，亦頗以古代弄權誤國的宦官之流。陳公洽雖是自信心極強的人，不料他的左右，竟有這樣口蜜腹劍，深藏不露的奸宄，居然毫無警覺。他的思想，從此逐漸的陷入紅色泥沼，沈浸日久，終於難以自拔。據聞當他出任浙江省主席後，省府之內，便有不少的共黨份子潛伏著，有些還是追隨多年，平時從未發現的人。從丁名楠投書湯恩伯事件來看，據丁自述，臨行時曾看見沈仲九臉色深沈的坐在那裏與陳公洽密談，所謂局部和平，大概又是出於沈的傑作。所以，論者嘗以陳公洽終其一生，爲沈仲九所害，其然，其不然耶！

我們如觀察一個剛愎自用的人，歷史上有許多的暴君，就是屬於這類典型的人物，成功者並不多覯，而失敗者結局都是很悲慘的。陳公洽自然也是接近這類典型的人，而且具有雙重的性格。一則自信心極強，獨斷獨行，在他的字典中，找不到可以解釋自己錯誤的字。所以，他缺乏從善如流的坦蕩胸襟，別人的意見，當然不易接受。他的部屬，難覓一士諤諤，風骨嶙峋的人物，卻是常有巧言令色，諾諾稱是的鄉愿之輩，最

易築成一道無形的隔閡之牆，受損豈止言路阻塞，下情難以上達，一旦失察，貽害無窮。二則他如信任某人，便像信任自己一樣的不爲忠言所動，上述所舉的實例，都是患在不能識人，疏於明辨所致。試想諸葛亮、曾國藩絕不是剛愎自用的人，否則街亭之失，諸葛亮豈能深悔未遵劉備之言，錯用了馬謖。才高如左宗棠，也不會推崇曾國藩有知人之明。天下事，成敗得失，往往取決於能否明察的一念之間，當韓信以叱咤風雲的氣概戰敗項羽於垓下時，絕不會想到自己後來竟喪身於未央宮。同樣的，陳公洽於主持台灣受降典禮時，面對著萬眾歡騰的情景，不可一世，也絕不會想到自己後來竟如此的下場。陸放翁詩云：「中原成敗寧非數，後世忠邪自有評。」歷史昭示於後代者，能不慨然有感。

對外淤塞溝通管道，一意孤行

陳公洽主政台灣後，當時舉世無不寄以殷切的期待，因為台灣是淪於異族而重光孤懸海外的國土，都望能有突出的表現，新的面貌與國人相見，因他的敢作敢爲，先總統 蔣公對他亦倚畀至切，私人信札，都以畏友相稱。然而，他的作風與主持閩政時如出一轍，並無顯著的差異。行政長官公署各處的主管，仍以福建的老班底爲主，計民政處處長周一鶚、教育處處長趙乃傳、財政處處長嚴家淦、交通處處長徐學禹、工礦處處長包可永、農林處處長趙連芳、警務處處長胡福相、秘書處處長錢宗起、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夏濤聲、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方學李、會計長王肇嘉、統計長李植泉、人事室主任張國鍵。陳嘉庚雖遠在天涯，聞悉之後，便滿腹牢騷，大爲不滿，立刻馳電陪都重慶當局，提出異議，

理由是與閩台一家的旨意大相逕庭，所用閩台地區的人太少了。中樞至爲重視，據聞此事經有關方面的協調，乃商邀中訓團高級班結業的閩南籍而爲當時重慶特別市財政局局長的張延哲，出任台灣財政處處長。張延哲之受知於陳公洽，便始於此時，後來且至浙江，出任省府秘書長。當初原定人選，因徐學禹已受聘於招商總局的總經理，乃調嚴家淦爲交通處處長。光復後數月，長官公署雖已積極的展開接收工作，但秘書處處長仍空懸，因原任處長錢宗起已出任救濟總署台灣分署署長，無法到任。陳公洽便將張延哲調爲秘書處處長，遺缺仍調回嚴家淦接任，交通處處長則另由任顯群繼任。教育處處長因趙乃傳回北京大學任教，改由范壽康接任。這是壽命僅一年又六個月的行政長官公署人事部署的始末。

陳公洽的處理人事問題，從福建到台灣，都不免遭人非議。留下的敗筆，不但有損他的政績，也爲當時構成了後遺症。長官公署所設的委員會，除上述宣傳、法規兩會外，尚有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由陳公洽自兼，副主任委員則由福建權傾一時的沈仲九擔任，儼然仍爲他的智囊團。李擇一因有助於陳公洽的宦途，雖被聘爲長官公署顧問，或因出於酬庸性質，未受重視。加以此老習慣於東洋的情調，不拘小節，酒家經常有他的踪跡。在陳公洽的眼裏，自然不如一襲布衣，老謀深算的沈仲九能投他之所好了。所以，李擇一對他的各種建議，縱有滿腹經綸的匡時良策，亦難獲得青睞。而且因對沈仲九的過分信賴，反而爲他自己淤塞溝通的管道。這種管道，在現代政治的運作上是很受用的，也是很微妙的，陳公洽不能稱爲此中高手，缺乏那種恢宏豁達，有容乃大的政治家風範。思想雖很進步，作法卻是極不進步的。譬如招待中央大員李文

範、居正等蒞台，地點必在台北賓館，陪客必是長官公署的處長，從不變更。有人便謔稱他如軍事操練的一二三四開步走，呆板得很。雖屬小事，顯示他的性格，在政治上，同樣的形成了不能靈活的運用。加以身兼警備總司令，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一切唯我獨尊，認為台灣從政治經濟到一切的措施，最理想的就是實踐一元化。中央軍可以撤離，只需保安隊維持秩序即足，現有駐軍，可調到大陸參加戡亂，銀行只需一家，發行當地通用的台幣即足，政府的報紙也只需一份，能代表發言即足，其他設施，無不如此。他認為惟有如此，台灣始能成為理想的天堂，不受大陸戡亂戰爭之殃。所以，合衆社的洋記者，稱他為「台灣之王」。古代以王者犯之易怒，喻為逆鱗，逆鱗雖不見於他，而他的頑固，別人不願犯之，也是事實。於是，促成他無法接近群眾，無法瞭解民瘼，更無法像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那樣的深入民間，深入基層，只能侷促周旋於辦公室的小天地中，這是他失敗很重要的潛在因素。

再說凌駕於各處處長之上的秘書長葛敬恩，陳公洽視之應如股肱，他是當年孫傳芳麾下某單位的參謀長，也是陳公洽投向國民政府的引線人物。但他的輔弼功能，並不顯著，在陳公洽的心上還不如沈仲九可以視如心腹。當時領導各界有關人員首批來台的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主任也是葛敬恩。我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分，有幸與他同機，他的表現，未免令人失望。當五架專機降落於松山機場時，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台灣士紳，還有挺著閃亮軍刀的日本兵，都在那裏列隊相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出來露面，這是什麼漢官威儀。三十四年首次在台北公會堂（即今中山堂）舉行的國慶紀念會，台北的天空，首次飄揚著中華民國的國旗，這又是多麼富有意義的時刻，他又稱

病不出，躺在基隆河畔的南方資料館（後為美軍協防司令部）休息，責任竟推到副主任范誦堯的身上，那次盛會主席，反而由外交部特派員黃朝琴來擔任。他的作為，真令人有點匪夷所思了。後來大陸淪陷，據聞腆顏投共，且早已含恨九泉。當年陳公洽既託以重任，大權在握，卻未能沆瀣一氣。

缺乏人際關係，理想成空，千古遺恨

台灣雖淪於日人的統治五十年，李鴻章於割地時，揮淚稱其為千古傷心之地，殊不知台灣的內在精神，仍然屬於中國的台灣。日人憑他們侵略的手，所能改變的只有外在的建設，與有形的風貌而已。所以，光復之初，我們無論走向民間，或走向鄉村，到處都可發現純然出於中國傳統的習俗仍在台灣同胞生活中生根，代表中國精神仍隱藏在那裏閃爍著、活絡著。然而，陳公洽並未能與這份內在的精神，融為一體，產生交流的作用。也就是說他在政府與民衆之間缺乏良好的人際關係，與台灣士紳們沒有以誠相許，推心置腹的情感。自然，也是他失敗因素之一。譬如德高望重的林獻堂，他在台灣的社會地位，當時很難找出足以相提並論的人物，如黃朝琴、林柏壽等，他都視之為後輩，也是當時從目擊台灣割讓到光復，僅存的身歷滄桑的耆宿，滿腔的愛國熱忱，且曾率團到南京向政府致敬，誰知竟未為陳公洽所重視，缺乏應有的禮遇，連最早的省參議會議長也不請此老出馬。後來林氏前往日本，久客不歸，鬱鬱以終。與林氏同樣被忽略或有失落感的人士，恐怕還有不少。當時地方士紳對祖國所懷的熱望，已至沸點，這是鐵的事實，為什麼後來竟連續

的產生失望或反感，原因何在？這是需要嚴正的檢討。陳公洽卻從未注意事態的嚴重性及其所能導致的發展，這個責任，毫無疑義的他是應該承擔的。

陳公洽在台主政未及兩年，他的功過如何？如今視之，彷彿無一是處，只有一連串的過失。憑心而論，他確愛台灣，也愛台灣同胞，確有抱負，也有理想，當他蒞任之日，便曾提出三不主義，以勉部屬，三不就是不說謊，不偷懶、不揩油，希望建設台灣成為模範省。但是，他卻徹底的失敗了，比起離開福建時，失敗得更慘，摔得也更重。此中因素，經緯萬端，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主要的他忽略這是從被統治、被壓迫而改道而走向另一民主自由的殿堂，而且這是兩種不同的制度失調的、百廢待舉的社會，處理經濟問題，尤其不能移用福建那套曾經失敗的管制老辦法。政治全面的解禁，也是忽略這裏的民主自由，還是新生的寵兒，成長尚待教育與培養，都是欲速則不達。而陳公洽卻求治心切，操之過急，只求實現理想，政府與民衆之間，始終缺乏可以溝通的管道或橋樑，民衆既無法瞭解政府所負全面更新的接收重擔，而政府又漠視民衆切身的問題在那裏，失望反感又在那裏。加以他那種剛愎自用的性格，只知一意孤行，未能與當地人士和衷共濟，培養和諧相忍的祥和之氣，共謀對策。所以，他雖勤政而不知親民，這種隔閡的鴻溝，只要存在，便會逐漸的擴大，便會像火種的潛伏著，隨時可以觸發。二二八事件，只是有人在引出導火線而已。他的理想，便成為空中樓閣，瞬息幻滅於冥冥的夢寐世界了。所以，有人說他雖愛台灣，卻不知怎樣的去愛，愛的不得其法，這是千古遺恨。

要忠恕，要寬厚，毋為親者痛

二二八事件，過去我所發表的拙文，只寫出個人親歷的感受，並未涉及當時動亂的真相與傷亡的人數，因為我認為這是歷史學家的責任。後來陸續的拜讀了不少有關的宏文，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不禁戚戚然而有所感，願坦誠、率直的提出補充說明，以就教於高明：

（一）當時傷亡的人數，官方的資料既不一致，民間更無可信可靠的統計數字，事隔四十一年之久，恐怕很難找到正確的答案。我們重挖創痕，實無多大意義。目前未到六十歲的人，都無法身歷其境，當時的真相，絕不能輕信人言，以訛傳訛。

（二）有人說傷亡多屬台灣同胞，此非事實，當時我曾隨監察使楊亮功、救總分署署長錢宗起同車至各醫院慰問療傷的受害人。這是我一生中僅見的悲慘鏡頭，台北不但是死城，也是空城，街上一片死寂，只有幾條野犬在那裏亂嚙著被人打死的屍體，屍體上沾滿鮮血，慘不忍睹。這些人都是從外地、或居處來到台北街頭，忽而禍從天降的被人毆打。當時據聞只能說閩南語或日語，都是難逃劫數，必須兩者都能，方始驗明真身，可以倖免於難。他們不死於對日抗戰，而死於光復後的台灣，言之痛心。

（三）我們必須認清的，當時的情況，無論怎樣的殃及無辜，到處有人被打，但究限於極少數人的劣行，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仍然是善良的，厭惡暴力的。他們為外省人維護安全，為外省人解決困難，或挺身而出，或暗地安排，到處可見可聞。如嚴家淦處長在台中被霧峰林家救

出險境，就是一例。而且有不少感人的事蹟，爲同胞愛在混亂中披露了光明溫暖而極可貴的一面，這是極值得欣慰的。

（四）歷史上多少流血的不幸事件，都與主政者有關，此一痛心的往事，政府當時措施失宜，論責任自然須由行政長官陳公洽向歷史交代。

我們中國傳統的美德就是忠恕、寬厚與忍讓，四十一年前的陳跡，往者已矣，多言何益。我們絕不能以此一事件，造成親者痛、仇者快。涉筆至此，不勝馨香默禱之至。

（原載七十七年五月七、八日中國時報）

聞道長安似弈棋

——兼記台灣耆宿林獻堂先生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宣佈投降後，陳公洽（儀）受命為台灣行政長官翩然來台，主持台灣地區受降典禮，並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在台執行他的長官任務。漢官威儀，名傾一時。不料未及兩周年，民國三十六年，便以二二八事件，禍起於倉卒之間，群情責難，終於黯然掛冠離開了台灣。去年我曾以〈不容青史盡成灰〉、〈後世忠邪自有評〉（見二月二十九日聯合報，五月七、八兩日中國時報）為題，撰文詳述當時身歷其境的感受，與分析導致事件發生的各種因素，並對陳公洽有所評論。如今陳氏墓木已拱，觀音山蔓草叢生，空山落寞，憑弔無人。緬懷他的一生（一八八三～一九五〇），雖蓋棺而至今尚無論定。如以治台一段經歷來說，研究歷史的人，有褒有貶，有的且讚譽他有魄力，能擔當。他的舊屬，大致都說，台灣光復後，陳長官望治心切，如將所有過失都歸咎於他一人的身上，這是不公平的。自然，也有人將一切的錯誤或失敗，都要他一人來負責，而且責以晚節不保。憑心而言，當年無論識與不識，是友是敵，都不能否定他的有守有為。廟堂之上，佩虎符，坐臯比者，像他這樣有抱負，有理想，能實幹而無視於權貴的人，確屬少見。

但是，他的剛愎自用，縱恣不羈，也是爲人詬病指責的一面。這是由於他的主觀性太強，太固執，太自信，缺乏禮賢下士，不恥下問的恢宏器度，以致不易與人溝通、不易接納群眾。從福建到台灣，他的掛冠，同樣的遭人非議。杜甫在安史之亂以後，面對著劫後淒涼的長安，曾有「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的感傷詩句。如以弈棋喻世局，陳公洽當時在台灣便曾錯下了幾著棋，如今思之，還不是同樣的令人感慨不已。

這些錯下的棋，我在陳公洽離台後所撰〈台灣三年〉（見三十七年十月廿五日上海大公報）一文，曾經指出治理台灣必須認識台灣，就是對此而言。認識最重要的就是溝通管道，而陳公洽在台灣不但缺乏溝通的管道，也缺乏輔導的管道。輔導，乃是指對台灣同胞所缺的民主政治的認知，未能作適當的輔導。我們都知道民主政治，絕非一蹴可幾，發展必須有它的歷程。群眾必須透過長期政治教育的洗禮與涉練。當時大家都從被統治的殖民地跨進了民主的藩籬，不懂民主的定位在那裏，真諦又在那裏，這是有賴政府所施的教育與輔導，始能帶領他們趨向正途。但是，政府無此之圖，也無此具有前瞻性的概念。缺乏輔導的負面，就是放縱，任其所爲。此中尤以不負責任的報紙言論與報導，為害最烈，對於缺乏判斷的基層群眾，最具有蠱惑性與破壞力。當時那種跡近潑婦罵街的評論，風格極爲低劣，從無出於肺腑的真誠之言。有人認爲這種潛意識的反抗，是殖民旗幟下久遭壓榨之後，失去理性的變態行爲，雖美其名爲言論自由，却像一把燃燒著的烈火，燒到那裏，禍到那裏。政府任其到處燃燒，從未加以約束。二二八事件，盲目無知的群眾，背後便被這種火在燃燒著。這是我在前兩文中所未提到的。所謂水可載舟，亦

可覆舟，我們所見的就是覆舟的驚濤駭浪。

(二)

至於溝通的管道，一為與機關團體之間的有形管道，未能充分的運用。一為與民間領袖之間的無形管道，都因未能消弭隔閡，觀念偏差，鑄成大錯。前者管道有三：一為前閩台監察使現任總統府資政楊亮功方面，一為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故主任委員李翼中方面，一為台灣省參議會故議長黃朝琴方面。楊亮功望重學壇，老成謀國，還是相當受陳公洽的尊重的，但楊氏多次所提關心民瘼的興革意見，並未被接納。後來楊氏或因對此失望，或因瞭解他的固執性格，空言無益，便不再以獻言自貶。其次李翼中，他在陳公洽的心目中恐怕僅屬後輩（當年先總統 蔣公對他稱為畏友，故周總長至柔亦以晚稱，自高可知）。黨政之間，如能同心協力，患難相扶，自然有裨省政的推展，事實則不然，陳公洽唯我獨尊，一切冀以一元化，於是形成南轅北轍的局面，極不協調。執政黨之在各省設黨部，當初取向並非專為擴展業務，亦望以此能為地方政府產生輔弼與制衡的作用。當時黨政各持己見，視為異路，遑論以黨輔政。陳公洽離台後，李翼中則改任為魏道明主政的省府社會處處長。至於黃朝琴，雖為陳公洽所提攜，榮登省參議會議長之席，却以後輩自居，如欲真正能為台灣同胞的喉舌，下情上達，似乎還是渺不可及。所以，政府與民間的溝通管道，光復之初，始終如有一道迷惘的網存在著。這是需要突破，黃朝琴並未以此自任。

(三)

再說政府與民間領袖之間的隔閡，癥結在對台灣光復以前實際情形缺乏完整的資訊與深入的瞭解。如果認為曾受日本重視或任用的人，都是視如漢奸，這是有失公允。這種觀念，只有對過去身歷其境的人造成傷害，而對政府也只有憑添無謂的糾紛，於事無補。須知日本統治五十年，這是清廷喪權辱國的結果，與台灣同胞何尤，台灣同胞生於此，長於此，不可能不與日本政府接觸，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實。所以，三十五年光復致敬團前往南京致敬時，團中有識之士便曾向政府陳情，聲稱懲治漢奸條例並不適用台灣。黃朝琴雖以議長之尊，對此似未能為台灣父老化解政府所存在的隔閡與偏見。於是，如台中望族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他雖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年高德劭，台灣同胞奉之如泰山北斗，仍未為政府所借重。追溯日據時代，林氏便與梁啟超、戴季陶諸氏都有往來（晤梁於一九〇七年，晤戴於一九一三年，都在日本），梁氏於一九一一年來台，就是住在台中林家的萊園（嚴前總統靜波為台灣長官公署財政處處長時，二二八避亂亦在此），感懷國事，梁氏曾賦詩以見志。梁、戴二人晤面雖相隔五年，但他們對台灣同胞被壓迫所持的意見，則為相同。都認為當時祖國尚無力量協助台灣爭取自由，台灣同胞不宜輕舉妄動，以免無謂犧牲，不如先與日本顯要厚結，藉以牽制台灣總督府，勿使台灣同胞受苦。所以，林氏從事民族運動，始終秉承溫和理性的路線，這是與梁、戴二人的建議是有關的。這種苦心，並未為陳公洽所察。回想早年那些領導人物，他們雖具有民族情操，如不顧現實情勢，堅欲與日人決絕，其結果恐怕只有像梁、戴二人所說的無謂

犧牲。所以，光復後絕不能憑日據時代的一切取以褒貶人物，更不能視同漢奸。林獻堂在光復後有兩件事頗為不滿：其一，三十五年，由丘念台奔走所組成的台灣致敬團，前往南京致敬時，陳公洽反對由林氏率領，理由是他曾任日本貴族院議員，後來允以不任團長，始告成行。其二，同年成立台灣省臨時參議會，原為政府重視民意的德意，不料議長一職，却捨台灣眾望所歸的林獻堂，而厚植黃朝琴（一八九六～一九七二）。黃氏當時為外交部台灣特派員，並受命出任首任台北市長，未及半年，因與我同機於三十四年十月五日抵台，相知頗深。他雖愛國愛鄉，學養與領導才能皆為我所敬佩，只可惜離台太久，一向都在外交部任職，過去那段悠長的歲月，對國家雖有貢獻，而在台灣却是一片空白。台灣同胞當時不免因當地碩宿未被重視而產生失落感。此事據聞係出於長官公署民政處處長周一鶚的安排。

(四)

三十五年春，中央社台北分社成立，林獻堂關心政局，知道昔日日本同盟社的業務，都由中央社賡續，認為中央社可以向政府獻言，於是，我以分社主任的身分，曾被邀宴於現在博愛路稱為「麗都」的日本餐館。他長我三十多歲，我以長者視之，因不能說國語，一切都由辜偉甫代為翻譯。後來我也曾邀偉甫前往台中霧峰拜望，每次談話，都見此老意興風發，頗有總攬群倫的氣概，愛國情懷，溢於言表。他有若干與建設地方有關的建議，希望我能代為向陳公洽轉達。我則希望他能常駐台北，因為台北為政治中心，冠蓋雲集，不致遠離各界人士。如論年齡資望，

他確爲台灣光復後身歷興亡僅存的耆舊，清廷割台時，他已十五歲。所以，如板橋望族大老林柏壽（一八九五～一九八六）與黃朝琴諸氏在他的眼中無疑的還是後輩。如此老成碩望的人物，長官公署如視爲與漢奸同流，對他實爲莫大的侮蔑。幸而這層陰霾因長官公署的改組隨而消逝，魏道明主持省政時，便聘爲省府委員，並任命爲台灣省通志館館長。陳辭修繼任省主席，仍聘爲省府委員，並兼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當時大陸危急，台灣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他的動態，頗爲各界所注目，時局既不穩定，對他便有各種出於不瞭解的揣測與謠言。雖不像范仲淹所說的憂讒畏譏，但關懷時局，前途未卜，心情的確相當的複雜苦悶。於是，三十八年秋，便偕觀光團前往日本，自稱治療頭眩宿疾，從此久客不歸。滯日期間，並以居處自署爲「遁樓」，以明心跡。政府方面則仍不斷的派人或馳函致意，望其早歸。如三十九年吳國楨主持省政時，仍聘爲顧問，並託人勸說回台。台灣銀行前總經理瞿荊洲訪日時，亦往勸駕。四十年，行政院院長陳辭修與吳國楨都曾去函敦促，嚴靜波、彭孟緝、楊肇嘉諸氏到日本時，都曾先後前往勸說早日回台。是年，林氏關心國事，且曾上書先總統 蔣公， 蔣公在覆函中語多懇切，尊稱爲先生，盼其早歸。但都未為他所接受，於是，無論在台、在日都有各種的流言，毀譽互見，也有對他是中傷與不瞭解的。

董顯光（一八八六～一九七一）出使日本時（一九五二～一九五六），爲期朝野團結，共濟時艱，也曾希望促使林氏早日回台。當時經過未爲外界所知，特爲追記在此。時在四十二年夏，董氏回國述職，其老友中央社故社長蕭同茲，設午宴於寓所爲他洗塵，同席有連震東、魏景蒙、辜偉甫及我，共六人。董氏爲新聞界前輩，也是我的證婚人，席間談到

林氏在日情形，很像台籍人士在日的據點，若干不滿政府或主張台獨的人，與他接觸頻繁，而且因觀點的偏差，造成他對政府的隔閡與誤解。董氏愛國情殷，認為應該勸他早日回台，且以勸駕的人，林柏壽為最適當的人選。因知與我有親戚的關係，便邀我約定時間同往林府拜望。行前且問我怎樣的稱呼，我說我是晚輩，以「四叔公」稱之。不料此老不但風趣，且極謙虛，也跟著稱四叔公。可惜此行並未如願以償，因為林柏壽認為林獻堂滯日不歸，心情孤寂，雖關懷鄉土，關懷台灣政局，但在內心却充滿了解不開的失望情結，鬱鬱寡歡，有些流言，並不是他願意回台解釋，或向社會交代。後來行政院故政務委員蔡培火又銜命赴日勸駕，林氏雖以親筆函覆當時總統府張秘書長岳軍，表明心胸磊落，但仍未回台。不久，他的胞弟次子相繼去世，客老異邦，情所不堪。四十五年，便以老病在日作古。此時張曉峰（其昀）已出長教育部，為紀念林氏一生富有民族思想，特建獻堂紀念館於台北市植物園內的南海學園，至今儼然尚存。惟館名已無人能識，因久為孔孟學會等機構所借用，人事滄桑，空留浩嘆。

追溯陳公洽當初錯下的幾著棋，未免為歷史留下了無可彌補的遺恨。如果台灣光復之初，林獻堂與其他的地方士紳，政府都能加以禮遇，重視他們對桑梓所作的貢獻，借重他們的人際關係與才智，為政府所用，共同促進台灣的建設。台灣所見的和諧團結，恐將早有另一番祥和的氣象，林獻堂可能便不致自我放逐，老死異邦。歷史始終未能為人間寫下完整的光彩一頁，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歷史中如何的汲取教訓與經驗，這是我們後來的人應有的省思罷。

(原載七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時報)

誰知明月照溝渠

——二二八事件四十五周年感言

歷史雖不會重演，但歷史所帶來的教訓，有時真令人有椎心瀝血之痛，因為那是無法挽回的千古遺恨，留與後人的也只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感嘆。二二八事件，就是一例，這是四十五年前遙不可及的往事，當時很像天空突然飄來的陰雲，一陣狂風暴雨以後，為人們留下了無可彌補的災難，至今仍存在著一團模糊不清的陰影。當此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已告結束之際，感懷今昔，想到這團模糊的陰影，以我這樣身歷其境的人，很想為這團陰影再作一次的釐清。

談到二二八事件，陳公洽（儀）似是千夫所指的歷史罪人。政府為什麼會任命他為台灣行政長官，擔任光復台灣的大任。追溯當時的情形，如果瞭解實情，並不意外，因為以陳公洽的經歷來說，似乎很難找出比他更為適當的人。他是早期留日成績優異，不但深諳日本政情，也是與日本政界頗多舊識，民國二十四年且曾應台灣總督中川健藏之邀，來台參加治台四十周年博覽會，對台亦有瞭解的人。在當時政府高層次的袞袞諸公中，朝野都一致認為他是有理想、有作為與有擔當的人。但是，卻忽略了他有剛愎自用，主觀性極強的一面。當他擔任福建省主席的八年中，雖因僑領陳嘉庚強烈反對他的財經政策失當，政府為求順僑情、重團結而離去，談福建的建設，包括反對的人在內卻無法否定他在福建所

留下的功績與貢獻。所以，當政府發表他主台的任命時，各界都寄以厚望，這是事實，不料為時僅一年五個月，便以二二八事件黯然掛冠而去，各界都感到非常的驚愕與意外，這也是事實。

在他主台未滿兩年的時間中，何以由極端的希望而變為失望，何以由熱情的擁戴而變為排斥，最明顯的失敗，今日思之，有些因素值得我們的省思：

第一，一元化的理想，遺恨無窮，——陳公治重視科學，也重視民主思想，在當時政府的官員中還算是開明進步的。但是，他主政台灣卻一味的講究一元化，似乎與他的思想有些相悖。在他的心目中，台灣無論什麼機構，最高的主管，當然就是長官公署，他就是決策人。除了兼任警備總司令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之外，任何中央機構也希望歸屬於他的指揮。自然，這是無法兌現的雄圖大略。所以，他不願意中央機構在台設立分支單位，從駐軍、到銀行、到傳播媒體，他都希望貫徹他的一元化理想。因而，當三十五年先總統 蔣公蒞台移駕日月潭時，詢問他台灣的駐軍可否調遣大陸參加戡亂戰事，他便滿口答應可以全部調走。雖然他有感於當時駐軍軍紀配備都不如理想，未為台灣同胞留下良好的印象。但是，他很想培養台灣的保安部隊，用以維持治安，也是事實。無疑的，這是一項錯誤的估計，它的後遺症，就是導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政府捉襟見肘，無力來維持地方的治安。又如當初交通、農民銀行等機構欲來台設立分行，亦未為陳公治所同意。中央日報當時在各省都設有同樣的機構，在台幾經波折才勉強的改以中華日報名義與讀者見面，而且地點不在台北，設在台南市還是借用新生報的設備的。他的理

想，銀行只要台灣銀行一家便夠了，報紙也只要省營的新生報一家便夠了，其他機構，亦復如此。陳公洽這種固執的觀念，或許出於求治心切，希望台灣的政績，不受當年大陸混亂情勢的影響。但是，結果卻是負面的，他成爲一個獨夫，獨行獨斷，被合衆社記者諷稱爲「台灣之王」，長官公署也被認爲是令人可憎的日本總督府的替身。這些誤解，自然都由陳公洽的作爲有以致之。再說，如閩台監察使台灣辦事處，執政黨省黨部等機構，陳公洽基於一元化心態的作祟，都持以距離，無法與他們合作爲建設台灣而努力，更談不到臻於水乳交融的境界。監察使楊亮功老成謀國，對光復後的台灣應興應革事宜，雖曾多次向陳公洽獻言，陳公洽始終以言詞敷衍，而不見之實際的行動。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對陳公洽來說，還是後輩，他亦未能充分運用這樣的管道參與省政的建設。像這樣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個性，怎得政通人和，怎得不失敗。

第二、治閩前車之鑒，未加深省，——陳公洽治理福建雖有功績，但並不是光榮的引退，這些失敗教訓，他並未加深省。他在福建時，施政的重心，很多措施都是出於徐學禹、沈仲九兩人的意見，財經政策的失當，就不能不歸咎於徐學禹的策劃，後來福建各界的反彈，成爲他掛冠的主要原因。但他在主台首次所發表的各處主管名單上，徐學禹（公署第一任交通處處長）的名字赫然仍在，後來因陳嘉庚等人的反對，指稱閩台一家，政府主管豈能仍以治閩的老班底，而無一人是閩台人士，徐某才到招商局去當總經理。我們如加細察，台灣光復之初一切的財經措施仍然隱約的留下了徐學禹的影子。而陳公洽在台爲人所詬病，財經政策的失敗，實爲其關鍵所在。至於沈仲九（公署顧問），雖居幕後，很多決策，此人還是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陳公洽卻深信不疑，認爲是智囊

團首屈一指的人物，不但主台，後來主政浙江，亦復同出一轍。據聞陳公洽所定罪的局部和平，就是沈仲九的策劃。我們讀左傳都知有「慶父不去，魯難未已」之語，他在陳公洽的左右不但不去，反而陷陳公洽昧於大義，成爲歷史罪人。識人之難，往往鑄成千古遺恨，能不感慨。

第三，重視民意而不知民瘼，——陳公洽當初愛台灣，也愛台灣同胞，從他的望治心切，當無疑義。但結果適得其反，兩千多年前，管仲所說的：「政之所興，在順民心。」陳公洽在這個「順」字上表現得很差，他雖重視民意，但是遠離民衆，民衆需要在那裏，苦痛在那裏，他居高樓之上，築了隔閡之牆，牆外正確的資訊，全然不知。部屬既乏忠直之言，他自己又剛愎自用，固執成性，治閩那一套辦法，早已失去了效用。民間有志報國的知識份子，及當地具有影響力的人士，都未獲得應有重視，而社會基層所暴露的失業、物價高漲、生產停頓、物質貧乏的一連串問題，又缺乏解決困難的對策，民怨沸騰，政府似乎只有坐視其變，從未聞加以疏導或溝通。於是，由希望變成爲失望，由擁戴變而爲排斥。終於涓涓之水，匯而成爲大川，氾濫成災，無可遏阻。「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翻閱歷史，古今無不如此。

第四，言論自由，反而對政府造成傷害，——台灣社會從被統治到民主自由，這是有一段要走的路，陳公洽只知讓人民享受民主自由，有異於被日本統治的生活，卻忽略了民主自由的真諦應先讓人民去瞭解。所以，民間報紙言論的自由，政府很少加以約束。這些言論，以正面來說，可以瞭解大衆的心聲，作爲施政的參考，自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但在負面，這些言論，如爲具有野心者所操縱，造成人民對政府的離心

力，自然是十分堪虞的。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主管雖為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但相當放任，絕不像日據時代的嚴加管制，這種現象是台灣同胞前所未見的。於是，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只見壞的一面，不見好的一面，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這種傷害，與當年大陸政府被反對者的誣蔑宣傳，所產生的錯覺，極為相似。因為對政府已存有不信任的心理，公權力自然受到了輕視。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為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綜合以上所述，陳公洽是行政長官，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自然應向歷史負責。這種不幸事件，一言以蔽之，還是與他的剛愎自用，阻塞溝通疏導的管道有關。光復後的台灣，這是舉世矚目的地區，從大陸到台灣，從廟堂到社會各界，無不對他寄以殷切的期望，而他的作為，無論出於怎樣的愛台灣、愛台灣同胞，還是令人失望。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當他離台的前夕，曾約我去公署作了近兩小時的長談，結論是「政治太寬，經濟太緊」，因此演出這場悲劇。記得三十七年我在上海大公報撰文，慨乎其言的指出「治理台灣，須先認識台灣」，所感亦實在此。昔人詩云：「本待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實為當時民心的寫照，徒留後人無限的遺恨與感嘆。

當年先總統 蔣公雖遠在南京，但對事件發生後，十分的關切，接獲各方報告後，決定派軍來台，並以手諭陳公洽：「請兄負責應嚴禁軍政人

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當時陳公洽雖飭屬徹底執行，然事實上其部屬仍不免陽奉陰違。如今政府爲安撫所有受難家屬，消弭歷史陰影，一年前，行政院秉承李總統登輝先生的旨意，特邀學人及有關人士組成研究小組，以一年時間廣向海內外蒐集有關資料，調查當時實況，撰成約一百萬字之長篇報告，公之於世。並由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決定成立建碑委員會於台北市建立紀念碑，由邱資政創煥爲召集人，受害人林茂生教授哲嗣林宗義博士爲副召集人。國家元首重視之情備矣，其見於歷史意義豈止於賠償致歉所能比擬？我們希望從此台灣所見的是一片清朗的海闊天空，充滿祥和之氣。（本文作者現任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召集人）

（原載八十一年二月十八日中國時報）

初履斯土

(一)

今年十月五日是我到台灣四十周年的紀念日，回想當時的情景，無不歷歷在目。

台灣從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戰爭以後，忍辱割讓日本，以迄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勝利，前後共歷五十年。割地之初，李鴻章曾經老淚縱橫，沈痛地認為這是傷心之地。像這樣淪於異族的統治長達五十年之久的祖國山河，因戰勝而重入版圖，誠然為多難的中國歷史，憑添了光榮的一頁。

當時我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分，搭乘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借用美軍的專機，由重慶先經上海而後直飛台北。五架專機共乘五十多人，都是首批進入台灣的人員。一路上撥雲排空，橫跨了半個中國，從浩蕩的長江，越過長江兩岸的重巒疊嶂，然後飛越波濤澎湃、一望無際的東海。每人都在翹首以待的擁著滿懷的振奮情緒，這不是杜甫感嘆的「劍外忽傳收冀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劫後餘生，而是涵蓄著雄壯、激昂、豪邁、歡躍，與充滿希望的多種情愫。彷彿置身神遊於那個光芒萬丈、舉世矚目的開國年代。那種境界，真為勝利後千萬人所嚮往。

當台灣的土地在微茫的雲層下逐漸地出現時，我們都如對一個音訊隔絕

而從未晤面的親人，乍然相遇，不禁淌下熱淚。

(二)

台灣，遠離祖國五十年的台灣，終於在我們的眼底出現了。

當我們的專機在台北的松山機場降落時，剎那之間，我們的感覺，與初履日本國土沒有什麼差異。滿眼的日文，滿耳的日語，大街小巷的木屐聲。日本的殖民政策，雖將台灣經營成爲日本國土的一部分，但同樣的也像他們的軍國主義爲亞洲帶來了災難，殘酷的戰爭，便在這裏遺留著怵目驚心的劫後創痕。我們下機以後，只見遍地瓦礫，滿目荒涼，萬目睽睽的總督府，僅存殘垣斷壁。那個被台灣同胞視爲劊子手的警務局，也被盟機炸毀，已經夷爲平地（即今總統府前廣場）；多少建築，都是百孔千瘡。

我到台北後，首先須突破生活與言語兩道陌生的屏障，處境雖如孤軍奮鬥，但時時未忘我所肩負的重擔。因爲全國朝野都在關心著台灣，全國朝野都在等待著我所報導的台灣消息。當時我未攜帶發報機，也沒有電務人員隨行，幸而事前已獲空軍的支援，一切電訊都可由張廷孟所率領的先遣人員在松山所設的電台轉發到重慶，再由重慶空軍總部送到中央社總社發播。所以，我到達台北後的次日，全國各報便已迅速地刊出我所報導的電訊，而國內的親友們也獲知我已到達睽違五十年的台灣了。

當時除積極的報導台灣光復的各種動態外，尚有兩項任務肩負在身：一爲接收日本同盟通訊社台北支社，一爲籌備成立中央社台北分社。同盟

社雖經行政長官公署決定由中央社接收，但該社舊址已被盟機炸毀，蕩然無存，其地即今博愛路東方大飯店的對面。所以，除了數十名員工尙待遣散之外，已經名存實亡。員工中後來有台籍的雷樹水、蔡遠烈等五人，也加入了中央社外勤、內勤的行列。當時幾經波折，始覓得位在後來西寧南路二十號的當時木材會館，權充辦公處所。翌年（三十五年）二月廿五日中央社台北分社成立於此。大陸淪陷，中央社總社遷台，也是設辦公處於此。如今，樹水兄也已白髮盈頭，歲月催人，能不令人感慨。

（三）

當時前進指揮所人員到達後，次日便在總督官邸（即今台北賓館）舉行第一次富有歷史意義的升旗典禮。至十月二十五日，便在台北公會堂（即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從此台灣正式重入中國的版圖。典禮隆重而簡單，台灣耆舊如林獻堂先生等都被邀參加。

當時的台灣，慶祝光復到處都有如火如荼的高潮，大街小巷，人潮如湧，有的扶老攜幼，爲重見漢官威儀而手舞足蹈，有的慨話當年，爲復睹故國旌旗而感激涕零，物質雖缺，仍可看到到處都在掛燈結綵，與富有中國色彩的牌樓。國旗更多，大的、小的、掛的、豎的、手裡擎的，也有誤被倒置的，與各人臉上的笑容，相映而成的普天同慶的畫面，比什麼精彩的報導都來得真切而動人了。其他如舞獅、高蹺、歌仔戲、傀儡戲，也不時的在鑼鼓聲、爆竹聲、歡笑聲中交錯的出現，任何慶典，無此盛況。後來有人說，光復之初，有兩種行業，大發利市，一是爆竹

商，一是國旗商。國旗在日據時期是無人敢出售的，相反的，此時的日本太陽旗，已經黯然無光，被人不屑地淪為包袱等物的代用品了。

不但如此，街頭巷尾，只要有書店或文具店，都可以看到翻印的論語、孟子、唐詩三百首、千家詩、幼學瓊林之類的通俗古籍，大量地出售著。日據時期，中國古籍，台灣雖有不少人在熟讀著，但不是公開的。而今台灣重光，這些書籍便像撥雲見日似的陸續出現了。雖以限於物質條件，紙很粗，錯字也難免，但台灣同胞嚮往祖國文化的熱情，確是十分可貴的。此外，到處還可看到國語傳習班的招牌林立，這種情景，頗與今日滿街的英語補習班相似。當時很多不稱國語，而稱北京話。台灣同胞雖有不少熟讀中文的人，他們僅限於閱讀或寫作，講是很生硬的。光復後，他們無分男女老幼與貴賤，朝朝暮暮，都在孜孜不倦地學習著。這種精神，自然出於對祖國的向心力。

所以，日本雖在台灣統治了五十年之久，他們所能改變，只憑炫耀於外在的形式。台灣同胞內在的民族精神，就與他們身上所流的血液一樣的是永遠無法改變的。譬如過去日人都稱中國為支那，隱含輕蔑之意。當我在日人尚未遣散時去參觀小學，便發現有學生對日籍的教師提出嚴正的抗議。他說：「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是我們，你們現在不能再稱我們什麼支那了。」那幾句話，真是令人感動，擲地有聲。

當時台灣各城市被盟機轟炸之後，市面都很蕭條。台北如後來的博愛路、衡陽路等地區，為日商所聚居，尤其被炸得十室九空。各地物質都是十分的貧乏，有些日用品雖能勉為應市，品質都是非常的低劣。其中最難見的、最缺乏的是銅鐵之類所製的用品，可能因應戰爭所需，已被

日人搜刮殆盡。煙酒雖有公賣局供應的產品，光復前的品質，也極為低劣，尚不如大陸各省的土產。只有台灣所盛產的糖與各種不同的水果，點綴在冷落的市面上，光彩奪目，為初履斯土的人帶來了一些新奇感。服裝方面，男士們高級一點的只需黑白兩套西服便可在四季中周旋於酬酢之間，較之大陸寒暑分明顯見簡便得多了。女性也是簡樸可喜，幾套洋裝，足夠更替。她們都有刻苦耐勞的美德，不少因家累而出外謀事。

街頭巷尾另有一種特殊的劫後景觀，就是到處都有日人所擺的舊貨攤，他們都因台灣光復，無法繼續居留，政府必須以日僑的身分遣送他們回國。而且所攜的財物，也是被限制的。所以，他們都需儘量地變賣其所有。那些舊貨攤，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都是被塵封已久，而且已失去原有的光彩的舊物。前面守著沈默的老人或婦人，其中不乏是身世淒涼的陣亡軍人的遺孀，他們只知變賣，也不知其應有的價值。因而若干曾被珍藏的中國書畫，也盲目地被淪為論斤估價的廉價品了。這是日人窮兵黷武所留下最悲慘、最辛酸的陰影。他們變賣其所有以後，便陸續地被遣送回國。他們雖是戰敗國的國民，但其所表現的守法精神，卻不能不令人加以重視。其中如一受僱為傭的老婦，當天便須遣送回國，但是她仍能如平時一樣的為主人做了早餐，然後黯然告別。其事雖小，卻顯示他們心目中所矜持著的守法觀念。又如我在基隆看到他們在風雨交加中列隊登輪，臉色凝重，一語不發，秩序仍然不亂，所攜的財物，既不超量，也沒有私藏，更沒有吵吵鬧鬧或亂哄哄的現象。如今，他們終於在戰敗的廢墟中自力更生，振興他們的國家，誰也不再蔑視他們。這是關係一個民族有沒有組織能力的問題，也是國民教育水準的問題。逝者已遠，言念及此，願我們國人都能自加深思與反省。

(四)

當時從大陸來台的接收人員與台灣同胞相處的確如水乳交融，十分和諧。只要接收人員足跡所到之處，他們無不竭誠的歡迎與接待，那種出於內心的真摯情感，坦率而親切，如逢久別的親人，或問字，或學習國語，或探詢大陸的情形，雖因辭不達意，表現得木訥一點，但從來沒有隔閡。最有趣的統計，就是光復後的一年，彼此通婚的人數，根據新生報的報導，已經超過了五十年來台灣小姐下嫁日人的總數。這些男士，多數是政府年輕的基層人員，他們不一定都能說閩南語，但都樂於學習。如今，他們的兒子，屈指也已經早過而立之年了。

日據時期，日人在台的一切措施，本質都是以殖民為主，自然逃不了殖民地政策所賦予的桎梏。所以，台灣同胞的生活，沒有自由，沒有平等，只有歧視，只有管制。他們與日人界限分明，純然是屬於兩個世界的人。光復後，政府當局求治心切，希望台灣的政治是民主的，是開放的，社會是自由的，是平等的。舉凡殖民地政策所留下的各種約束，一律予以廢除。最明顯的，如日人過去拘禁在火燒島（即今綠島）的囚犯，全部釋放，恢復自由。如為改變台灣同胞對政府的形象，一掃衙門的陋習，行政長官公署先為表率，不設門警，可以自由出入。又如生活必需品如糧食等物，廢止日人所設的管制，可以自由買賣。當時的反應，我們無可否認的是：台灣同胞因受日人五十年的長期統治與壓榨，對光復後的政府無不寄以過高的期待，慶祝光復所表現的高潮，便是出於積鬱過久的情感傾洩，以為從此政府是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可以情感化的寄託於政府，什麼疑難也不會再存在或產生了。這種現象，自然談

不上對民主與自由的認識。殊不知真正的民主與自由，都有它的範疇與真諦，決不是一蹴可幾，立竿見影，而是需要先經過政治教育的薰陶，與適當時期的培養、涉練。也不是像失去母愛的孩子，一旦回到母親的懷抱，便可以任性的撒嬌。然而，當局既未注意到民主與自由在台灣都是新名詞，太缺乏基礎，對於那些存在於大眾心目中不正確的觀念與幻想，又忽略疏導或糾正的工作。加以當時大戰之後，台灣所見的是日人留下破損的殘局，經濟尚未穩定，便已面臨百廢待舉，政府的對策，自難迅速的收效。這種處境，台灣同胞並不是很瞭解的。於是，因觀念的偏差、幻想的難以實現，未免就產生各方的責難，演變而成爲希望愈高，失望愈深。所謂「二二八」事件，便是在這種夾縫中激盪而成的風暴。因而建設台灣爲三民主義模範省的理想目標，也像突遭一陣風雨的侵襲，建設既未可成於朝夕，一切燦爛的遠景，其實現也只有待於後來踵其事者的努力與完成了。

(原載七十四年十月五日聯合報)

多少蓬萊舊事

台灣光復，今年是四十五周年，而我第一步踏上這塊土地，卻比台灣舉行光復典禮早了二十日，——這是因三十四年十月五日，便由重慶先偕前進指揮所的首批人員搭機抵台。遙想當年的情景，最令人難忘的還是台灣同胞慶祝光復的熱情，如波濤澎湃的掀起了萬丈高潮，翻騰整個台灣。像這樣多少蓬萊舊事，只可惜無人能為歷史作見證。茲值紀念光復節之際，因特追記數則，其意不只為一澆懷舊的塊壘。

台灣的國旗故事

我們國旗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抗戰之初，如上海女童軍楊惠敏（已在台病逝），游過蘇州河，向困守四行倉庫的國軍獻旗，與後來從淪陷區逃到後方的人，當他們第一眼看到國旗時，都是流著熱淚。

台灣從日據以至光復，台灣的天空，五十年來，從來沒有中國國旗的飄揚。日本投降以後，台灣的天空，第一次飄揚著國旗，就是我到達台北的次日——三十四年十月六日的清晨，地點是在當時總督官邸，即今台北賓館，主持升旗典禮的人是前進指揮所副主任范誦堯將軍。升旗在大後方只是生活中例行的簡單的禮儀。但在國土重光後的台灣，便有更深遠的意義了。當時牆外重重疊疊的圍滿著台灣同胞，他們仰望著國旗冉冉地升起飄揚於蔚藍的天空，正如大旱之見雲霓，幾至熱淚滂沱。趙子

昂在宋亡後沈痛地吟出「中原父老望旌旗」的詩句，就是同樣的寄以故國之思的情懷。

台灣同胞因熱愛祖國，當時他們共同所能表達的就是爭懸著國旗。國旗對他們是陌生的，但他們愛國旗，無論在那裏，都在爭先恐後地掛著、豎著，也有是倒懸著的，橫扣著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有人估計，台灣光復之初，有兩種人都在發慶祝財，一種是鞭炮商，一種就是販賣國旗的商人了。至於昔日曾經充滿敵意的日本太陽旗，到此都已棄如廢物，也有人權充為包袱的代用品。不料四十多年後的今日，竟有人在焚燬自己的國旗，能不令人感慨係之。

台灣首次慶祝國慶

三十四年台灣首次慶祝國慶紀念日，離受降典禮尚有半個月，慶典是在台北公會堂（即今中山堂）舉行，代表政府的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後來長官公署的秘書長），稱病未出，主席却由外交部特派員黃朝琴擔任，有點匪夷所思。黃氏致詞後，便由接管台灣新報，後來的新生報社長李萬居講話，他先用國語滔滔不絕地講完了光復的大義後，怕人聽不懂國語，又自任翻譯以台語複述一遍。李氏的國語頗具鄉土風味，聽來與台語同一調調，於是大家彷彿聽了兩次相同的講話，一時傳為趣談。

台灣日據時代的總督官邸，門禁森嚴，台灣同胞自然到此不能越雷池半步。日本投降後，對面的總督府已被盟機炸得面目全非，在落日的餘暉下，早已黯然無光，於是台灣同胞也大可以登堂入室了。

我們首批抵台人員，因都出入於總督官邸之門，台灣同胞便抱有一睹漢官威儀，以迎王師的心情。此一地區，經常遂有一群一群的人影聚集著、盤桓著。國慶日之夜，我們原在那裏預定二十桌酒席招待地方士紳，不料圍觀的人群，愈來愈多，後來到處都是人。我們幾乎被擠得無立足之地，只好胡亂地果腹，才結束了這一次的盛會。這種情，這種熱，只有沸騰著國家民族之愛，始能見之。

台灣同胞的嚮往祖國，尙不止此。當時男女老幼競相學習國語，以能說國語爲榮。街頭巷尾，滿掛著國語或北京話補習班的招牌。這種情形，多少年後，雖替之以英語、美語的補習班，但論熱度，後者夾雜著功利的成分，顯然不如前者單純的出於至誠的愛國熱忱了。

黃朝琴的市長與關防

台灣光復後首任的台北市長是當時外交部特派員黃朝琴，受命之初，台北如在廢墟，百廢待舉，日人稱爲市役所的市府舊址，已爲行政長官公署所徵用（即今行政院）。公署理應設在總督府的舊址，無奈燬於轟炸，僅存斷垣殘壁而已。所以，黃氏第一件大事，就是找尋辦公地址，幾經奔波，才搬進了長安小學舊址，從此市府在那裏辦公至今已歷四十六年的寒暑。

當時市府並無上級頒發的印信，於是市長大人便臨時找人去刻了一顆大關防，其狀較長官公署的印還要大一些，大概是不合規定的。這顆關防歷盡滄桑之變，也算是歷史文物，不知現在何處。黃氏蒞任之日，容光煥發，最先登上門前陽台，升起國旗，迎向朝陽，頗有一番新氣象。當

時我很榮幸的忝爲市府第一名的賀客。

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台灣省參議會成立，黃氏出任首任議長，市長便由游彌堅接任。所以，他的市長，前後未及一年。對台灣的貢獻，當然以其主持省參議會及省議會協助政府的建設為主。至於後來將自己的住所擴建爲國賓大飯店，又是生活的另一面見其光彩而已。

台灣禮失仍可求於野

日本統治台灣，在本質上，採取的是殖民政策，奴役人民，攫取物質。光復之初，台灣到處雖充滿著日本的情調，滿街是扭曲的日文招牌，與椰子樹下單調的木屐聲。但從深處來看，日本給予台灣的止此而已，能搬走的也只限於一些物質，台灣同胞的心，怎樣也是搬不走的。

以物資來說，戰時必需品的匱乏，不見於市面，只能從台灣同胞生活中去觀察。而且於市面最顯著的如銅鐵之類，如菜刀、鐵釘都已不易購得。當時大陸各省，雖同屬戰時，却未被搜括殆盡。

我們初履斯土，彷彿進入日本國土，但如到各鄉鎮或深入農村去走一趟，感受便完全不同了。我們無論到那裏，彷彿此身就是在福建或大陸各地的鄉間或農村。因爲看到那些勤勞樸實的居民們，從他們屋內佈置與所供奉的祖先牌位、神像，以至風俗習慣，無一不是似曾舊時相識。那種真誠無偽，端莊有禮的言談舉止，更令人想到「禮失求之於野」的一句老話，誰信這是被異族所統治的土地。

日本戰前對中國慣以「支那」相稱，這是含有輕蔑之意。宣佈投降後，

我曾先去參觀若干學校上課的情形，學生中便有人反抗，認為我們已是戰勝國堂堂的國民，豈能再以此輕蔑口吻相稱。

記者風光與同盟社的爛攤

台灣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首批抵台的人員中，我們新聞界共有五人，計重慶大公報李純青、上海大公報費彝民、中央日報楊政和、掃蕩報謝爽秋與我，我是中央社台灣特派員。五人中以我最為年輕，如今其餘四人都已先後作古，只有我一人健在，有時真有「此身雖在堪驚」的感嘆。

我們五人最值得掛齒的就是同心協力為新生報寫社論，新生報的前身是日文版的台灣新報，雖為台灣首屈一指的大報，但光復後必須改為中文發行。社長李萬居單槍匹馬來接管，面對著中文主筆及編採都有才難之嘆，只好求助於同機來台的我們五人。

所以，新生報於光復節創刊後，暫時雖中日文並用，而中文社論不少就是由我們五人輪流來執筆的。其中以李純青寫得最多，出力也是最多的一人。他老家在台北松山，回台之日，不料尊翁竟同日去世。我們五人便將政府所發的日幣二十元，取其一半為奠儀。後來始知這份禮不算是輕的，因為如再加十元，當時便可買下在拍賣的半輛舊式老爺小破車了。

我的任務，當時除火速向全國報導台灣光復的消息外，還須兼負接管日本同盟社的責任。說到報導，隻身來台，赤手空拳，這份重擔，決不是

可用文字傳真的今日所能想像的。所幸在重慶已承當時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的支持，空軍在台北松山基地的電台，可將我的電訊稿，轉發到空總，再由空總轉到中央社總社，翌日電訊稿便可在海內外各報刊出。這種天衣無縫的配合，同行的斲輪老手是無法爭著先鞭的。他們雖有滿腹經綸，生花妙筆，因郵遞費時，海天遠隔，也只能在月餘之後以通訊特稿與讀者們相見。

至於日本同盟社，當年權勢煊赫，兼負核發新聞之重任。台灣支社舊址，即在今日台北市博愛路東方大飯店的對面，頗具氣派，不料戰時已被盟機炸成一片瓦礫場。

我接管後，先後將日籍人員遣送回去，留用台籍人員中，其中以曾任觀光協會總幹事的雷樹水最爲突出，很多人都先後離去，而他却能堅守崗位，勤習中文，未改初衷。如今白髮滿頭，也已將近古稀之年了（雷君現已作古）。像接管這樣爛攤，何異無米之炊。中央社特派員辦事處至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改設為台北分社，社址在台北市西寧南路二十號日本木材會館的舊址。後來中央社總社從南京隨政府遷台，已故社長蕭三爺（同茲）所率領的各路英雄，也在那裏會合。以迄五十三年遷入松江路新址，中間已歷將近二十年的多難歲月了。

（原載七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報）

爲有源頭活水來

——賀台視創立三十周年

台灣電視公司於民國五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成立，轉眼已過了三十年的悠長歲月，我應當時董事長林季丞（柏壽）先生之邀，出任顧問，參預其事，至今也達三十年之久，在台視很少像我這樣從創始到成長的老兵。

如果談台灣的電視歷史，無疑的當以台視開播之日開始。早此之前，先總統 蔣公便認為設立電視台是適應時代的潮流，早應作此準備。但因政府方面有人認為此非當務之急，持不同的意見，以致幾經波折，迄未實現。後來 蔣公責成當時台灣省主席周至柔先生從速辦理後，始由省府進行籌劃。當時向周主席推介或角逐董事長的人，雖皆為一時之選，但他默察社會實際情勢，認為台視董事長一職，以台灣碩宿林季丞先生最為適宜，便邀我先去商談，說明此意，希望我能代為轉達。季丞先生是我的長輩，人皆尊稱為林四爺。林四爺並未答應，以本身事忙推辭。未幾，美國國務院邀周主席前往訪問，機場送行時，林四爺也在其列，周至公特地邀他到貴賓室去晤談，重申此意，言辭十分的懇切。當時林四爺仍未應允。不料周至公到美後，又特地致電省府秘書長郭鏡秋

（澄），很堅持的要他仍去請林四爺出任台視的董事長。郭秘書長謹慎將事，惟恐不成，便邀林四爺的摯友中央社故社長蕭三爺（同茲先生）

與我，三人同往林府面謁林四爺，再三說明周主席仰仗的殷切，林四爺至此才勉強的答應了挑起這個重擔。後來林四爺於七十五年逝世，舉行追悼會時，周至公雖以抱病之身，不良於行，還是坐著輪椅前去弔唁，默默地望著遺像，這種以生死見真情的高風亮節，令人爲之感動不已。

當時林四爺挑起這個重擔後，便詳加策劃。台視創設之初，資本額只有新台幣三千萬元，而且還有百分之四十是日本、富士、日立、東芝等日商四大公司投資的。這是從來沒有人走過的路，自然一切都是需要開拓的、創新的。經營未久，便見大量的虧損。當時林四爺的構想，希望我方與日商都能共同的增資，再謀發展。此事經當時台視周總經理天翔親自前往日本洽商，不料日商缺乏遠見，並未同意。周總經理在日馳電告知以後，林四爺幾經考慮，便決定在台泥大樓邀請了台灣工商界名流許金德、陳逢源、林熊祥、辜振甫、何傳、王雲龍、杜萬全、林玉嘉諸先生，說明台視所面臨的困境，而且特別指出電視在台灣仍是極有前途的事業，困境只是短暫的，希望各人鼎力支持，共襄盛舉。於是匯集了各方的力量，再增資三千萬元（資本額合計六千萬元）。台視至此，始有民股投入。像這種欲挽狂瀾於既倒的作為，如果缺乏信心，缺乏魄力，誰都不敢輕易嘗試的。後來事實證明，果然應驗了林四爺所說的話，林四爺無愧掌握最正確、最明智的抉擇。一年後，台視因業務蒸蒸日上，突破困境，一變而為開創了屬於它自己的新的領域，大露曙光。於是再將盈餘撥出四千萬元，資本額共增至新台幣一億元。台視經此握算持籌以後，第二年，盈餘便迅速地高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不但彌補虧損，償還債務，一切困難，自然也都隨而分別的迎刃而解了。電視從此在台灣閃爍著前所未見的光芒。其後數年之間，乃有中視、華視的繼起，踵

事增華，爭奇鬥豔，與台灣的經濟繁榮，相互映輝，形成了後來所發展的萬紫千紅的局面。遙想當年，台視如非林四爺這種高瞻遠矚，扭轉乾坤，撥雲見日的領導，後來的演變情形，誰也無法逆料的。

林四爺至六十五年以年老堅辭董事長的職務，並將台視所贈送的酬勞金新台幣三百萬元，轉贈與台灣省政府社會處，作為福利基金。這種博施廣益精神，外人多不知其事，頗有典型在夙昔之感，令人倍增無限的懷念。

胡適之先生過去很愛引用朱熹「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的詩句，如今思之，正是台視發展過程的寫照。我們傳統的觀念，對於任何事業，都是很重視飲水思源。台視的源，就是歸功於林四爺的苦心擘劃，後來演變而成，台視的氣勢，乃有或如長江黃河的浩蕩，或如五嶽千山的奇偉，竭造物之美，展現於我們的國土之上，爲社會教育開拓廣泛的知識領域，爲社會大眾充實多彩的生活視野，也爲業餘休閒帶來了雅俗共賞的豐富資訊，這是前所未見的時代產物。

林四爺雖爲台視奠下了百年永固的宏基，但是後來不斷的創新求變的發展，還是不能不歸功於繼任的許董事長金德、陳董事長重光，與歷任總經理周天翔、劉侃如、石永貴、王家 的同心合作。台視的同仁們，三十年來，前後何止千人，大家彼此都能榮辱相與，憂患相共，持續努力，因而能有此碩果呈獻於大眾的面前。抑且，我們不容忽視台視有兩大支柱的力量：一是制度，一是人才。此兩者互爲因果的，沒有完善的制度，便無以公平、公正的選拔卓越的人才，這些人才，如不經考試制度的考驗，便無以突顯、發現他們的才華學殖。司馬光所謂「爲治之

道，莫先於用人」，台視的治，首先就是羅致好的人才，而這些人才都是從考試制度中得之。歷任總經理雖各有其獨特的長才與遠見，但都以台視之心爲心、台視之榮爲榮，堅守這種制度，唯才是用，故能卓然成其大，對社會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回顧台視的長成，確如「爲有源頭活水來」，資本額從新台幣三千萬元，現已增至十二億元，員工一百七十人，現已增至七百四十餘人，而其業績從龐大的營業額來看，亦非人所能及，此三者足以引爲自慰。但是，自慰不是自滿，也不是自炫。因爲這是不進即退、日新又新的事業，惟有奮發自勵、精益求精，始可邁向更遠更長的理想之路。值此紀念佳節，欣感之餘，心之所至，願以此短文預祝之。

(原載八十一年四月廿七日中國時報)

慈湖似應立碑

——紀念先總統 蔣公一百晉六誕辰後建言

今年十月三十一日是先總統 蔣公一百晉六的誕辰紀念日，有人謁陵回來，與我談起慈湖是板橋望族後裔林明成捐獻政府的祖產，為什麼不立碑記敘其事，以資勵世。

這個建議，不是始於今日，很多人都認為台灣煤業殷商李建興為感恩蔣公光復台灣，捐獻陽明山土地闢為公園，都曾立碑紀念。自然，慈湖也是同樣的應該立碑，否則，歷史將留此空白。

其實，早在民國七十四年，陳資政立夫先生便曾為此擬就碑文，但輾轉稽延，政府有關方面迄未實現。其所撰碑文，原文如下：

「台灣山川之奇，靈氣所鍾，莫若慈湖焉。其地為板橋林府所有，林府台之望族，其先德林熊徵先生為革命先進，早歲與前國民政府故主席林子超先生等在日參加同盟會，並致力振興實業，先後助建粵漢鐵路漢冶萍公司及漳廈鐵路，人咸欽之。黃花岡之役，林覺民先生等因得其助，措旅費、置槍械，乃參與廣州起義，其事世渺有知之者。台灣既光復，熊徵先生雖於民國三十五年作古，其夫人林智惠女士，仍能秉其遺志，撥私產一百三十七公頃，設學田，資助大學青年，迄今已逾二千人。民國四十四年，先總統 蔣公蒞止今之慈湖，覽山川之勝，以靈秀頗似故里

溪口，擬築屋作為滌塵之所。經台灣省府商租林府，林夫人慨然願以此十九公頃土地全部捐獻，然當時未為 蔣公所允。省府乃以免費訂租，十年為一期。 蔣公崩殂，舉世銜哀，治喪委員會以 蔣公愛慈湖山水，遂奉堂樞暫厝於此，以俟大陸重光，擇吉奉安。湖山何幸，從此長侍一代偉人，今日慈湖，是以成為中外追慕 蔣公者，千萬人禮敬勝地。民國七十三年，熊徵先生哲嗣明成先生，忠孝不讓乃父，以訂約將屆三十年，重申捐獻之誠。台灣省府呈報總統，察納其議，特頒獎表揚，各方皆佩明成先生之志行，宣傳之不朽，乃為之記。世之虔誠以謁陵者，其知茲由乎。」

立夫先生是林熊徵學田基金會的董事長，也是明成的父執，平時以世伯尊稱之。立夫先生自民國三十七年林熊徵學田基金會成立後，即為董事長，迄今已四十餘年。他認為這是極有意義的工作。該會係林太夫人林智惠女士，秉承熊徵先生遺志所創設，供其使用土地，多達一百三十七公頃（民國五十四年，明成續捐山林一千多公頃），設置獎學金，迄今獎勵大學青年高達二千六百三十人，過去如宋楚瑜、魏鏞、蕭萬長等人，均在其列。

明成是我的內表弟，其尊人熊徵先生棄養時，明成僅三歲，及長，入政治大學，後至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深造，得法學碩士，除經營永琦百貨外，熱心公益，資助文教事業不少。民國四十四年，台灣省府為洽租慈湖土地時，太夫人尚在堂，太夫人即願以所屬十九公頃土地全部捐獻，言辭極為懇切，然未為先總統 蔣公所允。省府只得以免費借用方式，訂約租用，十年為一期，民國七十四年，已屆三期。明成由海外歸來，

七十三年便呈報總統經國先生，重申捐獻之誠。當時經國先生即核示題頒匾額，以示嘉勉。是年，省府邱主席創煥在十二月省府動員月會中，頒發感謝狀。七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內政部吳部長伯雄，復轉發總統題頒的「尚義尊仁」匾額。同年六月廿四日，蔣總統經國先生並親自接見明成，語多嘉許。當時我爲此事亦曾致函省府邱主席，對明成忠孝篤行，希望立碑紀念一事，有所申述。邱主席即交省府建設廳黃廳長鏡峰轉慈湖管理處鄭處長敦浦少將洽辦。我陪明成於謁陵後曾走訪鄭處長，研商結果，認爲保全陵園整體規劃，立碑以慈湖西側約二百公尺公路旁附近爲宜。立夫先生爲促成其事，曾致函政府高層有關人士，告以明成訪晤鄭處長經過，並願出資立碑情形。不料輾轉稽延，以迄經國先生逝世，此事仍如石沈大海。

像這樣具有歷史價值的事蹟，明成忠孝爲懷，實爲可貴。其捐獻國家偌大的土地，無論用於何處，都有立碑紀念的必要，何況這是奉為一代偉人 蔣公陵寢所用，豈能視爲一般史蹟。過去傳播媒體或因知之不詳，很少報導，如使任其湮沒無聞，不為外界所知，確屬遺憾。世界各國對於史蹟保存，惟恐其不可得，惟恐其不真不詳，我們竟知而不爲，廢而不用。保存史蹟絕不受時間的限制，其價值將是永恆的，目前雖已時移事遷，如能速圖彌補，仍無礙其紀念價值。值此紀念 蔣公一百晉六誕辰方過之日，筆者因對慈湖土地捐獻一事，自始至終，知之較詳，感慨之餘，願為歷史請命，籲請政府有關方面，接受立夫先生的建議，立碑一事，早促其成。

(原載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國時報)

感懷集 懷人篇

雍雍大老林柏壽

林季丞（柏壽）老先生已於本（四）月十日在香港以心臟衰竭溘然逝世了，享年九十二歲，海天遠隔，聞此噩耗，無論識與不識者，都不免黯然感嘆老成凋謝，歲月催人。

當年林老先生禮賢好客，與新聞界的前輩蕭同茲、潘公弼兩位先生都是同年，生肖都是屬羊，三老意氣相投，盃酒談心，經常歡聚在台北市民生西路三一七號的林府。一時賓客如雲，座中不乏政要與文化界人士，頗有漢代爲人所稱頌的梁園盛會的風雅。因羊與陽諧音，大家便都戲尊三老爲「三陽開泰」。如今蕭、潘二老先後都已作古，天不愁遺，僅存一老，也離開了這個多難的世界。

林老先生原爲目前台北板橋林家最長一輩唯一的一位，因排行第四，各界都尊稱爲林四爺。他出生於民前十七年（一八九五），正當滿清割讓台灣之初，林家的祖先因不甘淪入異族的統治，便經常的離開台灣，前往大陸。所以，他的出生地點不在台灣，而在福建廈門的鼓浪嶼。後來雖留學日本，通日文，卻在倫敦的經濟學院完成了他的大學教育。學成後，又赴巴黎，習法語，日人曾多方的設法借重，但因他遠走上海、香港等地，始終未爲所用。因爲家庭是屬於淵源有自的書香門第，詩禮傳家，幼承庭訓，所以早年他所讀的中國線裝書，遠超過那些日文與英文的書籍。他因而在本質上純然是一位傳統的中國讀書人。我們從他一生中以詩文自娛，與酷愛收藏中國書畫古玩及喜聽平劇等生活習慣來看，

就不難想像而知其爲人。中國讀書人大體都有其所必具的高尙典範與氣質，風骨岸然，澹泊名利。林四爺的一生，便是這個典型的寫照。

我第一次見到林四爺，是民國三十六年，在當時台灣省主席魏伯聰先生的寓所。四爺在對日抗戰期間，關心時局，足跡不是在上海，就是在香港，很少回到台灣。在香港時，結識了黨國先進許汝爲（崇智）先生，三十六年，他便與許先生一同回到台灣。他認爲台灣光復，平生心願已足，對於日據時代，祖先所留的產業，能否保全，並不介懷。潘公弼先生、袁企止先生在爲他所作的六秩、七秩壽序中，一喻爲飄逸如野鶴閒雲，一稱爲亭亭物表之士的長者，真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後來因爲我們交往漸多，相知漸深，加以他是內子嚴停雲（華嚴）的外叔祖，平時都以四叔公稱之，親炙既久，就成爲我在台灣最尊敬、最接近的長輩之一了。

四爺後來在台灣の工商界雖成爲領袖人物，而且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但是他對於這些並不重視，仍然保持著行之在己的生活形態。這種形態，有放任不羈的一面，也有寧靜致遠的一面。前者接近於晉代崇尚老莊哲學的知識份子行誼，詩酒自娛，不汲汲於世俗的風評。如以現代語來說，就是最懂得欣賞生活藝術的人。而後者則以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具有仁者の胸襟與積極的精神。古人所謂「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他就是具備這樣懷抱の人。因爲他對國家、對社會都抱持了一種堅定不移的忠愛情操，當陳辭修先生主持台灣省政，實行耕者有其田時，他便首先響應，將祖先所留的良田，全部付與耕者。當時台泥、工礦、農林、台紙四大公司開放民營，他爲台泥股東之一，以衆望所歸，

被推為台泥董事長兼總經理，以後台泥的業績，為各公司之冠，顯示四爺不僅是讀書人，而且兼具經綸的才能，台泥的發展扶搖直上，與他領導時所秉持的正確方向與奠定的鞏固基礎都是有深切的關係的。他在當時有些小事，至今仍為人所掛齒。譬如：特支費從不超支，剩餘的便移作公用，樹立帶頭作用。請客經常自掏腰包，從不計較。坐的汽車，也絕不用比別人要好的牌子。後來俞鴻鈞先生奉命組閣，很想請他出任政務委員，當時的副院長黃少谷先生曾要我代為轉達。但是四爺並未應允。他笑著說：「如果做了官，一切行動，都會惹人注意，我想出入的交際場所也受約束了。」從這些話，可以瞭解他對宦途並不熱中，但以在野之身貢獻他的力量，卻是從不後人的。

台灣電視公司未成立時，先總統 蔣公為適應時代潮流，對於籌設電視台，很早便指示有關方面從速策畫，但幾經波折，久未實現，而角逐董事長欲以主其事者，卻不乏顯赫知名之士。延擱既久， 蔣公責成台灣省政府負責籌設。當時主持省政者為周至柔先生，周主席詳察現實情勢，認為四爺是最適當的人選。於是邀我商談，說明此意，並囑我代為轉達。但四爺則以本身事忙婉辭。未幾，美國國務院邀請周主席前往訪問，機場送行時，四爺也在其列，周主席便特邀四爺至貴賓室，重申此意，言辭至為懇切。當時四爺仍未作考慮。周主席抵美後，非常重視此事，特地致電當時省府的秘書長郭鏡秋先生，囑其仍請四爺出任台視的董事長。郭秘書長唯恐事之不成，乃邀請蕭同茲先生與我，三人相偕前往民生西路林府面謁四爺，申述周主席仰仗的殷切。於是四爺也只得勉強同意了。這個擔子，自然十分的沉重。當初台視的資本額只有新台幣三千萬元，而且還有百分之四十是日本富士、日立、東芝等大公司投資

的。雖不能說什麼筆路藍縷，畢竟這是從沒有人走過的路，一切都是需要開拓、創新的。經營未久，便見大筆的虧損。當時四爺希望我方與日商都能增資，再謀發展。此事由當時周總經理天翔親自前往日本洽商，不料日商短視，並未同意。周總經理在日馳電告知以後，四爺幾經考慮，便在台泥公司邀請了台灣工商界名流許金德、陳逢源、林熊祥、辜振甫、王雲龍、杜萬全、林玉嘉諸先生，說明台視面臨的困境，及電視在台灣仍是有前途的事業，困境只是短暫的，希望各人鼎力支持，共襄盛舉。於是匯集各方的力量，增資三千萬元（合共六千萬元）。台視至此，始有民股投入。像這種挽狂瀾於既倒的作為，如果缺乏信心，缺乏魄力，是誰都不敢輕易嘗試的。後來事實證明，應驗四爺所說的話，四爺無愧掌握了最正確、最明智的抉擇。一年後，台視果然突破困境，開創屬於它的新領域，業務蒸蒸日上，大露曙光。於是再將盈餘撥出四千萬元，作為增資，資本額合共新台幣一億元。台視經此以後，第二年，盈餘便迅速的高達一億元以上，彌補虧損，償還債務，一切困難，自然也迎刃而解了。電視從此在台灣閃爍著無限的光芒。其後數年之間，乃有中視、華視相繼的崛起，踵事增華，爭奇鬥豔，與台灣的經濟繁榮，相互並輝，形成了後來所發展的局勢。回想當年，台視如非四爺這種扭轉乾坤，撥雲見日的領導，後來的演變，成敗之數，實在未可逆料。但是，四爺就像儒家所崇尚的風範，從未以此「自大其事，自尚其功」。這種謙沖的修養，也正是中國人傳統的固有美德。

四爺歷年所擔任的董事長，以台泥、台視、中華開發信託公司與改為民營的中國銀行最為繁重，過去那幾位總經理如辜振甫、周天翔、張心洽、魏宗鐸先生，都是工商界極負名望的卓犖大材，他們都十分尊敬四

爺，視為長者。而四爺領導群倫，舉重若輕，小事不問，大事必定堅守原則，不失其義，不離其道。而且氣度恢弘，吐屬溫和，言不在多，言必中肯。所以很多人對四爺都是見之如對清風朗月，渾金璞玉，令人自愧鄙吝，而欣然產生一種仰慕悅服的感受。

上述四爺是最懂得欣賞生活藝術的人，然而因受中國傳統的家庭教育之薰陶，平時養成了持之有恆，安之若素的節儉生活習慣。他的服裝，便是明顯的實例。他的身上很少嶄新的流行格式，一件穿了十幾年的老舊衣服，也絕不輕易的捨棄。每次宴客時，如發現盃中仍有剩酒，便希望大家分喝得乾乾淨淨，點滴也不浪費。這是傳統觀念中勤以修身，儉以養德的表現，過去個人的修養與內涵，往往就是從這些小處見微以知著的。四爺在陽明山建有蘭千山館，珍藏著許多中國歷代的書畫與古玩，其中尤以古硯為他最所鍾愛，印有「蘭千山館硯譜」上、下兩集，撰有自序，搜羅極廣，並經譚旦岡先生詳加編註，古意盎然，實為當代罕見的稽古不朽之作。那些珍藏的書畫，四爺於六十八年曾精選了三百三十一件寄存於故宮博物院，並撥出新台幣一百萬元，作為保管費用。其中如褚遂良黃絹本蘭亭、宋高宗賜岳飛批劄、黃庭堅發願文、朱熹、王守仁的楷書、顧炎武的行書、康熙、乾隆的御筆詩等，都是經四爺多年的蒐集，不可多得的珍品。四爺希望那些寄存的古物獲得適當的維護，即使大陸重光，也仍能保留在台灣，與蘭千山館所有的古物，一併移存於林家花園中新建的美術館。只可惜天不從人願，未能在有生之年以見之。此外，四爺對於社會的公益事業，也是十分的熱心，具有己飢己溺的胸襟。根據統計，從六十一年至七十四年，他私人所捐獻之款，便高達新台幣四千七百多萬元之鉅。其中如國防捐與林家花園的重建費用，各捐

一千萬元，林本源文化教育基金會先後共捐九百萬元，中正紀念堂的建築費，也捐獻了三百萬元。從此知其所見者都是在大處，都是在對國家、對社會的貢獻。

四爺的交遊雖廣，但他認為平生能推心置腹的知己，只有蕭同茲先生等數人，三爺（即蕭先生）於十二年前去世後，他的心境，便被一種人亡琴斷的淒涼情緒所籠罩著，時常有「既痛逝者，行自念也」的自我感傷。所以，他在八十歲以後，健康的情形大不如前，最顯著的就是記憶力的衰退。我們比較接近的人，都為他而擔心，只希望他仍以坦蕩的胸懷，頤養天年，曠達自珍。前年四爺偕夫人九秩雙壽時，我本擬到香港去拜壽，因承辦旅行社竟將證件失落，以致未獲如願。不料去年六月，老夫人棄養，雖然仍有兩位女公子侍奉在側，但在四爺老境何堪遭此震撼，自然也嚴重的影響了他的健康。不久，即以病聞。去年十月，我特地專程前往探視，當時他住在甘諾撒（CANOSSA）醫院，因痰難以暢通，已在頸上開了一個洞口。他在病榻中看到我，雖有喜悅之色，但第二次見面向他告別回台北時，便有黯然傷別的感覺。此別竟成永訣，人生到此，真不知涕淚何從。

綜觀四爺的一生，始終以在野之身，矯矯布衣，雍雍其表，不屬於任何的黨派，不參與任何的政治活動，超然物外，澹泊以終。求之當代，能有幾人。而對國家、對社會自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尊之為國之大老，當屬無愧。如今，典型已遠，只為我們留下了永遠的敬仰與追思。

（原載七十五年五月傳記文學月刊）

謙虛其心，宏大其量

——紀念蕭同茲先生百齡冥誕

今年十月二十二日（農曆九月十八日）為新聞界先賢蕭三爺同茲先生百齡冥誕，中央社是在三爺手中茁壯，也是在三爺手中成長。當年鼎盛時代，揚名國際，為中國新聞史寫下了新的一頁。然而，三爺亦有其如王陽明所說的「謙虛其心，宏大其量」的一面，這裡特追記三爺幾件小事，以見其大：

其一，忠愛國家，秉持大節。三爺外表雖謙沖坦蕩，瀟灑倜儻，而在他的內心卻充滿了強烈的愛國心與正義感，尤甚於忠邪是非之間，掌握極為執著。如戰前日本同盟社上海特派員松本與三爺極熟，當年只要見面談到中日問題，三爺必然意氣激昂，絕不讓步。此人戰後與香港「自由人」雜誌負責人雷嘯岑相晤時，猶對三爺萬分折服，稱三爺為愛國主義者，請雷氏代為轉達相慕之意。

民國五十三年秋，三爺七秩初度，我與舍親辜六爺偉甫陪同三爺赴日遊覽，這是三爺一生中首次出國。抵東京之日，辜八爺寬敏親迎於機場，執後輩禮，寬敏為當時獨立運動主角，翌日便將舉行外籍記者招待會，申述對時局主張。三爺瞭解實情後，激於愛國忠黨的熱情，立邀寬敏懇談，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寬敏有感於三爺之忠言，毅然決定取消所計畫的記者招待會，並以此作為三爺壽禮，奉陪三爺暢遊關西、京都、奈

良等地約一週，當時中央社東京分社主任李嘉亦偕行。過去駐日大使館爲台灣旅日青年思想問題未獲溝通疏解，正感棘手。三爺此行，不僅使多年失去聯絡的辜八爺成爲駐日大使魏伯聰（道明）座上貴賓，亦爲魏大使完成了一項有意義的任務。寬敏熱愛桑梓，數年後亦束裝返台。三爺一生不尙事功，此段佳話，以後從未向人提及。

其二，寡言養氣，守身之則。三爺執掌中央社長達十八年之久，愛中央社，尤甚於其子女。民國三十八年，大局逆轉，政府遷台，三爺於次年（三十九年）冬交卸中央社社長之職，轉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社的影子，從此遙遙而去，遠離了三爺的生活周遭，三爺對中央社骨肉相連的情感，遭此割捨，這是情所不堪的。三爺在那段期間，寡言養氣，澹泊自處。哲嗣孟能曾告我，三爺家居從不提中央社的事，兒輩欲以慰親娛親，苦無機會。後來每逢星期日中午，新聞界老友如前香港時報社長許孝炎、華北日報社長張明一、與湖南鄉友前基隆市長鄧伯粹、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黃雪邨等，常在蕭府定期餐敘，重拾敘舊之情，但皆語不及中央社。

民國四十四年，我交卸中華日報社長的當日上午，三爺關切我，很早便在我家中客廳靜候著，等我回到家，便囑我改乘他的座車直駛陽明山。沿途瀏覽山景，默不作語，車到山頂，我們停車眺望，俯仰於藍天白雲之間，心胸何等的開朗，人間如有得失之心，到此都將融化於無窮的蒼穹而自慚其渺小。於是，我領悟三爺的指引，如上了修養一課。

其三，處危慮深，明敏果斷。民國三十八年，大局已非，中央社總社由南京遷至廣州。是年五月，三爺電邀紐約分社主任湯德臣與我——當時

我爲台北分社主任，前往商議中央社海內外應變大計。三爺的心情十分沉重，但言談之間，極爲鎮定，對時局雖表示憂慮，卻不灰心。那種公忠體國，處危慮深的情懷，至今仍令人懷念。三爺當時授權湯主任德臣統一處理海外各單位的經費，他的心目中只有一個希望，就是中央社業務不可一日中斷。而對我則囑咐爲總社遷台須作各項準備，從通訊器材由南京搬運來台，人員安頓以至辦公房舍之安排，三爺無不叮嚀至再，處處爲中央社的前途著想，我們臨危受命之餘，對三爺的持重達變，明敏果斷，加深了一層認識。

其四，用人惟信，提攜後進。抗戰期間，陪都重慶市政府秘書長楊綽庵，我們以鄉誼關係，互有往還。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楊氏被任命爲哈爾濱市長，將隨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前往接管，哈爾濱爲東北重鎮，中央社在那裏必將設置通訊網，楊氏深知新聞報導的重要性，希望中央社能派我前往，爲此特走訪三爺，申述此意。但未爲三爺所同意，三爺認爲新聞工作不宜涉及私人情感，說我是福建人，派往光復後的台灣，較爲適宜。當時我在中央社的資歷很淺，三爺瞭解我的，不會太多，毅然作此決定，大抵基於用人惟信的原則，很願提攜青年後進。我則因三爺的裁決，遠離兵燹，安居台灣將及半個世紀，豈非亦受三爺之賜歟？

其五，廣結名流，有功於台。三爺在台那段期間，以在野之身，廣結台灣名流，其中社會碩宿如林柏壽、黃朝琴、謝東閔、黃國書、陳啓川、蔡培火、楊肇嘉、李萬居、吳三連、林熊祥、連震東、辜振甫、賴森林、許丙、陳逢源、羅萬俤、劉闊才、陳啓清、王民寧、陳尙文、黃烈

火、黃逢平、黃啓瑞、高玉樹、陳清汾、張聘三、林頂立、許金德、劉啓光、陳重光、林挺生、吳金川、杜萬全、陳雲龍、陳江章、林永樑、辜偉甫諸氏，皆有交往。尤以林四爺（柏壽）最爲相契，四爺與三爺同庚，四爺好客，每次民生西路林府宴客，嘉賓如雲，座上必有三爺，人以三爺風度過人，亦樂與交。當黃達公（杰）受命主持台灣省政時，爲求地方人士之支持，接任前三爺便曾與林四爺聯合邀請省議員陳逢源、陳重光、賴森林等人於台泥大樓早餐，徵詢各方意見，三爺之於台灣社會人脈，不僅爲人所重，且亦深具淵源。

三爺對台灣的貢獻，有四事多爲人所忽略：

第一，以碩望致力新聞教育，民國四十四年，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創辦人成舍我籌備創校時，曾邀文化界新聞界先進多人爲發起人，三爺與于右任、王雲五、黃少谷、林柏壽、端木愷諸時賢均在被邀之列。四十八年，改制爲專科，三爺即以碩望被推選爲董事長，以迄六十二年辭世，達十四年之久，三爺用心至專，對新聞教育，作育英才，多有遠見。

第二，有功於台灣電視公司拓基，當年先總統蔣公對指示籌設台視，頗爲積極，但數經波折，迄未實現。後來責成當時省府主席周至柔促成，任命周天翔爲首任總經理，董事長一職，角逐者頗不乏人，如望重一時的張道藩、陶希聖、劉啓光、魏景蒙均在其列，亦曾爲籌備出力。至公深感左右爲難，然論現狀，至公則認爲林四爺最爲適當。於是囑我代爲轉達政府禮賢之至意，但四爺則堅辭不允。迨至公訪美時，至公曾在松山機場邀林四爺至貴賓室懇談，仍未應允。至公抵美後，復電當時省府秘書長郭澄，囑爲促成。郭秘書長乃邀三爺與我同訪林四爺，終於勉強

同意。此中關鍵決定於接受三爺的宛轉申述。台視當初資本額爲新台幣三千萬元，日商佔百分之四十，經營未久，即見虧損。林四爺希望增資，未爲日商所允。於是不得不憑其個人的影響力，邀請工商界名流許金德、陳逢源、林熊祥、辜振甫、何傳、王雲龍、杜萬全、林玉嘉等多人支持，協力投資三千萬元，共爲六千萬元。一年後，台視漸見突破困境。二年後，業務大展，盈餘逾一億元，一切困難，皆告迎刃而解。當初如無三爺之鼎力說項，林四爺不爲所動，台視能否解此倒懸，奠此宏基，如後來之發展，皆難逆料。

第三，爲台灣廣告界開拓前所未有的境界，今日廣告代理業勃興，每年業務高達新台幣將近八百億元之鉅，有裨工商業發展，促進經濟繁榮，當爲人所共見。其創始之功，實出於三爺所領導的國華廣告公司，其時國華與日本最大之廣告公司電通合作爲台灣唯一的廣告公司，以三爺的人際關係，素負隆望，創始人許炳棠，數請始允出任董事長，促使廣告趨於企業化、專業化，實皆由國華始。專業公司從此相繼創立，踵事增華，漸而形成今日的盛況。

第四，鼎力協助榮星花園創設，辜六爺偉甫爲實現其理想，不惜投以鉅資，興建榮星花園，邀請三爺出任董事長。當時從土地之取得使用以至籌劃，經緯萬端，其中不少困難，皆因三爺幕後爲之斡旋說項，逐步獲得解決。現在雖已成爲歷史陳跡，然談名勝興廢掌故，多能樂道其源頭。

其六，不計名位，心胸磊落。大陸時代，執政黨的中常委，都是一時碩彥。然而，三爺雖貴爲中常委，每次開會卻囑咐中央社編輯部發稿時不

要列入他的名字。抗戰時期，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漫天烽火，開闢滇緬公路，事關整個戰局，政府爲此特組團赴英訪問，冀以獲得英首相邱吉爾之支援。團員計有與英方有淵源之王世杰、王雲五、杭立武，新聞界預定人選爲三爺與大公報的胡政之二人。但三爺並未接受，他認爲前方戰事吃緊，他與中央社同事們正在緊守崗位，同甘共苦，不願遠離而去。

民國四十四年，我離開中華日報後，翌年應美國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之邀赴美，入史丹福大學進修，爲期一年。行前三爺哲嗣孟能爲籌辦文星雜誌，走訪於我，希望我能擔任文星雜誌的發行人。我詢以三爺是否知曉，答稱已獲同意。我與蕭家兩代之交，久蒙關垂，衡之常理，豈能不允。於是，我在赴美前特爲文星雜誌籌得一筆基金。台灣當時夠水準的雜誌，的確寥寥無幾。文星雜誌以嶄新的面貌，獨特的風格，爲滿足讀者的慾望而問世，內容確有不少的出色文章，聲名遠播，一時無出其右。民國四十六年，我由美返台，豈知因言論不見容於當時的政治環境，發生糾葛，以至訴訟。自然間接的影響到三爺的清譽，最後終於演變至停刊，加以虧損累累，財務負擔過重，文星書店亦陷於無可挽救的厄境。三爺平時對文星書店及雜誌雖很少過問，但一旦遭此挫折，平生友好與各界人士無不寄以關切，皆欲爲之排解困難，無奈事與願違。三爺於此，自亦難免有遺憾之感。然而三爺心胸磊落坦蕩，仍然無視外界的流言。或有以此相問，三爺總是莞爾而笑曰：「小事，小事。」

三爺平時對誤國、誤事、誤人之類事例，最爲不齒。因誤之爲病，必然

不識大體，所見者小，多屬汲汲爲己牟利之徒所爲，一旦事發，已經挽救莫及。某年，辜偉甫伉儷欲爲三爺壽，特備私人遊艇，載酒遨遊於淡水河，同行有報界前輩潘公弼等人。午宴時，竟發現酒是冒牌假貨，滿座爲之掃興。三爺談笑自若，即以此事，發抒高見。

其七，捨己爲人，不屑權勢。三爺是最重友誼與最懂得生活藝術的人，在他的一生，公餘之暇，有聽戲，有喝酒，也有打牌。但他喜愛與人同樂，不願獨樂，而且無處不是爲別人著想。談聽戲，三爺愛聽平劇，是知音，亦愛唱，尤好「打漁殺家」一劇，與人共賞時，品評擊節，頗有周郎顧曲的風趣。談喝酒，三爺喜飲，亦善飲，只要三爺在座，便有滿座生春的光彩。他的敬酒，從不強人所難，對方非善飲，便稱：「我乾杯，你隨意。」這六個字，蘊藏著無限寬諒、關懷的真摯溫情。某次，三爺與前駐阿根廷大使胡慶育、新聞天地社長卜少夫等人同時被邀宴於某餐廳，席間胡大使豪情豪語，酒興大發，終於酩酊大醉。席散，大雨滂沱，時已深夜。三爺欲扶其歸，苦於司機告假，而胡寄寓於當時任中廣副總經理羅學濂之家，又不詳其址，不得不僱車馳歸翻查通訊簿，如此反覆折騰，始將胡大使蹣跚扶歸。三爺待人之誠，殆多如此，不厭其煩，不嫌其瑣，懃懃懇懇，實爲人所不及。談打牌，過去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便曾言，他曾在三爺背後看牌，三爺自己和的牌，不發一語，竟推倒讓下家去和。後來詢以故，則曰，下家已爲不和所苦，不如相讓，以求同樂。這是何等風度，以小見大，非有捨己爲人的大量，豈能爲之。

三爺平生雖交遊滿朝野，但不屑趨炎附勢，如黃達公繼周至公爲台省主

席時，交接之日，一時冠蓋雲集於中興新村，各界都紛紛前往道賀。三爺雖與達公交厚，卻獨有懷抱，單獨留在台北，反而邀我同往松山機場迎接卸任的周至公。所以，至公曾言，三爺的風度是別人學不會的。

三爺在世時，每年生日都不願別人爲他祝壽。某次，大華晚報社長耿修業與我宴請三爺，原不言壽，不料餐廳卻自作聰明掛了一個壽字，三爺見之，只淡然說「俗氣」兩字，亦可想見其人。

三爺之所以至今仍然令人仰慕思念，眷眷未忘其人其行，固由於他所主持的中央社對國家對新聞界的貢獻，爲世所重，成爲新聞界極爲成功、極得人緣的領導人物，而其成功的要素，實秉於三爺平生的立身處世，具備「謙虛其心，宏大其量」的賢者風格。而此二者，則無不導源於待人以誠，處事以實，有以致之。新聞界先輩張季鸞——大公報創始人讚譽三爺爲「平凡的實踐」，古人亦有「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之語，信乎不謬，惟三爺足以譽之。

三爺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一年，每年春節，我都會到陽明山他的墓園行禮致敬，低徊沈思，難以自抑。天地悠悠，生死茫茫，世界永遠的在變著，三爺愛他的國家卻永遠的不變，在天有靈，面對著當前變亂的世局，三爺恐又在憂心著他的國家。

（原載八十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國時報）

新聞界泰斗陳博生

(一)

陳博生先生是我們新聞界的前輩，也是中國新聞界具有創造性、建設性的不朽人物，無論從節操、學養、抱負、或才識來說，環顧當代，都是罕見其匹儔。論風度則飄逸清邁，光映照人，如玉樹脫俗出塵而挺立；論言談則踔厲風發，精理洞達，如清泉恣肆奔散而不竭。令人有仰之不可及，測之不可量的感覺。而其平生所秉持則又如壁立千仞不為所動的蒼松，萬物不能為之轉變。所以，他雖作古已有三十多年，而他的精神與典範，將永遠為新聞界所稱道、所懷念。

(二)

博生先生為福建林森縣人，生於清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農曆十月初四日，他的祖父是福建著名的中醫，平生不求聞達，懸壺濟世，以救人為樂。他的父親伯謙先生，為滿清賜同進士出身，曾歷任廣東知縣、知府等職，當時頗著政聲。辛亥革命後，便掛冠歸休，安享餘年。太夫人吳氏亦為福州望族，生博生先生與二女，博生先生的大姊，歸鄉賢林文忠公（則徐）的後裔，已故第五任的中央通訊社社長林徽祁，即為其外甥，妹則歸劉氏。

博生先生自幼即見頭角崢嶸，博聞強記，聰穎有異於一般兒童，親友長輩見之，都譽為千里駒。就讀私塾時，成績出眾，從此便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基礎。當時的福州，因鴉片戰爭失敗，被列為五口通商之一，與外界的接觸較早，尤以日本相去不遠，多有來往。於是，博生先生十三歲（一九〇三）時，便東渡日本求學，從中學以迄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畢業，在這段長時間的留學生活中，不但對日文有深厚的造詣，而且憑他的努力，知識的領域涉獵極廣，對當時國際情勢與國家處境都得到透徹的認識。自然，對腐敗的滿清政府，也與一般愛國青年同樣的激發著革命思潮。當時博生先生的父親尚在廣東為電白縣知縣，他便以知縣大少爺的身分，掩護革命黨人運送炸藥，幾乎被捕，幸而逃往日本。民國成立，博生先生回國，曾在北京政府的眾議院當過短時間的秘書，後來便進入新聞界工作。中間復曾兩度前往英國倫敦大學進修，因而與徐志摩成為莫逆之交，他較徐為年長，徐以大哥尊稱之而不名。

（三）

博生先生最初進入新聞界是任北京晨鐘報的編輯。晨鐘報係福建人劉崇祐、蒲伯英兩氏所創辦，他除精通中日文外，英文譯作亦能隨心為之。他目擊當時國內各報刊載國際新聞甚少，於是每週精選路透社的國際要聞，綜合譯成兩篇或三篇，定期發表，附以詮釋，使讀者易於了解，成為該報特色之一，且備受知識份子的重視。

晨鐘報停刊後，易名為晨報，博生先生為創辦人劉崇祐所倚重，禮聘為總編輯。當時各報尚無總編輯的職稱，業務推展，相率分為編輯與經理

兩部門，博生先生就是編輯的總負責人。經理部門，則由另一位林仲易先生綜其成，林亦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長於經綸及版面設計。他的職務，無異今日報社的總經理。晨報後來享譽於國內，備受各界矚目，就是得力於陳、林兩氏的通力合作。

另一開風氣之先的創舉，就是當時各報都以報導為主，沒有副刊的名稱，也沒有其他版面可刊載新聞以外的作品，博生先生為培養報紙的學術氣氛，與增加讀者的閱讀興趣，決定於正版之外，增一版面，專以發表有關學術性的作品為主。這個名稱，很難創擬，經與林仲易商討以後決定以「副刊」為名。於是，「副刊」由此而誕生焉。回顧今日各報無不以副刊為其發展的重要特色，這絕不是博生先生當初意料所及的。後來晨報發展成為兩個副刊，一為純文藝的「學園」，由瞿永森主編，一為含有趣味性的「藝圃」，由于非主編。文藝作家孫伏園也曾在那裏主編過副刊，徐志摩、沈從文等的作品，亦先後刊載於此，形成文壇一時之盛。

博生先生在晨鐘報任職的時期中，有兩件事足以顯示他力持正義，不畏強權的性格。其一是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的金佛郎大借款案。當時外交部長羅文幹備受各界攻擊，博生先生深知內幕，羅乃代人受過，於是挺身而出，為羅申辯，以致觸怒政府當局，幾遭殺身之禍。其二是第二次直奉戰爭後，馮玉祥進兵北京，對博生先生為文批評時政，深為不滿，竟派兵包圍晨鐘報社，他因踰牆而走，得以免禍。

博生先生當時並未加入國民黨或其他的政治組織。他的言行，皆秉於新聞記者的良知，與維護正義的精神，這是很令人敬佩的。當時他與學術

界人士多有來往，其中包括梁啟超、林長民、顧維鈞、羅文幹、胡適之、丁文江、徐志摩、陳通伯、湯爾和、羅家倫諸氏。因部分與進步黨有關，有人認為他是進步黨，則非事實。

晨報在國民革命軍底定北平後停刊，他也離開了晨報，曾到東北小住。這是因他與張學良在日本留學時便已相識，回國後亦曾去過東北，彼此之間，頗有交情。後來張學良在東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博生先生也可說是居中促成的一人。其時國民政府曾派吳鐵城先生偕蕭同茲先生前往東北會晤張學良，博生先生因而與同茲先生相識，這種機緣，在中國新聞史上必須加上一筆，因為他們兩人從相識到合作，以至後來肝膽相照，同心致力中央通訊社業務的發展，乃為中國新聞界開拓了蓬勃的新境界。

民國十九年，張學良奉命率師入關，進駐北平，當時所謂中原大戰的風雲已過，政府勵精圖治。張久聞晨報享譽於北方，而博生先生與晨報素有淵源，且是具影響力的人，於是，授意博生先生將晨報復刊，並表明願意在幕後作財力的支持，社內一切人事行政，概不干涉。博生先生乃計畫復刊，自任社長，除主持報社大計及撰寫社論外，其他編輯及經理業務，仍延聘前在晨報的林仲易負責。復刊之初，原擬仍用舊名，但為晨報創辦人劉崇祐所反對，於是不得已改為「北平晨報」。晨報至此，乃為歷經世變，三易其名。

民國二十年五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國民會議，張學良應召入京出席，堅邀博生先生同行。博生先生雖為福建人，但久居北平，認為此行既可領略革命首都的風光，又可藉此採訪國民會議的新聞，於是欣然相

偕就道。當時國內報壇，以撰寫社論聞名者，有南北二陳之譽，南是上海商報的陳布雷，筆名畏壘，北就是北平晨報的陳博生，筆名淵泉。陳布雷先生此時已入佐蔣主席的戎幕，對博生先生是神交已久，至為傾慕。因而博生先生甫抵南京，布雷先生即專程往訪，兩人相見甚歡。後來因由他與張學良之推介晉謁蔣公，三天以內，蔣公與博生先生暢談三次，每次都在一小時以上，由此可知蔣公對博生先生的器重，有異於尋常的報人。

博生先生所撰寫的社論，以剖析事理，深入淺出擅長，行文流暢，深為讀者所欣賞。最為可貴的是，他在嘈雜的辦公室中，隨寫隨發。如遇有同事接談，便停筆脫下眼鏡，談畢再寫，改動之處極少，一篇千餘字的社論，不過一小時左右，即能完成，文思的敏捷，無愧倚馬可待。

民國二十四年，日本侵華行動日亟，威脅平津，宋哲元奉命組織冀察政務委員，以與日寇相周旋。其時張學良已由武漢移駐西北，深知日本最仇忌張之反日，即將其所支援的北平晨報，自動轉讓與宋哲元，以免藉口杯葛。宋部於中原大戰後，歸張隸屬，對張執禮甚恭，不得不從命，於是晨報乃改田雨時負責。據田自稱：「當時供職武漢，係宋向張借調，公開為主管新聞事業，實則負有華北地下反日的任務，兼辦晨報二年，實為勉強充票友。」當時報社同仁不明原委，決定於第二天報紙第一版刊登全體總辭職的啟事，博生先生則極力勸阻，認為宋此舉迫於形勢，必有不得已的原因，應予諒解。堅持甚久，最後且說：「你們如不撤去啟事，我決不離社。」此一啟事，因不願強拂其意，終未見報。博生先生為此直至清晨五時半始行離社返寓，可見他的洞明事理，深識大

體，爲人厚重之處，令人敬佩。

(四)

博生先生離開北平晨報之後，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先生便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親往北平，以謙辭厚禮，聘他為中央社駐東京特派員。因蕭先生知道他不但精通日語，而且對日本政情非常熟悉，加以當時國內各界，由於中日關係正在極度緊張之際，亟欲對日本情形多所瞭解，請博生先生擔任此項工作，實為最適當而無出其右者。由此可知蕭先生的知人善任，而博生先生之慨然允諾，顯示他們之間已經有了以義相許的默契。博生先生抵達東京以後，憑他淵博的學養，冷靜的頭腦，敏銳的觀察，每天所發的專電以及撰寫的通訊稿，對日本問題，無不作正確的分條剖析，使國內讀者對當時日本的政情與其陰謀及動向，都能獲得更多的瞭解。而各國駐華通訊社亦極為重視，用以參考。最難得的是他在日本備受新聞界與朝野若干人士的尊敬，被人譽為我國駐日本的民間大使。民國二十六年對日抗戰爆發，他在最後離開東京時，還是受到日本政府的禮遇，享譽之隆，實非當時新聞界任何人所能及。

博生先生回國後，蕭同茲先生特請他擔任中央通訊社前此編制所無的總編輯職位，這是蕭陳兩氏為中央社全盤業務發展合作的開始。以後中央社之成為世界所重視的國際通訊社，蕭陳兩氏的貢獻，可說是無分彼此。他們二老那種肝膽相照的胸懷，與水乳交融的情誼，實為國內所罕見。公餘之暇，他們都有相同的嗜好，喜愛杯中物，都有很好的酒量，也都很愛朋友，往往邀集許多朋友，暢飲聚談，有時也打打小牌。博生

先生平常總是穿著長袍，戴副沒有鑲框的眼鏡，看起來好像非常嚴肅，實際上，他對人卻是非常有禮貌而和藹可親，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酒酣耳熱之際，談笑風生，尤其對青年的同事們，更是非常有耐心的諄諄誘導，從無疾言厲色。因之，青年同事們，無不敬愛之如同家長，而沒有一般僚屬對長官的那種感受。

博生先生任總編輯後，中央社新聞報導業務，由他全盤負責督導。他要求總輯部對社內社外的的工作都做良好的配合，不僅對社內各部門隨時有聯繫，即對各分社與隨軍記者，也要能時刻保持密切的接觸。故當抗日歷次軍事進行之際，凡是有關新聞報導的問題，總社都能立即對分社指示或解答。每當局勢緊張的時候，總社與分社幾乎日夜必有電報往返洽詢。每夜於截稿以前，編輯部必定與各分社在電報上接觸一次，電台才關閉機器。

關於新聞取捨問題，中央社雖為黨營機構，但博生先生仍堅持須重視新聞本身的價值，而且總是依新聞常例來處理。因此，在後來新聞檢查處成立時，不論南京、漢口或重慶，常常會為某一新聞稿件，與負責檢查的人爭執不下，甚而深夜用電話鬧到中央宣傳部或有關主管機關去商討，方得決定，而結果總可得到發表的許可。

博生先生對於培植人才，至為重視，所以中央社歷來對採訪與中英文編輯編譯的人員，都以考試錄用，經過訓練以後，造就不少的人才。民國三十二年，為應工作需要，從英文部選調了部分人員，另設編譯部，統籌翻譯運作，尤其重要人物的演講辭或文稿，無不力求精確，而且統一譯名，更為中央社服務讀者作了一項突破性的創舉。

對日抗戰時期，軸心國發動侵略，國際局勢瞬息萬變，如對國際問題缺少研究，則面對許多突發的新聞，常有無法判斷之苦。博生先生有鑒於此，便以總編輯室的名義，每週親自撰寫C Q A給各單位。他以政論家的觀點，分析當前的國內外大事，經常長達三千多字。像這種教育性的指示，對編採人員都有很大的助益。有些同仁讀了C Q A之後，如有不解之處，還到總編輯室向他當面請教，無不獲得滿意的解答。

馬星野先生在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一日發表在中央日報的「壽陳博生先生」一文中，曾有一段記載。他說：「我從到重慶以後，向陳先生請教的機會特別多些。八年抗戰，前五年，我在南溫泉辦新聞教育，無論是新聞學系，新聞專修班或新聞專修科，我總是請陳先生來向同學們講幾次『敵情研究』或評論作法。他每次下鄉演講，我總是隨堂靜坐諦聽。他能一口氣教四個鐘頭的書。聽講的學生，對他滔滔不絕，條分縷析的演講，愈聽愈起勁。……每次學校畢業，我總選派幾位同學到中央社實習，一進社，博生先生即以誨人不倦的精神，把工作方針與態度指示他們。中央社其實是一座新聞學院，博生先生即是主任教授。中央社內部有一種『編採通訊』，非常精彩，按週有博生先生對編採同仁之指示，彙集起來，實可作一本新聞學習教材。」從馬先生這一段話，足見博生先生對訓練工作同仁，掖勵後進，是如何的肯專心致力。

(五)

民國二十九年，博生先生奉派兼任中央日報社長，當時正是我國對日艱苦作戰以迄盟邦參加太平洋地區軍事行動的階段。他接任之後，首先注

意的就是加強國際新聞，一如他在中央社的作風，認為必須增進國人對世局的全盤瞭解，而不囿於一隅一地的得失，乃能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每週都有一篇署名「本報外交記者」的綜合評論，以我國為中心，剖析世界局勢的動態，以補外國通訊社電訊之不足，使讀者獲得清晰的概念。社論方面，或由他自己撰文，或指示方針，由主筆屬稿，再經他細心的審閱，每天總要到深夜一、二時以後，親自校妥小樣，始行離社。由於他接觸面廣，問題認識深，所得中樞政情，軍事形勢，大局趨向，迅速而確實，據以權衡新聞分量，斟酌言論導向，自非他人所能及。

那個時候，還有對共黨的問題是極費周章的。中共表面上號稱歸附中央，擁護領袖，共同抗日，實際上則擁兵坐大，游而不擊，陰謀叛亂，伺機顛覆。中央日報在版面上，為應付這種特殊的情勢，新聞的發表，社論的評述，無不經過一番精密而微妙的思考，維持適當的分寸，或委婉勸導，或嚴詞關斥，既要肆應機變，又須保持一貫的立場，這是煞費苦心的。

在作育新聞人才方面，博生先生也極為注意。那時候的中央日報財力困難，但他還是訓練了新進的外勤新聞記者達十四人之多。一開始他就親自考選，條件奇苛，待遇微薄，工作繁重，按理是無人願意樂就的。然而他竟能鼓起這些青年的雄心與活力，經過短期訓練後，便從事於專業的採訪工作，且能分工合作，忠於職責。採訪的新聞，量的豐富，質的精確，都是當時各報所不及。珍珠港事變突發，中央日報竟能較其他各報早一天發表新聞，出報時報社擠滿了人，搶購報紙，而電話查詢尤為

應接不暇，至今仍爲懷舊者傳爲佳話。

博生先生對同仁的進修，又極關切。經常勸勉大家在工作餘暇，多讀書，多研究，多寫作。他認爲多讀書可以增加知識，多研究可以明辨事理，多寫作可以表達心得。當時爲實行疏散，編輯部、排印工場及經理部都集中在距市區十餘里之遙的化龍橋鄉間，採訪組及城區營業組則在城內新街口。兩個工作中心，各有各的讀書團體，大家互助，每人每星期要讀完一本書。每隔一星期，兩部門的人，都在化龍橋集會一次，由各人報告讀書心得，或擬定一個題目，由大家發表意見，或請專家來作兩小時的講演。每次討論的時候，大家興高采烈，反覆辯論，有時各持己見，爭得面紅耳赤，但不傷和氣，博生先生稱爲這是他每兩週中最愉快的一天。而同仁們也都欣然踴躍參加，從無規避等情事，無異編經兩部人員的大團圓。這個集會，在博生先生主持中央日報二十五個月中，從未間斷過。

博生先生主持中央日報的時期，也是中央日報最艱苦的時期。他爲社務瘁盡心力，受盡艱辛。遇著外來的拂逆，只有悶在心裏，從不發牢騷，或向人訴苦，更從不表現頹喪。那時日機不斷來襲，大家精神體力備受威脅，化龍橋又是瘡區，同仁中患瘡疾者頗多，服食奎寧丸無效，人手不齊時，他也協助編稿，直到深夜才坐著那輛破車回去，有時車子還在半路拋錨。

(六)

民國三十一年，博生先生離開中央日報，仍回中央社，當他在任中央日

報社長時，中央社仍兼任顧問，所以，並未脫離中央社的關係。民國二十七年，他即以望重被遴選為國民參政員，連任達三屆之久。他在參政員的議席上，不多發言，而對於有悖事理，則無不疾言厲色的加以指斥。湖北參政員孔庚提倡中醫，反對西醫，甚至辱罵反對他的主張的人，博生先生乃憤怒的加以還擊，這是難得見到他的盛怒。還有一次，是左派文人沈鈞儒在會議席上提議組織蘇聯慰問團前往莫斯科，博生先生洞悉其用意所在，在大家沈默中，他突然登台發言，慷慨激昂的加以反對，認為無此必要，全場掌聲雷動，沈案終於被決議保留。

抗戰勝利，博生先生代表中央社赴日參加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在東京灣米蘇里軍艦上的受降典禮。三十五年，又參加記者團赴日訪問。三十七年，政府實施憲政，他被新聞界選舉為立法委員。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他攜眷來台，在那段兵荒馬亂，人心惶惶的日子中，他仍不灰心，除繼續指導中央社的業務之外，並以中央社為先導，提倡新聞寫作用語體文運動，從此改革了多年來半文言半白話的寫作積習。三十九年六月，他辭去中央社的職務，專任立法委員。在這段時期中，他憂心國事，意態頗為蕭索，平居除到立法院開會之外，偶然為新生報寫幾篇專論，很少出外。有時也在家裏與幾位老朋友打打小牌，晚上則相聚一起喝點酒。他的酒量一向很好，常聚的朋友也不乏好酒之士，蕭同茲先生伉儷就是常客。當他高興的時候，談笑風生，豪情仍如往日。四十一年，已故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先生於寓所設宴請客，座上都是平時常聚的朋友，博生先生因多喝了幾杯，離座時跌了一跤，腿骨受傷。從此便家居休養。後來發現有心臟病，酒不能喝，牌也不能打了，當然影響他的心情。夫人陳淑貞女士日夜隨侍，雖經不斷延醫診治，仍難痊癒，終

於四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卒於寓所，享年六十七歲。新聞界人士爲紀念這位先進，特發起募款設立陳博生先生獎學金委員會，以培育新聞界繼起的人才，效法他的生平言行。

(七)

綜觀博生先生一生，有幾點我們必須認識的是：

第一，他雖在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以前即在北方工作，彼時處於北洋軍閥統治下，但他始終篤信民主法治爲建立現代化國家必循的途徑。他以新聞界的立場，堅決的主張維護新聞自由。因此，他反對軍閥的獨裁政治，也反對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在幾十年的變亂中，他的多少朋友轉變、動搖了，他卻永遠堅守立場，不向任何政治誘力與壓力屈服。他是老報人，不做官，也不做生意，不投機，也不取巧。他的正義感、愛國心，老而彌篤。

第二，他是具有高風亮節的書生，平日對人是溫和有禮的謙謙君子，但如遇有違背他所持的原則，則絕不讓步，表現其不畏強暴，不屈權勢，勇於赴義的精神。他對爲他所鄙視的議論，一定嚴詞譴責，對新聞界發生的醜行劣蹟，尤爲痛恨。民國三十七年在南京新聞界發起的整肅運動，他就是全力支持的一人。

第三，由於他的勤於求知與努力工作，他能永遠跟隨著時代進步而不落伍，他的建議與意見，總是匡時益世。他在重慶時，對日本政情的分析，曾爲最高統帥當作對日決策的重要參考資料。

第四，他爲人有嚴正的一面，也有輕鬆的一面。經歷很多，涉獵很廣，知識也很淵博。他的談話，極爲風趣，酒酣耳熱之際，更是高談闊論，有時使人捧腹大笑，有時則諷世嫉俗。他厭惡那些倚老賣老與趾高氣揚的人，新聞界有些自命不凡之徒，見之因而不免生畏，卻又不敢不敬重他。所以，他在新聞界永遠被人所喜愛、所懷念。

報壇尊爲南潘的潘公弼

新聞界三位屬羊（乙未）的老報人，今年都屆九十高齡，一爲中央社故社長蕭同茲先生，一八九五年農曆九月十八日生於湖南常寧；一爲現仍健在的國策顧問曾虛白先生，一八九五年農曆三月廿五日生於江蘇武進；一爲中華日報（南社）故總主筆潘公弼先生，一八九五年農曆二月十三日生於江蘇嘉定。本文專談公弼先生之爲人與治事。

公弼先生成名很早，當年在上海望平街主持時事新報筆政約二十載，議論風發，傳誦遐邇，可謂名滿天下。與天津大公報總主筆張季鸞先生齊名，有「北張南潘」之稱。

公弼先生的大名我雖仰慕已久，但獲識先生還是在他來台之後。蒞台初期，他暫住臺北市安東街蕭同茲先生家裏，我是蕭府常客，既早已心儀其人，難得獲此親近就教的機會，彼此又都喜歡喝兩杯，因此常常把酒傾談，結忘年交。民國四十年，我奉命接長中華日報，敦請先生擔任南社總主筆，公私接觸的機會更多，後來他雖然舉家由香港遷往台南市，但有時我南下，有時他北上，我們總有機會相聚深談，即使不在一起，遇到某些問題，也會以書信往還或通電話來討論，他很欣賞我「有信即覆」，認爲是我的長處，我也極愛先生函札的書法，一如讀明人小品。自他移居來台到仙逝這一段期間，我應該算是來往最密，也對他最爲瞭解的衆多友朋之一。

先生恂恂儒者，說話輕聲細氣，與之交如飲醇酒，使人有即之也溫的感覺。但遇事果斷，重大節，卻也不疏略細處。他的文章，一如其人，流暢而嚴謹，早年很多作品，曾被收錄入教科書作為教材。立身處世，有所為也有所不為，抗戰期間，上海被敵人攻佔，他奉命留滬，住在英租界跑馬場公寓，從事地下工作，但因名氣太大，無法隱諱行跡，汪政權想羅致他為教育部長，他毅然予以拒絕，因此無法在上海繼續居留，間關萬里潛回陪都重慶，襄贊中央黨部故秘書長吳鐵城先生處理機要。抗戰勝利後，奉派為中宣部東北特派員，接收新聞事業，未幾，共黨倡亂，東北淪亡，先生奉命去香港，籌辦國民日報——香港時報的前身——到卅九年才由香港來台，四十年起一直在中華日報（南社）主持筆政，以迄逝世。

先生在上海時事新報主持筆政，也擔任過社長、總經理等職務，對於辦報，經驗非常豐富，參加中華日報後，我陪他到台南赴任，第一天他對南社同仁講話，就指出：「辦報人成功的歷史很短，只有一天，明天如果不努力，就會遭到失敗。」他這段話給我的啓示很深，以後我主持中華日報，常引用來和同仁共勉，真是兢兢業業，一時一刻也不敢稍有鬆懈，中華日報在我接事時危危欲墜，以後能業績日進，轉虧為盈，可以說都是拜公弼先生一語之賜。

先生在台南，每天必寫一篇方塊，論述地方問題，由於他犀利的筆觸和正確的立論，引起很大的迴響，對南部地方不但有很大的影響力，也交了很多朋友，台南地方人士，遇有重大事件，都會向他請教，尊之如大師。

我接掌中華日報的時候，不少人主張專辦南部版，改爲地方性報紙，雖經我力陳反對，但這些論調仍隱隱存在，公弼先生到台南觀察一段時間後，他認爲朝地方性發展並無不當，如其內容能夠卓越，銷場自然不至爲地方所限制。他那年給我的信裏說：

「現代報紙迥不同於文人論政時代，故物質基礎務求厚實，組織與員工務求精簡，要以能刻苦作戰爲第一義，業務固應有假定目標，但同時亦須有最壞的打算，社會麻木、反應遲鈍，故求其一鳴驚人，殆有難能，是唯有積以時日，再鳴三鳴之不休，始有功效可睹，台北是逐鹿之場，若求出人頭地，不免事倍功半，倘以廣泛的農村爲對象，在南部先行立定腳跟，亦當有遠大前途。所謂地方報，絕非輕蔑之詞，內容卓越，其銷場豈地方所能限制，倘各地報紙平衡發展，則各受地區限制，誰是地方報、誰不是地方報？若中華南部版以地方報自居，一面有其特別努力之處，自所應爾，但一面因此而忽視國際新聞，則不成理由……」公弼先生精闢的意見，成爲以後中華日報南社發展的指標。

先生雖然名滿天下，但因爲人耿介，生活一直很清苦，幾度逃難之後，到台定居時，更是家無長物，他給我的信說：「一生因人成事，始終未曾自作打算，遂至老來仍不能自存，近年更困頓，身外已無長物……」文人命蹇，大多類此，他從不以窮困爲念，每有文酒之會，他也總是笑逐顏開，工作的時候，總是一心專注，精神奕奕，從不作窮愁潦倒之狀，其修養工夫，真是高人一等。

先生愛人以德，我們締交以後，更是視我如弟，知我喜歡杯中物，他不勸我戒酒，只是勸我節飲，給我的來信中，常常提到，但總是非常委婉

的規勸，如：「惟酒能亂性，醉時尤蔽智慧，固盡人皆是如此，兄非例外，弟輒爲此懸懸，弟已垂老，兄亦中年，自此相約節飲如何？忝在交末，幸恕狂謬不莊勿罪。」他對於飲酒，也有特別的看法，他曾於信中說：「如薄飲至適可而止，智力以酒力而昇華，是人勝酒。若縱飲而醉，神志昏然，言行皆爲酒所役使，是酒勝人。控制酒者自勝，被酒控制者，雖由好勝，然終自敗矣。」這些殷殷教誨，委婉陳言的話，真是如長兄，如師保，令人永遠無法忘懷。

先生逝世時，才六十七歲，距今已廿三年了，先生和同茲先生一樣，都因心臟病突發去世的，當他倒下來的時候，我已離開中華日報，聞訊匆匆趕往台南，襄助治喪，途中忽然記起他生前一句戲言，那是樽前薄醉時說的，他說：「我這一支筆，曾經使許多達官顯要倒下去，也曾經使一些人騰達起來，但我這一支筆，還沒有老呢！」

先生雖逝，風範猶存。

(原載七十三年傳記文學月刊第四十四卷第五期)

魏景蒙的真性情

三爺傑米魏（James Wei）逝世將一年，我沒有寫過悼念的文字，一因傑米去得太突然，使我一直不能接受這個悲痛的事實，每想起三十餘年來常見面的一位摯友竟然就此永別，傷感自然難以自抑；再則傑米魏交遊極廣，去世後各方好友悼念的文章，發表了很多，對他的治事、為人、學識、才華、風趣等等，每一個角度，幾乎都已有人提及，使我有不能更贊一詞的感覺。

今年十月七日，是傑米逝世一周年的忌辰，傑米一手創辦的大同文化基金會決定收集友好所發表的追念文章出一本文集作為紀念，編者要我寫一篇代序，想來想去，想起與傑米把酒論交數十年，談談傑米與酒，也許還能見其至性至情的一斑。

有人說找女婿最好從他玩牌時去觀察，從玩牌中很容易顯露出性格，我想從飲酒去衡量一個人的品行，應該也八九不離十。不是也有酒後見真情的說法嗎？

我和傑米都喜歡喝兩杯，也都愛交朋友。公餘之暇，三五好友，把壺傾談，一杯在手，酡顏相對，總覺得格外明快。

數十年來，我和傑米同席過大宴小酌不計其數，從酒來看傑米，他的確可稱之為君子而無愧。如果從酒量、酒德、酒品、酒膽和酒風來作評鑑，傑米酒量不過普通而已，酒膽更不大，但酒德和酒品都可稱上乘：

他從來不灌別人的酒，遇到友好薄醉而向他進攻，他也從不掃興，有時真的不勝酒力，他會觀機中途逃席。常常在宴會進行中，傑米忽然不見，這時他一定是因有了酒意，不敢再喝，遁了。傑米的酒風更好，因為他擅言詞，諧談笑話，層出不窮，有他同席，總是滿座春風。他模仿國大故秘書長洪蘭友的江北話、行政院故院長閻錫山的山西話、某日本學人在北京大學所講的英語、某日本海軍大將的日本話，以及廣東人所講「江山搖搖動」的笑話，無不唯妙唯肖，令人捧腹，而且因為他擅於表達，妙趣橫生，雖重複再三，也百聽不厭。

台灣光復不久，他擔任中央宣傳部上海辦事處主任，民國卅五年間，他率領了一個外國記者團來台，那時我代表記者公會在新蓬萊餐館招待他們，三杯酒過後，傑米表演了他的語文天才，淋漓盡致，不知怎麼談到西遊記，為了表演孫悟空，傑米還在地上打起筋斗來。

傑米擅諧談，酒後有時也葷素雜陳，其實只是展現其至情至性，並不影響到他嚴肅的一面，有人以為不登大雅之堂，其實純屬錯覺。當他擔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時，也有人擔心他是否適宜那種職務，事後證明實在是多慮。幾年的公職，由於他隨和勤勉，毫無官僚習氣，不但贏得了部屬的敬愛，也深受國內外記者的熱愛，工作推動得非常順利，也幹得有聲有色。

晚年的葉公超先生，心情落寞，有好幾次傑米和我陪他同席，公超先生終席一語不發，或者有時對傑米發言，往往不按牌理出牌，傑米總是舉杯相向，笑語怡然，真是堪稱知心「老朋友」。

傑米去了，去得那麼突然，每次碰上飲酒的場合，舉樽之際，總想起他

的神態。他生前曾和我開玩笑，說如果他先走被送到殯儀館，我去弔他時，他一定從棺木中起來，到門口和我握手。那天我去殯儀館，想起他這一句話，心中倍感淒然。

(原載七十二年魏景蒙先生紀念集)

世新傳播學院創辦人成舍我

一生致力於新聞事業以辦報始，而以培育新聞人才終的成舍我先生，因不堪癌疾的侵襲，已於本年四月一日黯然離開這個他所關心的充滿新聞挑戰性的動亂世界了，享年九十五歲。

舍我先生，我們慣以舍老尊之，成名甚早，早年他在北平創辦世界日報及北平世界新聞學校，便以不畏強權與惡勢力，盛名滿天下。當時憑他的剛正不阿，為新聞事業樹立了正義凜然，不屈不撓，為人崇敬的典範。來台以後，我以新聞界前輩相尊，互有往來，從私誼到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的創立，我對他亦師亦友，道義相交，逾四十年的多難歲月而無間。世界雖在變，而我們的交誼卻有久而彌堅的感覺，這是我在新聞界所尊敬的耆宿中最不易得的。

世界新聞專科創校是舍老的夙願，民國四十五年，世新囿於規定，先以新聞職業學校而創設。發起人都是新聞界碩宿與社會名流，有于右任、王雲五、蕭同茲、林柏壽、成舍我、黃少谷、李中襄、端木愷、程滄波、陳訓愈、阮毅成、張明、游彌堅、郭驥、謝然之、閻奉璋、辜振甫、辜偉甫及我等十九人。創校後，我便忝為董事之一，其中雖曾略盡棉薄之力，但談不上有什麼貢獻。而舍老於我，曾以排艱任難之重相許，多次希望我能將全部的心力投入世新，為世新作育英才共創新的事業。然而，我只有在他當校長的那個時代，充任了九年的副校長，並兼任報業行政科主任，且開了一門世界報業史的課，實在有幸厚意。我們

這個社會，品評人物，往往只從表面不求甚解的來論定，因而也有許多作評的人並不真正的瞭解舍老、認識舍老。殊不知他那種氣勢磅礴的欲開風氣於先，高瞻遠矚的努力，與振興新聞事業爲己任的抱負，絕不是泛泛之論者所能盡知的。我於此特就四十多年的相交，略述數點。

第一、舍老的一生爲新聞事業而盡瘁，貫徹始終，一心一德，從未改其初衷。無論辦報或作育英才，他的最後目的，還是爲新聞事業而奉獻。有兩點最值得我們的欽佩：（一）他是具有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但是，終底於成。北平辦報，台北創校，都是缺乏雄厚的財力，無異白手起家。溝子口山麓那片荒地，當年雜草叢生，闐無人跡，誰知三十多年後的今日，卻成為高樓矗立，莘莘學子學於此、育於此的高等學府。這種自力更生，成功操之於己的擔當與作爲，無人能之，只有舍老能之。（二）舍老擇善固執，只要他選定的方向，他的字典中真像沒有難字，毅然獨往，無人能改他的意志，也無人能變他的抉擇。他在戰前十里洋場的上海，創辦立報，周旋於各大報之間，居然獨樹一幟，成爲小型報之冠，確是不易。民國七十七年，他仍將立報在台復刊，於是，辦報創校，光耀他辛勞的一生，捨此別無所圖。

第二、舍老涓滴歸公的精神，爲人所不及。世新在筆路藍縷，以啓山林中成長，當初財源匱乏，艱困可知。但是，當很多私校都在紛紛向銀行貸款時，舍老卻能獨力撐持，從未向銀行貸款，亦從未向親朋訴苦。投艱負重，一步一步的邁向爲世新發展的崎嶇途徑。所有收入，取之於學生，用之於學生，涓滴歸公，從未及私。他自己雖過著極爲簡樸的生活，仍然樂在其中，樂而忘憂。他的希望無他，只是世新的發展、世新

學生將來的成就。他的擇善固執，雖秉承於儒家的美德，而他刻苦耐勞的精神，卻有類墨家。所以，世新之有今日的盛況，飲水思源，無不是由他的銖積寸累，涓滴歸公，有以致之。

第三、舍老的儉約美德，久為眾所周知。我們的祖先，都主張以儉養德，當時代尚未轉型為經濟繁榮、物資充盈的工業社會時，儉約自然是眾人所尚。舍老是湖南湘鄉人，他的鄉賢曾文正公，便曾有儉約者才不求人之語。舍老一生的事業，從不求人，正與曾文正公所見略同。所以，他的儉約，這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他不但於公儉約，於私同樣的嚴於律己，杜絕侈靡。當年他應邀赴美訪問，以代理校長相囑。那幾間簡陋的教室，因陽光西曬太烈，學生們幾難安坐上課，於是我便設法僅以原價三分之一購得了絲絨做成了窗簾。後來舍老回來看見，認為質料還可以再省一點。像這樣的儉約故事很多，親朋們都引為美談。這種精神，我們如從他臨事不苟之處來察看，內涵多少還是潛在著中國傳統的美德。

第四、舍老事必躬親，好像他有用之不盡的充沛體力，鉅細不遺，纖芥不苟，連年輕的人都自嘆不如。近年因視力受損，只留一眼尚能見物，但是他精神抖擻，看書辦事，仍然無異於平時。世新改制為專科後的那幾年，舍老對學生們的課業，十分重視。尤其國文一課，認為非認真的教學先紮下底子不可，於是經常獨自走入教室，靜坐後面聽講。老師們所批改的作文簿，每到學期終了，也須送到校長室由他親自審閱。有人戲稱，這是他在考老師，那些堆積如山的作文簿，在他的眼底，老師們是無法打馬虎眼的。後來世新學生大增，他無法逐本細閱，於是便改由

每班選出幾本最好的與最壞的，由他查閱。據聞曾約農先生任東海大學校長、于野聲（斌）先生任輔仁大學校長時，也曾同樣的認真查閱學生的作文簿。

舍老既能文，亦能詩，只可惜他所寫的專論或隨筆之類的作品，迄未加以整理彙印，未能傳世。這裏抄錄他的郊居與八十自壽兩首七律詩，郊居一首，當時和者極衆，我們也可以從此窺見他真率的一面。原詩云：

郊居

十載流離此結廬，敢云大隱在名都。
江山信美吾思蜀，薪膽於今孰沼吳。
垂老喜聞兒輩健，無求自與貴人疏。
門前偶種先生柳，禽鳥時來慰索居。

八十自壽

八十到頭終強項，敢持庭訓報先親。
生逢戰亂傷離散，老盼菁英致太平。
壯志未隨雙鬢白，孤忠永共萬山青。
隔洋此日勞垂念，頑健差堪告故人。

舍老手創的世新專科學校，下學期便將改制為學院，可憾的是他未及目睹改制便已遙遙的離開我們了。陸放翁弔張才叔諫議，有「許國肺肝知激烈，照人眉宇尚崢嶸」之句，輾轉沉思，實為舍老的寫照。

(原載八十年傳記文學月刊第五十八卷第五期)

一代奇才葉公超

提起李白，除了詩忘不掉他的酒；提起徐志摩，除了散文必不忘他的愛；說到葉公超先生，除了他的外交成就與風流文采，我們也忘不了他的脾氣。

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我主持台北中央社的社務，四年後，大陸變色，中央政府遷來台灣，公超先生長外交部，由於業務上的關係，我們有所接觸，這是我們認識的開始。當時公超先生的機要秘書是我的學弟鄭錫霖（現在美執教），透過他，知道當時的外交部長葉公超、政務次長胡慶育和常務次長時昭瀛，他們三位無論學養、才情，樣樣出類拔萃，人稱「外交部三傑」。

陳辭公兼行政院長時，公超先生是外交部長。

陳辭公規定公務員不得上酒家，並將酒家改名為「公共食堂」，限定宴席價格，提倡節約，以端正社會風氣。

民國五十三年，蕭三爺（中央社故社長同茲先生）七十歲生日，林四爺（柏壽先生）在家設宴慶賀，公超先生和前內政部長連震東等被邀作陪。飯後賓主酒興未盡，繼往東雲閣公共食堂續飲，公超先生不忍拂主人盛情及興致，以閣員之尊，也到東雲閣坐了半小時才告辭離去，這就是他不畏俗議的地方。

公超先生任駐美大使時，我適應美國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

之邀，到華府訪問，他有時感到寂寞，要我帶趙培鑫唱的平劇錄音帶給
他，一切遵辦，他非常高興。

對於鄉土和家族，他有一份特別的凝重，台灣葉氏宗親會第一次是我陪
他去參加的，自從那次以後，只要他在台北，每年一次的祭祖必定躬
親，三十年不變。

公超先生卸下駐美大使職務之後，暫居松江路。這時我也已經遷居至松
江路了，同住一個巷子，我們成了鄰居，他的門牌是十八號，我是二十
二號，往來極為密切。他有空常來我們家午飯或者晚飯，他吃得十分隨
便，並不挑剔，就是那一段時間我們有了很深的認識。

後來他搬家天母，上午進城開會，下午如果沒會即直接返家休息，午後
倘若仍有事，則習慣性的留在我們家中吃中飯。飯後，我們給他枕頭和
毯子，他就在客廳長沙發上假寐，我們也不理會他，自己上樓做自己的
事，而他總是休息約莫一個鐘頭，自己開了我們家的大門離去。

公超先生在寒舍吃中飯的那段日子，他已卸下駐美大使重任，無官一身
輕，而我也已辭去報社之職，閒散在家。由於我們兩人都稍懂得吃道，
乃說我們何不合開一家鴨麵店，用我們的姓氏，取名「二葉莊」。我們
很當一回事的策劃著，地點也擇定了——在南京東路與吉林路交叉口的
空地上，準備以竹片圍成別致的店面，裏面隔成兩部分，一部分專賣鴨
湯麵，佐以各種中國酒及肫肝滷菜等等，另一部分則出售公超先生的字
畫。

話說回來，所謂「二葉莊」鴨麵店，只是我們一時興之所至的設想，後
來自然無疾而終，如果夢想成真，則我們兩人不但是好鄰居，還可以成

為最好的生意合夥人哩。

內子（華嚴）與我育有三女一子，子名文立，女爲文心、文可、文茲。公超先生看著他們長大，非常疼愛。

公超先生做鄰居時，小女兒文茲就讀台北中山女高，每天清晨背著書包上學，出門時總會遇見正在散步的「葉伯伯」。

文茲在前頭走，葉伯伯就在後面跟。文茲怕他那人人都認識的臉孔，回頭說：「葉伯伯，你別跟我嘛，你太討厭了。」文茲越害怕，他越愛逗她：「誰說我討厭，我非要跟你走一段路不可。」公超先生一向愛小孩，在小孩面前他是一點架子也沒有的。

這時長女文心已從北一女畢業，在台大歷史系讀書，她聰明，書唸很好，公超先生因此說要收她做乾女兒。民國六十六年公超先生到舊金山、華盛頓主持華語教學會議，文心已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歷史博士學位，公超先生特別去找了文心，和她暢談中文教學在國外的問題，數小時不疲。

有一年，政府邀請一位西德女作家來台訪問。因為華嚴與我甫自西德回國不久，有關單位希望我們夫婦做一次東，宴請這位女作家。公超先生住隔壁，我們因有他在座是件爲國爭光的事，所以邀其作陪，他也慨然允諾準時而至。

我們向那位女作家介紹：「這是以前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精研書畫的葉公超博士——喬治葉。」未料此位女作家並未聽見過他的大名，表情茫然之餘，竟再度向公超先生探問貴姓大名之類的話，公超先生面有愠

色，悶聲不答。女作家不察，再度問詢，公超先生遂一言不發離座而去。

第二天早晨他來家解釋：「那個人既然不認識我，我也和她沒什麼話好說，下次這種飯我不吃。」我覺得很抱歉，對他這種與眾不同的個性脾氣也見怪不怪。

我和公超先生一起有過兩次旅行，一次是民國五十四年九月，吳三連先生邀請葉公超先生、蕭同茲先生、黃少谷先生、黃雪邨先生夫人和我與內子，從台北下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做一星期的遊覽，參觀吳三老所領導的關係企業。

另一次是十餘年前黃少谷先生生日，蕭三爺、公超先生和我一起下高雄陪他旅行，然後三爺有事先北返，剩下我們三人連袂到鵝鑾鼻、墾丁公園遊玩，還去了四重溪洗溫泉。

這兩次旅行，公超先生從始至終遊興盎然，不獨不曾發脾氣，在第一次吳三連先生邀約的那次旅行中，在台南縣鯤鯓廟參觀時，他還拉著我到石階上說：「來，我們兩個人裝成不認識的陌生人，照張相。」我看他那頑皮少年的神情，也就笑著和他演起戲來，兩人煞有介事般握著手說：「某某先生，你好啊！」旁觀諸位都哈哈大笑。

公超先生七十歲生日的那年，大家在台泥大樓三樓為他慶生。事前我們問他，希望怎麼過生日，公超先生說，他對「針灸」很有興趣，於是大家替他籌募了一筆賀儀，轉置為「中華針灸科學研究基金」。他一直就是這樣熱中有關中華文化的一切。

他非常喜歡有才華的年輕人，不論畫家、文學家、學者都是他樂於交往的對象，並給予他們最多的鼓勵和支持。

公超先生長我十多歲，因同姓「葉」，我問他：「究竟該怎麼稱呼您呢：稱『葉先生』太生疏，『宗兄』呢，我不敢；稱『公公』呢，未免太重，如何是好？」他說：「就叫葉公超。」我說：「那有膽叫『葉公超』呢？連名帶姓的不禮貌。」他說：「那學洋人叫George好了。」

後來，周榆瑞（聯合報駐英特派員）兄回國，榆瑞兄是公超先生的學生，我請他們吃飯。飯前我稱公超先生為「George」，飯後榆瑞兄偷偷問我：「你怎麼這樣稱呼他呢？他還是我的老師哩。」我答：「這是他要我這樣叫的啊！」

有一天，周書楷大使告訴我：「公超對你很不高興，說你叫他『George』。」

過幾天，我見了公超先生，我叫「部長！」他問：「你怎麼這樣稱呼我？」我說：「哦！大使！」他連問：「你怎麼回事，對官銜有興趣起來啦？」我道：「那您真弄得我左右為難了，你到底要我怎麼稱呼您呢？」他大笑。

今年他過生日，農曆九月十二日正是陽曆十月九日，國賓大飯店董事長許金德先生要替公超先生過生日，由我打電話與他說定八日為他暖壽，另外並邀請黃少谷先生、黃達雲先生、袁企止先生、張麗門先生和吳三連先生、魏景蒙先生等幾位公超先生的老友作陪。

六日那天，他突然讓黃秘書連香小姐打電話來說八日不參加了。我說：

「他是主客，主人家帖子都發了，什麼緣故他不參加？」黃秘書答：

「他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就是不想參加。」我很生氣，如此一來怎麼向陪客及金德先生解釋？下不了台。

他的老大哥張麗公（前經濟部長茲闔先生）要我打電話給公超先生，無論如何要他參加，我說不打，恐怕兩人在電話中會吵起來。

七日中午黃秘書又來電話說，公超先生還是決定參加，而且還要帶剛由美回國的劉鍇大使同來。

八日晚上他來了，我笑說：「我可沒發脾氣啊！」他則面無表情的告訴我：「我只能坐半小時就走。」又說：「我現在什麼東西都不能吃。」

結果，坐定之後，他非但談笑風生，而且坐至九時後仍無去意，菜呢，則從第一道吃到最後一道，沒有一道遺漏。

公超先生雖官居顯要，但經濟情況常常顯得拮据，其中有兩次是我替代設法解決的。

一回是公超先生寫了兩副對聯，一副由我拿去給台省故議長黃朝琴先生，一副拿給林柏壽先生，為公超先生濟急，以他的才情而至於如此，思之愴然。

有人說公超先生脾氣壞，脾氣怪，其實他是坦率，不矯情控制自己的情緒。

故胡慶育大使曾描述公超先生的性情說：「公超一天的脾氣有四季——春夏秋冬，你拿不準去見他時會遇到那一季，全憑運氣。可能早上去看時好好的，下午就被罵了出來。」

他的老弟鄭寶南大使說：「我們都很瞭解他，他發他的脾氣，不理他一下子就好了。不瞭解他的人跟他認真就糟了。」

我則常開他的玩笑：「你是讀書人的脾氣，你們家出才子；我是山鄉野人的脾氣，我們家鄉浦城，在閩北一帶，地處高山，盜賊如毛，一共只出過三個留學生。」經常逗他與他作對，他拿我沒辦法，只故意在我內子面前說：「葉明勳這個人最壞。」

二十年來，公超先生一直抑鬱寡歡，過去的風流倜儻不再，晚年尤其老態十足。張麗公常勸他：「你這一生，中日條約、中美協防條約都在你手中完成，已經足夠了。輕鬆、輕鬆吧！」

公超先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但是在這一方面卻不能釋懷。

這次他在榮總跌跤腿骨折裂開刀，十一月十八日下午華嚴與我相偕到四十五病房第九室探望他，一進門他就一手執著華嚴的手，一手掩面唏噓起來，自己說：「見到老朋友，我就忍不住要哭。」

病床上的公超先生緊緊地抓著華嚴的手，不斷的問：「你們要走了嗎？你們要走了嗎？」臉上的神情孤獨寂寞，待我們走時，他突然睜開眼盯著我看，至今想著，十分難過。

十九日我又往榮總去看他，誰料他已因心臟病突發，送入加護病房急救，終於不治，在二十日上午九時零五分與世長辭。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天移靈至榮總後山的懷遠堂，我去了兩次，在靈堂逗留頗久。

生前他曾刻有「公超長壽」圖章一枚，最喜用在所寫字畫之上。靈旁冥

思，竟突發奇想：公超先生可會一如生前之倔強，對閻王老爺拍桌大
吼：「你召我來，我偏不來。」隨即轉身返回人間？

魂兮歸來乎，公超先生！

(原載七十年十一月三十日聯合報)

楊亮功忠言空許

正當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報告將完稿之際，突聞亮功先生作古！亮老於四十六年前曾以閩台監察使的身分，成為二二八事件撰寫調查報告的第一人。那篇報告在監察院塵封了四十二年之久，至七十七年始行公布與世人見面，至今談二二八事件者，都重視那篇不但內涵翔實，而且分析周詳的報告。

我與亮老相識甚早，那是追溯到台灣光復之初四十七年以前的往事。當時亮老所設的閩台監察使辦公處在台北市幸町，即今濟南路，而我的住所在長官公署斜對面，即今市議會舊址。我們相去咫尺，遂經常往還，亮老當時五十歲剛過，而我則僅三十多歲，亮老器度豁達，學問淵博，我以長者視之。當時我是中央社台灣特派員，承亮老的厚意，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中央社在台未設分社以前，便馳電中央社總社社長蕭同茲先生，促請早設台北分社，擴展業務，並推薦我為分社主任。我在經常請教他有關建設台灣問題之後，從公而私，建立了極為可貴，坦誠相見的忘年之交情誼。亮老雖以學人從政，但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世人心目中所稱學優則仕的現實習性，在他的言行中只有蘊藏著以中華文化為導向，淵源深遠的支流，與之交談，如坐春風，令人有一種心嚮往之的欣慰。他雖在美留學達七年之久，擁有當時罕見的史丹佛大學哲學博士榮銜，卻恂恂如常人，眉宇之間，充滿著老成謀國，丹心在抱的忠誠之氣，謙沖自處，不慍不怒，從未見其一語以自尚，或一語以貶人。這種修養，

真有汪汪如萬頃之陂的境界。而他對台灣所秉持的殷切關注之情，卻純然是古之大臣憂國憂民的典範。

我們都知道陳公洽（儀）主持台灣省政時代，最失敗的就是不知民瘼，不能以民樂者為樂，民憂者為憂。這是遠離群眾，與群眾自掘了一道隔閡裂痕的結果，彌補裂痕，需要溝通，也需要管道。但是，陳公洽剛愎自用，從未注意及此，原有運用的管道，不知重視，自行毀棄，亮老就是最令人惋惜的一例。亮老以負有學壇碩望，各界共仰，他在政府高層次自然是最值得重視的管道，而且對當時台灣民間對政府施政的反應，也有相當的瞭解，他對台灣省政的應興應革，曾有不少的獻言。陳公洽對亮老雖相當的尊重，無如在他的心目中凡是中央機構，必欲持以距離。因而這些建議，表面上是諾諾稱善，而實際則從未以行動證明他的接納。當時我亦有若干意見，提供亮老參考，希望他能有所運用，亮老笑而不答，只說將向中央反應。——據聞南京舊存檔案至今仍有亮老的報告數厚冊，足以顯示他對陳公洽的失望，只有做到「知而不言，言而不盡」。我們回溯當時的情形，陳公洽對亮老尚且如此，其他如執政黨省黨部李翼中等有關管道，自然談不到運用或配合，我們所企求的政通人和，下情上達，自然渺不可及，於是終於發生了像二二八這樣千古遺憾的不幸事件。當時陳公洽如接納亮老的忠言，廣納各方意見，集思廣益，台灣的變局，恐又有另一番新的景象，二二八事件或可消弭於無形，亦未可知。

二二八事件發生初期，亮老不辭辛勞，披星戴月，從福州趕來，當時目擊劫難情形，真是百感交集。我曾隨亮老偕救濟總署台灣分署署長錢宗

起，搭乘一輛吉甫車，前往台北市各醫院慰問療傷及濟助受害人，這是我一生中僅見的悲慘鏡頭。台北市在浩劫之後，不但是死城，也是空城，街上一片死寂、行人斷跡，只有幾條野犬在那裡亂嚙著被人打死的屍體，屍體上沾滿鮮血，慘不忍睹。這些人都是從居處來到台北街頭，忽而禍從天降的被人打死。亮老對此慘景，悲從中來，臉色凝重，默不作聲，以監察使之尊，未能為民排難，其心情之沈重是不難想像的。

亮老今以九十八歲高齡遽歸道山，老成凋謝，舉世同悲，其一生對國家的貢獻，自宜付之國史。因有感亮老對台灣關切深情，忠言不為所用，今日台灣各界，恐所知者已不多見，特撰短文以悼之。

(原載八十一年一月十二日中國時報)

連震東三兩事

總統府資政連定一（震東）先生和我，最近七、八年來，只在每月十五日的慶生會上握手話舊。這個會，每次三席，大約四十餘人，都是一時碩彥。前兩個月，他突然連續缺席，後來始知臥病台大醫院，我曾去探望，不料噩耗隨之而至，他竟於本月一日辭世了。我心裏十分難過，真有老成凋謝的感傷。

我與連先生訂交，屈指已經超過四十年悠長的歲月。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之初，他是奉命接管台北州的大員，不久即受命爲首任台北縣縣長。我則是中央通訊社駐台特派員，奉命接管日本同盟通訊社台灣支社。後來我們在辜偉甫兄台北市南京西路十四號的寓邸時常相晤，於是私交益篤。連家與辜家，原爲世交。台灣光復，親舊劫後重逢，自然倍感親切。當時經常在座的還有李擇一先生。李先生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顧問，陳公洽長官對他很禮遇，他們都是早年留日的學生。台灣光復後，若干措施即出於李先生的建議。李是福建侯官人，與辜家也是世交，不但是一位傑出的日本問題專家，而且熟識當時日本當政的人物。但是他爲人卻充滿了中國典型的名士性格，不矜細行。我們幾人每週都有幾次對酒開懷的聚會。聚會地點，當然不限於辜家，也經常盤桓於當年著名的新中華。新中華爲首屈一指的交際場所，政府官員酬酢多在於此。服務生的素質，也不類一般酒樓中的庸俗。我們酒酣耳熱之際，各抒己懷，暢談社會百態，品評人物。連先生在談吐之間，顯見是一個風

骨嶙峋的人。這種風骨，也就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所崇尚的剛直性格。他挾有正義之氣，不阿諛、不畏讒。巧言令色，不但不容於他的坦蕩胸襟，而且也爲他最所不齒。後來他受命爲台灣省參議會秘書長，有人向陳公洽長官密告（秘書長爲政府所任命），說他上酒家，有礙官箴。陳長官爲此事當面問他，連先生坦率的說：「參議會負有溝通民意的責任，那些民意代表，習慣是經常上酒家的，我爲與他們溝通意見，職責在身，自然無法避免不到那些地方去。」直言不諱，不以爲忤。這是那些老於官場諾諾稱是的人所不能的。

陳辭修先生二度組閣時，連先生爲內政部長。某次，林柏壽先生爲中央通訊社故社長蕭同茲先生祝壽，在民生西路寓邸設宴慶賀後，酒興未闌，邀請部分賓客隨主人前往東雲閣公共食堂助興。當時厲行節約，所有酒家都已改稱爲公共食堂。衡之常情，部長之尊，是不便涉足那些地方的。但是，連先生不願拂逆主人的雅意，仍與外交部故部長葉公超先生一同前往，這是他真情的一面。

民國四十年，中華日報改組，黨中央內定連先生由社長改任董事長，社長一職，他希望由我擔任。有關單位當時向上峯一共簽報了三個人，連我在內。連先生爲了我，向故秘書長張曉峯先生以去就力薦。知遇之深，令人實在感動。當時的中華日報，處境艱困，人事也不怎樣健全。他徵求我的意見時，我認爲首先事權必須制度化，不能紊亂分歧，然後始能致力於業務的發展。他接受了我的意見，真是具有不恥下問的器度。我們共事的期間，彼此都很尊重。開誠佈公，合作無間。記得接任之初，員工欠薪達三個月之久，當我首次到編輯部巡視時，那張破舊得

露出彈簧的椅子，還戳穿了我的一條褲子，艱困的情況，不難想像。這些問題，後來終於不復存在。南北兩版的業務，如統一社論，擴充版面，交流人才，各項的革新，都得以順利的推展。如說當時的中華日報辦得稍有起色，連先生的支持，實在是最主要的原因。

這裏還需要一提的，就是民國四十二年，我與連襟辜振甫兄為慶祝岳母六秩大壽，在上海老正興菜館準備了八桌壽筵邀宴親友。當時我是中華日報的負責人，在黨忝為一個高級幹部，不知為了什麼，竟有人向本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密告，說我們為岳母祝壽，在蓬萊閣酒家設宴八十桌，在一次改造委員會的會議席上，把此事提了出來。當時台灣不如今日的繁榮安定，朝野都很重視社會風氣，此事當然引起在座的矚目。連先生為改造委員，便仗義執言的說：「這次宴會，我也參加，同座還有吳三連先生等，地點是老正興菜館，並非蓬萊閣。壽筵只有八桌，不是八十桌，所說完全與事實不符。我們中國人最講孝道，辜葉兩人的岳母娘家是板橋林家，以他們的家世與社會關係，就是擺上八十桌也算不得誇張。」真是一士諤諤，終於澄清了這個莫名其妙的報告。如非連先生之證言，我將不知受到怎樣的處分。

連先生如今已離我們遠去，音容宛在，人天永隔，緬懷典型，使我無限思慕與傷悼。哲嗣永平部長，博學有為，侍親至孝。連先生臥病在台大醫院時，他無論怎樣的忙，每天都前往侍疾，孝思不匱，親友們為之稱讚不絕，無愧為年輕一代罕見的典範。古人所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連先生在天有靈，也可以說未留遺憾於塵世之間了。

(原載七十五年十二月廿五日中國時報)

吳三連的風格

我們傳統的觀念，品評人物，往往最重視的是風格。歷史上如東漢的郭林宗、黃叔度，當時為什麼能以布衣望重一時，爲人仰慕，就是因爲風格高人一等。這種風格，並不在於他們的顯貴或權勢，而在超然物外的胸襟，恢弘謙沖的器度，與守正不阿的情操。立身出處，都能從大處著眼，蓄於內而不見於外，可以說是一種很高的修養境界。這類人物，對國家、對社會都具有不可缺少的影響力。我在台灣四十多年，各階層相識與接觸的人，上自廟堂，下至市井，雖然閱人多矣，但能有這種氣度的人，並不多觀。三老吳三連先生，就是其中風範凸顯而爲我所心儀的一位長者。

我荊識三老很早，遠在民國三十九年他當台北市市長以前。或許因他早年也當過新聞記者之故，所以彼此相投，都有一份異於世俗的正義感，我們的交誼，就是基於這種正義感而逐漸滋長的。民國四十八年，自立晚報增資改組，三老任發行人，許金德先生任常務董事，董事長仍由李玉階先生擔任，他們商議聘我爲社長。當時我由美返國不久，首先考慮的是自立晚報一向以無黨無派標榜，而我卻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恐怕立場難以趨於一致，置身其間，未免左右爲難，不易做好，友好亦多以此相勸阻。但後來中央黨部唐乃建（縱）秘書長再三的希望我能爲新聞界重作馮婦，各方也敦促至殷，數月之後，我終於同意挑下了這個重擔，一任即達六年之久。我們之間，三老與李先生爲無黨無派，我與許

先生則同爲國民黨黨員，後來彼此雖難免有不同的意見，但一切坦然，在無私、無隔閡的情況下，合作極爲愉快。而三老尤能相互的尊重，協調各人的意見，其立身出處，無不老成持重，能從大處來著眼。當時國家的處境極爲艱難，三老以在野之身，對國是所持的意見，平日無論處事或言談，也是同樣的顯示他能從大處著眼，一切以國家的利益為前提，具有公忠體國的典範。

民國三十六年，全國首次舉行國大代表選舉時，三老在台南縣以二十三萬票當選，爲代表中得票最高的一人，事隔四十多年，像這種衆望所歸的情況，現在恐已不爲一般人所知。後來他在當省議員的那段時期，尤令人敬佩的是，議會席上，懇切陳詞，質詢的問題，無不鞭辟入裏，坦誠而落實，所陳都是具有建設性及前瞻性的。這是當時台省周主席至柔先生後來當面對我談起的。當年的省議會亦極少毫無意義的叫囂，更無搶麥克風，大作政治秀的鏡頭出現。民意代表有此風範，當然一言九鼎，獲得朝野的重視，及輿論的推崇。以今視昔，能不令人感慨係之。此所以省議會的元老們，對三老的風格，至今仍如懷天寶遺事似的談論著，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亦只限於感嘆時光消逝的無情痕跡，如欲後浪中尋覓前浪所見的光芒，至今還是渺乎其渺的。所以，新生一代，當知如何從前輩典型中見賢思齊，汲取自我的教育，與自我的省惕。

三老雖爲無黨無派，但當他競選台北市選的市長時，仍得到執政黨的支持。記得他在中山堂以茶會發表競選演說時，竟有未爲黨方支持的人，憑一時意氣，不甘示弱的前往大放厥詞，事出意外，三老卻能無故加之而不怒，泰然自若，那種有容乃大的器度，見者無不讚歎。有人戲

稱三老是以肚皮辦事，意者，三老無愧如張岳公所常說的四川彌勒佛，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當我在自立晚報與三老共事時，亦曾屢見他處於逆境或遇阻力，都能同樣的從容不迫，舉重若輕，這種爲人所不及的涵養工夫，無異爲年輕的同事們上了示範的一課。

儒家以誠爲行動的基本準則，三老秉此傳統觀念，十分重視信諾，的確做到人無信則不立，貫徹誠的精神，弘揚誠的光輝。以我多年的交往，三老不但信乎友，也信乎事，事無大小，言出必行，千金之諾，在他只是行爲的一端而已。

當他受聘爲總統府國策顧問時，嚴前總統靜波先生事前曾邀我去面商，我答應代爲轉達總統的厚意。當時他在美未歸，我以越洋電話轉告，他的第一句話，就是表明立場，不是執政黨的黨員。我以政府延攬國之賢良，絕不問執政黨黨員與否相告，然後他始同意。此亦爲大處著眼的佐證。

台灣有很多對國家、對社會都有貢獻的當地耆宿，他們都不是執政黨的黨員，如林柏壽、陳啓川先生等人，都是望重一時的人物，他們的貢獻，事蹟昭彰，有目共睹。三老不是執政黨的黨員，而他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一般黨員實難企及。譬如現任台南縣長李雅樵在競選時，爲執政黨所提名，後來則因三老的支持影響而當選。他的作爲，捨國家利益、社會福祉不爲，無此恢宏胸襟的人，自然不足以共語。

(原載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國時報)

辜偉甫與榮星花園

偉甫（一九一八～一九八二）去世轉眼已經將近七年了，親友之間談到他時，他的飄逸而挾有英氣的風采，彷彿仍在眼前！他一生的事業，最重要的當然是為台北市留下了一個榮星花園，不料最近一年，卻因投資重建一案，涉及索賄，訴之公堂，喧騰報章，為社會帶來莫大的震撼。這是非常不幸的事件，絕不是偉甫生前意料所能及的。

偉甫在辜家排行老六，親友們慣以「六爺」呼之，他是我在台灣光復不久便相識的朋友，比起認識他的令兄「五爺」，後來也成為我的連襟的振甫兄，還要早一些。光復之初，我與偉甫經常相聚，我們是酒酣耳熱，無所不談的朋友，還有長官公署顧問李擇一、台灣省參議會秘書長連震東、台灣水泥公司總經理徐宗涑、中國航空公司台灣辦事處主任牛天文等人，其中以偉甫最為年輕，也最具有中國文人的書卷氣。我因虛長他五歲，他一直以兄長事我。如今這些朋友都已先後作古，每一念及，真如曹丕致吳質書所說的「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思之惘然。偉甫在光復之後，遠在三十多年以前，便有興建花園的構想。當時他將這個藏之於心的雄圖大略對我細述後，便託我先為這個花園命名，我起初為他代擬了十多個名字，卻都不合他的意，原來偉甫孝思不置，希望能藉此紀念他的尊翁顯榮先生，於是我另以顯榮先生名字中的「榮」字，與別號耀星中的「星」字，合而成為「榮星」，他始欣然首肯。「榮星」兩字的出處，就在於此。

榮星花園佔地共約一萬九千多坪，其中四分之三的用地爲偉甫所有，四分之一卻屬於公產。偉甫所有部分，並非祖產，而是由他私人向那些零星的地主先後分別購得的。這些土地，有的上有破舊建築物，有的是荒地。偉甫欲實現興建花園的計畫，自然須取得鄰近公產部分土地的使用權。當時台北市尙非院轄市，此事非先經台灣省政府的同意不可。偉甫先商之於我，後又請教於中央社故社長蕭同茲先生，幾經磋商之後，始由我陪同蕭先生與偉甫專程到中興新村，拜望當時的省主席周至柔先生。蕭先生爲新聞界先進，望重朝野，周主席對他頗爲禮遇，也很重視他的意見。當他申述偉甫的抱負與構想之後，因爲這不是圖利，而是一項爲地方謀建設，爲社會謀福利的計畫，周主席當即表示同意，並囑咐省政府地政局准予辦理租賃的手續。於是偉甫積極進行興建的計畫，主其事者爲他在民國四十五年所設的榮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同茲先生爲董事長，自任總經理。當時以新台幣二十萬元鉅款，邀請日本庭園設計專家，來台爲榮星花園作初步的設計藍圖，期望之高，於此可知。從拆除原有的破舊建築物到平土，從戡平零亂的殘垣斷壁到碧草如茵，工程極爲艱鉅，也極費時日。榮星花園前後經歷十二年，直到民國五十七年始告竣工，在隆重的開幕典禮後與世人見面。在台北市建設的里程中，這是不可缺少的一頁。

偉甫爲什麼不惜鉅資，興建榮星花園，這個構想，當然與他的熱中於文化事業、社會公益的性格是有關的。這種胸襟，完全出於儒家所崇尚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思想，孟子所謂「達則兼善天下」，庶幾近之。偉甫曾在上海住過一段日子，他雖未說過對當年上海膾炙人口，景色清幽的兆豐花園、法國公園的嚮往，但當他也有蘇東坡

在杭州時的感歎，覺得故鄉無此好風光。他心裏很早便立意興建一所理想的花園，也很早便有一幅美好的花園藍圖。榮星花園興工後，他曾朝夕與共的投下了不少的心血，從風格、結構到花木的如何移栽，一草一木，方寸之地，點滴之微，都絲毫不苟，其中不少花木，就是經他親自下鄉，遍及全省各地，選購而來的。當時有人讚譽園內具有歐洲的風格，偉甫笑而不語，其實，一切無不是憑他情之所鍾，對美的追求，匠心獨運的策劃。我們徘徊其間，如步入美的世界，領略到美的感受。榮星花園從此為空氣污染的台北市開拓了另一清新的、美的天地，也為市民們提供了前所未見的休閒空間。這種奉獻的精神，實為人所不及。

榮星花園開幕後，台北市已升格為院轄的特別市，但是，以視現代化國際水準的都市建設，還是瞠乎其後的。榮星的出現，自然為台北市妝點了無限的庭園風光，於是前往遊覽的人應接不暇。其次，先總統 蔣公也聞悉台北市新建有一個榮星花園，他輕車簡從，前往遊覽，對園內的花木扶疏，碧草如茵，設計新穎而不落俗，頗加讚許。然而，他老人家暢遊之餘，不去看別的，卻先去看廁所，看見那裏水管暢通，環境整潔，並不像一般的公廁，到處藏垢淤塞。後來他在革命實踐研究院週會談到維護環境衛生時，便認為事在人為，民營事業如榮星花園的廁所，就是一例。受訓的衮衮諸公，也有好奇之士還特地到榮星花園去實地勘察一番，以求證此言之不虛。偉甫談到此事時，便為之捧腹不已。

民國六十五年，主管公產的政府機構以榮星花園裏面的公產租期已滿，又因積欠租金等問題，續租觸礁，宣佈收回所租的公產，因公產適在大門口，花園未免將被宰割得支離破碎。一時社會各界都為之惋惜不已，

衆口一詞，無人表示贊同，各報也爲此事紛紛撰文報導。事實上，偉甫興建榮星花園，是很崇高的社會奉獻，卻未被有關方面所重視。此事如出市儈之手，大可憑其所擁有的土地，另作牟利之圖。所以，當榮星花園遭此厄運時，偉甫不禁感從中來地說：「二十多年的經營心血毀於一旦，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後來台北市雖將公產部分另闢門戶，改爲「民權公園」，可惜原有的景觀盡失，景物全非。幸而林洋港先生不久接任台北市市長，重視輿情，毅然改由市政府以委託的方式將公地交偉甫負責經營，並撤銷「民權公園」之名。於是，這段時間籠罩花園一層陰霾，始告撥雲見日。偉甫雖遭此干擾，他對榮星花園所持的情感，所付的心血，仍然未改初衷。今日台北市雖人口日多，汽車日多，財富日增，但民營事業像榮星花園這樣的規模，卻未多見。有些公園，格局甚小，而且破爛髒亂，到處丟滿著廢物紙屑。偉甫去世後，因債務之累，榮星花園轉手抵押於他人，人事變遷，一切陷於癱瘓的狀態，轉眼只剩下一個蔓草叢生，景物全非的廢園。回首昔日，何異人亡政息！

偉甫所創的事業，其實榮星保齡球館尙先榮星花園而設立，因爲民國四十五年，保齡球館便已隸屬於榮星企業公司。其地在今台北市南京西路十四號今日百貨公司的舊址。當時偉甫認爲保齡球是一項很理想的超齡室內運動，台灣尙屬罕見，需要有人來提倡，開風氣之先，他的熱忱，很可佩，也是很可愛的。於是將南京西路那塊黃金地段的私產，改建爲榮星保齡球館，以供大眾同樂。體育事業，就是需要有人肯花錢率先提倡，這些人物多數出於工商界，昔日如上海地皮大王之孫程貽澤、香港富商胡文虎之子胡好，都是爲體育界揮金如土的著名人物，獨惜台灣少見。偉甫志在同樂而不在獨樂，大概就是很少見中的一人。榮星保齡球

館創設後，不少黨政碩宿，都是常客。在那裏閃爍著的燈影球聲中的確留下了令人懷念的佳話，也為台灣推展保齡球運動，起了很大的帶頭作用。當時的高爾夫尚非熱門，絕不如後來的炫耀於朝野之間，而保齡球蔚然一枝獨秀。後來偉甫因財務關係，館址轉讓於人。今日重過此地，往事如煙，歲月催人，真令人無限黃墟白髮之痛。

偉甫手創的事業，尚有榮星合唱團、榮星幼稚園、榮星醫院、鹿港民俗文物館等多項，都是服務於人，綽有績效。這些也是憑他的理想為社會文化工作所作的實踐。他的理想，認為社會的進步，單恃工商業的發達，還是不夠的，工商業絕不能虛浮的建立於一個缺乏文化建設的社會中。他雖出身於企業界，而他的理念，卻以文化建設為重點，落實於文化事業，超越了現實的企業界，取向於企業界更崇高、更深遠的領域。

偉甫這種施比受更有福的風格，我們這個社會並不多見。塑造這種風格，與他具有中國文人的本質，及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都是有關的。他在日據時代的台灣，由台中第一中學畢業（前副總統謝東閔先生亦畢業於此），進而考入台灣大學，以農科畢業。但他不像是學農的，反而有幾分像研究文史的，平時親炙於中國的線裝書，書法極見娟秀之致，對於中國傳統的文化，始終持有一份執著不移的嚮往之心；尤其儒家的仁學，他的一生立身處世，無不以此為心。所以，他所憧憬的社會充滿著傳統之美，人文之美，超於現實、異於現世。基於這種觀念，他雖有抱負，有潛力，但是一生拙於經營，勝算持盈，非其所長，因而他所領導的糖廠、麵粉廠以及初期中國合成橡膠公司等很多的機構，都未獲得如期的發展，先後變賣償債。其中尤以聘故立委邵華為董事長、新

聞界老兵馮志翔為總經理的聯合贈獎公司，開業不久，計畫落空，所有債務都由他個人以常董身分受之，那種捨己為人的精神，至今猶令人感念。

所以，偉甫的性格，仍然具有農業社會的特徵，他的缺乏時間觀念，便為親友們傳為美談。每次約會，他幾乎從無準時光臨的紀錄，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從東京回台，錶上的時差，忘掉撥準，所以，那次約會，他比別人早到了一小時。其率真不精於計算，類多如此。

偉甫最為人稱頌的，還是莫過於為善不欲人知，從不自炫，從不自尚。有兩件事，我是親見。一件是三十多年前，新聞界有位老友，死後喪費無著，景況極堪同情。當時尚無市立殯儀館，祭奠都是在極樂殯儀館（今已改建為林森公園），我與偉甫無意之間談到此事，不料他只憑我一句話，既未告知我，也不告知死者家屬他是什麼人，竟直赴極樂殯儀館，將全部的喪葬費付清。事後查究才發現是他的捐助。另一件事，就是中央社故秘書曹蔭樨先生，藏書頗豐，且由大陸攜運來台，後來逼於生計，都由偉甫以善價購得，收藏於鹿港文物館。文物館未設時，他曾以為數不少的錢為鹿港子弟設置清寒獎學金，受惠者甚眾，後來鹿港居民生活改善，都能自力升學，他便將此款移用於設館。館內所辦活動，亦頗見大手筆，如明清書畫展，意在使中南部民衆都可就近欣賞國粹，無需奔波台北之勞。這些書畫，都是價值連城，如稍有差錯，動輒須以數百萬元來賠償的，他卻毫不介意。

偉甫一生的行誼，幾乎無不是出於對文化事業所擁有的強烈的愛。愛的最高點，雖說就是美，但是這種美卻是充滿著寂寞感的。清人王漁洋有

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獨釣一江秋」，偉甫就是詩中這個充滿寂寞感的人，對著一江無限的秋色，獨釣獨賞，彷彿展現著寂寞的愛。如今斯人已遠，念天地之悠悠，能不愴然倍切懷人之思！

(原載七十八年九月六日中國時報)

陳錫恩與東海大學

我在大學時代的老師陳錫恩博士，從越洋電話中獲知他已於本年五月七日因腸癌而至心臟衰竭，病逝在洛杉磯的凱薩醫院，享年九十歲。

錫恩先生，福建福州人，早年與曾在美講學而已作古多年的經濟學教授陳興樂博士，以及現尚滯留北平年老多病的生物學家鄭作新博士，同為北伐以前頭角崢嶸畢業於私立福建協和大學的傑出人才。後來三人在美學成，先後都回到母校任教。當年他們在福建都是望重一時，踔厲風發，為人所矚目的教壇人物。莘莘學子也都以受教於他們的門下引為自慰。

我在協大外文系就讀時，錫恩先生是教務長兼教育學系主任。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碩士學位，回國不久便擔任這個職位。當時他尚未到三十歲，但是因他的名望和學養與眾不同，在學校中的形象頗為凸顯。同學之間，很多都以他的軼事作為談資，譬如他在協大畢業的那年，尚未到二十歲，中英文造詣都已不錯，學校未經立案，校長是美國人，沒有什麼制度可以遵循。所以，憑他的多才多藝，便以一首由他譜曲的歌，代替了畢業論文而畢業了。這首歌，因為音調高亢，意境雄邁，後來校方便取為校歌，用了幾十年。大陸淪陷後，學校停辦，但這首歌始終留在人們的記憶裏。凡是在協大耽留過的人，無論教職員或學生，從起句「協和大學閩江東」開始，無不能朗朗上口，歌聲起處，氣勢響遏行雲，令人立時彷彿回到昔日弦歌不輟的金色年代。

錫恩先生在任八年以後，又赴美入南加州大學繼續精研，得哲學博士。當時對日抗戰已經開始，漫天烽火，使他無法回國，於是便受聘任教於他的母校南加州大學。兩年後，復出任該校東方文化學系主任，平時孜孜不倦，樂育為懷，以迄退休，盡瘁於此，先後達三十多年之久。不但桃李滿天下，而且因著作宏豐，富於辯才，他的學術演講，尤廣受各界的歡迎和重視。加以他交遊至廣，於是他在美國便逐漸建立起了崇高的社會地位。但是，他身在異邦，卻心懸故國，始終愛他遠在萬里之外的故國，及留在多難故園中的親友和門生。已故名記者馮志翔兄三十多年前訪美，回國便曾感慨的說，現在很多人口中嚷著國家，真不知對國家有多少貢獻，在美國像陳錫恩先生為國家宣揚國策，為國家發揚固有文化，卻從不向人提起，不為國內所知，真令人敬佩（原文刊於「文星雜誌」）。錫恩先生就是這樣「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的人。

錫恩先生在協大為教務長任內，我們的情誼超越師生，平時任何問題或疑難，都可以坦然直陳，無所忌諱。他很能接受別人的意見，但絕不縱容。所以，他有平易近人的一面，也有嚴肅不苟的一面。前者對學生如自己的子女，休戚攸關，平時在那股和諧融洽的氣氛中，高談闊論，極富有幽默感，或豪放，或輕鬆，無異在家庭中聽長輩們縱情的談話，歷久而不能忘其音貌，令人如坐春風。而後者則每於大原則前提下見之，他堅守原則，絕不屈服，絕不畏縮，絕不妥協，絕不委蛇，所表現的光明磊落，理直氣壯，使人真正的感到面對著凜然大節而為之折服。這種情形，如對國家忠邪之分，正義是非之辨，無不其言鏗鏘，擲地有聲，大概就是曾國藩所崇尚的「明而能斷」的典範。

錫恩先生赴美後，直到抗戰勝利後一年（民國三十五年），利用學校休假機會，始回到福州，出任協大母校校長一年，只可惜時間太短，他欲為母校發展的理想，未及實現。我因當時已奉調台北中央社，主持中央社台北分社直到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始在台北重逢，中間相隔十五年之久，國家雖已淪於浩劫，整個世界都在變亂中，而他的精神如昔，健談如昔，除略見消瘦之外，看不出有什麼改變。此時我是在台北主持中華日報，他則是接受了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的禮聘，來台籌設東海大學。這個董事會，過去在大陸各省都設有教會大學，如北平的燕京、濟南的齊魯、南京的金陵（男女兩校）、蘇州的東吳、上海的聖約翰、杭州的之江、福州的協和與華南、廣州的嶺南、武昌的華中、成都的華西等大學，都因辦學認真，享有大名，人才輩出，對中國的教育，不曾因是教會大學而抹煞了貢獻。台灣光復後他們即擬在台創辦一所新的大學。當初曾派一位久居印尼的美國人，來台進行籌備工作，並設董事會，董事計有杭立武、曾寶蓀、蔡培火、蔡一諤、高天成、董大成、林宗義、陳啓清、黃彰輝等，及三位在台的美籍教會人士。但是，那位印尼通的美國人，不諳中國國情，場面怎樣也打不開。於是，董事會執行秘書范威廉博士（William Fenn）（曾任金陵大學外文系主任，與中國政府政要多有來往），特商請錫恩先生來台，主持其事。錫恩先生適逢南加州大學休假，深感去國多年，也很想回到台灣來看看實際的情形，遂應邀偕夫人鍾文惠博士（南加州大學教授）同行，返抵國門。

抵台之後，他積極展開籌備工作，我介紹蔡培火先生與他相識，培火先生關切桑梓教育，力主校址以台中最為適宜，後來雖曾到南部各縣市實地去勘察，幾經研商，終於決定台中為東海大學的校址。那裏當時雖是

童山濯濯，草木不長，但以一百四十六甲之廣的土地，極具發展的潛力，足以傲視全台，非其他縣市所能覓得。錫恩先生此時精心策劃，傾其全力為台灣創設一所前所未有的教會大學。一時萬方矚目，緊鑼密鼓，成為自由中國教育界最熱門的新聞。

他的設計，以大陸時代的教會大學規模為其理想藍圖，決定先設文、理兩學院，然後徐圖發展。東海董事會方面，深慶籌備得人，由蔡培火先生為主，都贊成推選錫恩先生為首任校長，於是他在董事會議的決議案中便以十三票（全數十五票）當選為校長。不料這個校長之職，有人躍躍欲試，一時計無所出，便指錫恩先生在美研究大陸中共的發展，把中共看作土地改革者，如此議論，反共立場不夠堅定，不可為校長。當時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不暇細查，乃否決錫恩先生校長之職。錫恩先生為之感慨無窮，他認為去國多年，如以休假機會能為國家做點有意義的事，自所甘願，但如為此捲入無謂的人事糾葛，實在有失本意。此事不久為故副總統陳辭修先生所知，極為不滿，曾致函錫恩先生，表達關切之意。錫恩先生無意於校長之爭，深感如繼續主持下去，勢必為人事糾葛所困擾。於是來台不及半年，便於四十三年九月偕夫人搭郵船返美，一則可充分的利用假期休閒，一則亦可藉此重溫昔日橫渡重洋赴美的舊夢。如今這些當事人都已先後作古，熱中權位，就是被視為清高的教育界碩望之士都在所不免，能不令人遺憾。

當時錫恩先生雖已返美，但是他已為東海大學開拓了一條任重而道遠的路，以後歷任校長都是循此指引繼續的走下去，可惜知道飲水思源，有感甘棠遺愛的人，能有幾人。

錫恩先生後來仍經常的回國，主要的任務，約略言之：（一）應邀參加國是會議性質的政府所召開的會議，如陽明山會談之類。（二）應邀參加研究大陸問題的會議，如由執政黨，或由過去的國際關係研究所所召開的會議。此因錫恩先生為美國政府所重視的反共學人，對於中共發展及其奪取政權後的各項作為，其如何實行暴政，如何漠視人權，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剖析，他曾出版英文專書多種，學術聲望為中外所共悉。

（三）率領美國教育界人士來台作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其中如民國五十一年曾率領美國大學教授三十餘人集會於台中，舉行學術研討會，五十七年曾率領美國中學教師五十餘人，集會於士林，介紹中國文化。他最後一次來台是民國六十九年，其後雖曾多次欲返國參加各項盛會與親友們敘舊，終以健康關係，未能成行。當老總統 蔣公尚健在時，錫恩先生每次返國，幾乎都曾召見，談話都是在一小時以上。從美國華僑社會談到中共暴政與它的本質，範圍極廣。但是，他虛懷若谷，從未以此傲人。

錫恩先生雖是受的美國教育，而且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然而本質上，仍然是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份子，就是我們常稱的中國的典型讀書人。譬如他的生活簡樸，律己以嚴，待人以寬，這是儒家一脈相承所崇尚的精神和修養，在錫恩先生平時的言行中，隨時可見。最為人所敬佩的，就是他為愛護青年、提攜青年，傾其所有為國內前往南加州大學求學的青年設置獎學金。在美國大學教授的待遇，是不算優厚的，但是，他具有以儉為豐，捨己為人的美德，將數十年辛辛苦苦銖積寸累的積蓄，作此義舉，完全是教育家風範。他在台設置此項獎學金，承其厚愛，由我代為主持，經邀學術界人士，組成一個委員會，從民國五十八

年到六十三年，每年都是由委員會甄選一位品學兼優的大學畢業生爲得獎人，前往南加州大學後，錫恩先生不但在金錢上予以支援，而且還照顧他們的生活，視如子弟。去年錫恩先生復與夫人鍾文惠博士聯名設置獎學金，金額提高至每年美金一萬五千元，且以協大校友子女列爲優先考慮的對象。可惜舉辦僅一年，錫恩先生未及目睹受獎青年的成就，便離開我們遙遙而去了。回想自美國與中共建交以後，很多在美的學人，都紛紛的回到大陸去看看，而錫恩先生則始終持松柏不凋於歲寒的風骨，沒有回去。如今斯人不可見，鄉關遠隔，遺櫬也不知何日得以歸葬於故土。

(原載八十年傳記文學月刊第五十八卷第六期)

嚴靜波先生以誠待人

國之大老黃少谷先生，數年前與已故資政袁企公（守謙），在我生日時，曾共同戲贈一聯，文曰：

和名女作家舉案齊眉，得意得意。

與嚴前總統懸弧同日，沾光沾光。

嚴前總統靜波先生，如今已歸道山，自愧老健，追懷往事，不禁感慨萬千。靜波先生雖與我生日同月同日，而他長我九歲，我們遠在民國二十九年便已相識。當時他是福建省政府財政廳廳長，而我自福建協和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被校方留任為校長室秘書。校長林景潤博士為福建省議會議員，文學院院長林希謙先生則為省議會副議長。靜波先生在協大除了與林校長林院長二人有交往外，與先岳父嚴叔夏教授以同宗關係亦有往還。

抗戰時，福州淪於日軍所佔，福建省政府遷至永安。我代表林校長由邵武協大出發，首次訪靜波先生即於此時的臨時省會。靜波先生給我的印象是，謙沖和穆，雍容豁達，講話條理分明，語音雖略帶江南的圓潤風味，但聽得十分清楚，而且很有禮貌，使人想起古人所謂禮賢下士，彷彿從他的言行中隱約地找到了影子。

第二次我與靜波先生晤面，則在相隔五年抗戰勝利之後，這是民國三十

四年十月五日，有五架由陪都重慶直飛台北的專機，載有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首批來台的官員及有關人士，靜波先生與我都在內。他是交通部台灣特派員，而我是中央社台灣特派員，相見之餘，倍增感奮。此後我們在台灣將近半世紀的歲月中，或公或私，他雖貴為至尊，亦多不遺在遠。

靜波先生對國家、對台灣財經的貢獻，這是已為人所共知。這裏，特就他如何為人所欽佩與從小處看他的修養，略加記敘，藉申追慕賢者之至意。

其一，靜波先生初受知於福建省主席陳公洽（儀），由福建省建設廳主任秘書擢為廳長，一年後，知其有財政長才，轉任為財政廳廳長。台灣光復，靜波先生原為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處長，既發表，南洋僑領陳嘉庚與陳公洽有隙，以台灣遴任各主管，多為陳公洽主持閩政時的江浙班底，無閩台人士，有違閩台一家之旨意，大施抨擊。一面特電重慶蔣委員長，表示關切。政府為安撫僑領，乃羅致閩南籍當時為重慶特別市財政局局長的張延哲，出任台灣財政處處長。調靜波先生為交通處處長，以接替徐學禹，然台灣銀行董事長一職，仍由靜波先生兼任。迨任顯群出任交通處處長，靜波先生重長財政處，原任張延哲則調為秘書處處長。二二八事件後——民國三十六年夏，陳公洽於離台前夕，曾邀我去長談，他對主政閩台兩省，前後十年的幹部，始終認為靜波先生為最理想的幕僚長。證之後來魏伯聰（道明）主席移交於陳辭公（誠）時，曾言省府主管別人皆可換，惟嚴靜波不能換。知人之明，為國舉賢，可知各人所見都有相同之處。

其二，靜波先生重視人際關係，尤重地方具有德望人士。二二八事件時，靜波先生適在台中，因平時禮遇林獻堂，尊為社會賢達，故能藉其庇護，未遭池魚之殃。國策顧問楊肇嘉去世時，靜波先生已任總統，曾邀我去面談，他認為政府為求政通人和，勵精圖治，必須重視民意，尊重地方德高望重的人士。並告知已與經國先生及少老商議，擬聘吳三老（三連）為國策顧問。接替楊之遺缺，囑我代為轉達。當時三老旅美未歸，我當即以長途電話將靜波先生禮賢之厚意轉達。三老以他不是執政黨的黨員謙辭，後來經我說明政府延攬國之賢良，從不問是不是黨員，三老終於點了頭。中華開發信託公司成立時，角逐董事長者，不乏一時名流。靜波先生時任財政部部長，盱衡當時情勢，以林四爺（柏壽）最為適宜。四爺無意於此，靜波先生乃屈駕親往台灣水泥公司（時林為台泥董事長），申述殷殷求賢之意，始獲同意。都顯示其為政以公，待人以誠的胸襟。

其三，靜波先生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並未出國留學，但他平時最愛讀英文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每期必讀，很少中輟，而且閱讀書籍範圍極廣，所以常識亦極豐富。某次，有某股商為貸款事，欲面陳靜波先生，經公署財政處主秘陳運生為之引見。不料此君一見靜波先生，靜波先生從中外花道、世界車種，談到人情風物，海濶天空，滔滔不絕。辭別後，陳主秘詢以貸款事結果如何？此君瞠目以對，口吃地說：「我只聽他在講話，忘掉提出貸款。」靜波先生應對運用之妙，殆已無人能及。

此外，以外國使節及外商為成員揚名國際的國際扶輪社，台北分社成立

於民國三十六年，靜波先生以負衆望當選爲首任社長，與會所操英語，暢達無遺，尤爲人折服。

其四，靜波先生能忍，忍不僅見其風趣，亦能以忍化解僵局，以忍服人懾人。若干年前，大陸救災總會爲經費難籌，在電影門票上附加捐稅一項，後來財政部有取消之議。事聞於谷叔常（正綱）理事長，其時谷氏正在東京開會，爲亞洲反共大聲疾呼。聞訊後，急忙趕回，未入家門，先至樟腦局舊址爲財政部所借用的大樓，見樓下無人辦公，便大聲叱責，靜波先生正在樓上處理公務，聞聲忽忽下樓，見谷氏作禮，徐徐告曰，此爲中午下班時間，遲一小時，乃東京台北之時差也。又聞，某次靜波先生在部長辦公室門外等候十餘分鐘，工友未至，沒有鎖匙開門，既至，靜波先生默然不語，悄然而入。這個工友，後來告人，部長不罵我，比罵我更難受。其待人處事往往如此，殆所謂以德服人歟？

其五，靜波先生能飲，但很少見其醉，有之，好像曾見於民國三十五年的春節餐會，地址是凱歌歸餐廳（國民黨中央黨部現址），此爲台灣光復後第二年的年夜飯，自然群賢畢至，濟濟一堂，熱鬧非凡。我們喝的是福州四半酒——當時台灣尙無紹興酒，以此最爲名貴。我們不知靜波先生喝了多少，只見他坐在那裏笑，不斷地笑，有異常態，必然是喝醉了。當時喝醉的人，不止他一人，國民黨省黨部宣傳處處長林紫貴也喝醉，但他一點笑容都沒有，只有哭，只有怒，滿口的牢騷。一笑一哭，欲知一個人的修養，大抵亦可思過半矣。

以上拉雜所記，雖爲小事，但亦可見靜波先生平時在平易近人中，具有恢宏的器度，謙和的胸襟，沉潛的思考，堅忍的定力，非大仁大智者，

殆無以見之。

(原載八十三年元月八日中國時報)

嚴靜波先生的另一貢獻

——從扶輪社首次在台舉行巨型年會談起

扶輪社（Rotary Club）第八十五屆年會將於本（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台北市舉行，來自世界各國的社員，預料將達三萬人。其中不少是重量級人物，群賢畢至，猗歟盛哉。像這樣洋洋大觀巨型的會議，台灣尙屬罕見。

扶輪社，亦稱國際扶輪社，爲一服務社會所組織的公益性國際團體，一九〇五年創立於美國芝加哥，發起人爲美國律師哈里斯（Paul P. Harris 1868～1947）及其友人三人，初時由各行業中吸收一人爲社員，後來逐漸擴充，由各社員所屬地點輪流集會，故名。一九一〇年成立扶輪社全國協會，又二年，擴展爲扶輪社國際聯合會，一九二二年改稱國際扶輪社。其宗旨以提倡高尚職業倫理，並促進國際合作與相互瞭解，以達到世界和平爲目的。現在世界各地有一百五十個國家有此組織，社員逾五十萬人。總部設於美國伊利諾州艾凡斯頓（Evanston），聲名遠播，爲國際合作樹立良好的典範。

我國之設有扶輪社，係一九一九年創於上海，因上海爲我國具有國際性的最大商埠，各國人士往來頻繁，人文薈萃，無論文化性的、商業性的大型活動，都集中於此。一九二六年，復設北平扶輪社，以迄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前夕，當時如南京、漢口、重慶、昆明、青島等城市，先後

共設二十個扶輪社，社員約有九百名，後來為扶輪社出力最甚而名聞中外的人物，莫若前外交部長王正廷博士，他在一九四四年至四六年間，曾被選為國際扶輪社理事及第二副社長。另有南京的顏德慶、上海的鄺富灼二氏亦被選為理事。抗戰期間，扶輪社在戰區仍能貫徹其服務精神，救災救難工作，不遺餘力。

大陸變色後，扶輪社分散在大陸各地原有的各項活動，銷聲匿跡，全部被迫陷於停頓。昔日充滿人性光輝的一面，已成為歷史陳跡。

台灣在日據時代，台北、基隆、高雄三個地區，亦設有扶輪社，社員幾盡屬日人，談不上對社會有什麼貢獻。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日本軍民全部撤退，這些機構，自然隨著解體。

台灣光復後，扶輪社過去在大陸的社員，幾經奔走努力，至一九四八年十月九日在台北市圓山中國旅行社（前美軍協防司令部舊址）正式成立台北扶輪社，並獲得美國總部授證，扶輪社的活動，始重見於台灣的自由社會。當時幾乎集上流社會的精英於一堂，每週四中午在中國之友社（F.O.C.C.）（現新公園人事行政局辦公處）集會一次，會議採用英語。創始社員二十七名，包括政府首長、各國使節、金融界、文化界、宗教界、企業界等多方面人士。名單如次：

嚴家淦、鮑魯敦、陳清文、陳德坤、陳樹人、周紹曾、瞿荊洲、孫雅各、艾克福、霍思華、謝惠、徐人壽、華壽嵩、經利彬、克蘭史、李申穰、林挺生、劉青黎、劉晉鈺、牛天文、沈鎮南、玉求定、汪心汾、王則甫、顏春安、Paul, Jom Harland、葉明勳。

以上名單中，最有貢獻，最孚人望的人，就是首任社長嚴前總統靜波先

生，各項籌備工作，即憑他的大力支援，乃告就緒。當時他的職務雖為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但為社會而奉獻，重視大眾公益的熱忱，超越群倫，而且交遊面極廣，熟識國際事務，能操流暢圓渾的英語，富有親和力與說服力。如論當選為首任社長，實不作第二人想。今日重檢這份名單，人事滄桑，不少人都已早登鬼錄，未免令人有隔世之感。扶輪社後來在台的發展，蔚為盛況，我們溯本追源，不能不歸功當年靜波先生邁著大步的領導。他的作風開明，胸懷坦蕩，從善如流，具有前瞻性的眼光，這是為社員們一致所肯定。靜波先生作古，已近半載，我們對他的風範，實有無限的懷念。

台北扶輪社成立後，積極的推展各項服務工作，對外活動，如一九五三年，當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尼克森夫婦訪台，即由扶輪社主持設宴歡迎，後來尼克森曾稱這是亞洲之行最難忘的宴會。一九五四年，支持「自由中國」號橫渡太平洋，由扶輪社提供全部費用。一九五五年，對內舉辦不二價運動，大規模資助留美學生，及全國大專英語比賽。其後繼以攝製「介紹台灣」幻燈片，發起捐血運動等，服務大眾，不及細述。目前台灣地區，先後在各縣市分成四個地區，成立二百六十八個扶輪社，都經美國總會核准在案，社員共達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二人。其中多屬社會精英份子，潛在著無限力量，將來為社會謀福利，致合作、促進和平的貢獻，當可拭目以待之。

我們於此，除紀念靜波先生當年領導台北設社的貢獻外，願以至誠預祝第八十五屆年會的成功，為扶輪社增光彩。

(原載八十三年六月九日中國時報)

天地能知許國心

——紀念陳炘先生百齡冥誕

光復後我在台北已住了四十八年，也搬了三次家，至今保存著除富有紀念性的書籍圖片外，還有一件也是富有紀念性而且十分珍貴的物品，就是陳炘先生當年贈送給我的大甲台灣蓆。每次看到這條蓆子時，睹物思人，心裏便有無限蒼茫悵惘的懷念。

我第一次與陳先生見面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抵達台北後數日，一週後，他又招待我們記者團遊覽日月潭。當時因政府尚未正式接管，隨前進指揮所來台的黃朝琴、王民寧先生建議，由民間團體負責，促成此行，所有費用，都由陳先生所主持的公司負擔。記者團包括重慶中央日報楊政和、上海大公報費彝民、重慶大公報李純青、掃蕩報謝爽秋，我則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分被邀。如今這四個人都已先後作古，而我也已年屆八秩，往事如煙，撫今追昔，倍增無窮的感慨。當時陳先生是請台灣信託公司信託部的經理謝國城先生一路陪同前往日月潭，飽覽台灣的風光。

我所接觸到的台灣高階層人物，後來還有林獻堂、林茂生、羅萬俔等先生，他們都是深受中西文化薰陶，風骨嶙峋的知識份子，而陳先生並不像林茂生先生這樣意氣風發，豪情萬丈，古文觀止可以口若懸河的背出，純然具有名士派的典型，陳先生却是比較內斂，有涵養，有深度，

也有強烈的正義感，一個剛毅不阿的人。他們相同之處，則在每人內心都洋溢著愛國家、愛民族的熱情，對台灣光復，對歡迎祖國來台的政府人員，與很多台灣同胞一樣的都掀起了忠愛擁戴的高潮。後來我與陳先生及林茂生先生，也常有聚會，他雖不如林茂生先生的善飲，但他的正直持重的器度，沉默而饒有西洋學者的風味，使我留下了很清晰的可敬印象。

陳先生畢業於日本東京慶應義塾大學理財科後，曾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深造，當時他是在美罕見的台灣留學生之一，回台後便成為金融界首屈一指的領袖人物。台灣光復前一年，他與林獻堂先生等友好合資設立的大東信託公司，及其他兩家信託公司，與台灣銀行合併成為台灣信託公司。光復後，被派為台灣信託公司籌備處主任委員，公司正式成立後，陳先生接任董事長。三十五年六月參加台灣致敬團到南京，回台後又集民資五千萬元籌設大公企業公司，被推為董事長。但政府方面卻認為他所領導的信託公司應屬日產，與其他機構同列為接管的對象。當時主管機關是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處長是嚴家淦先生。三十五年八月，陳先生以我常接觸政府領導階層，又與陳儀長官嚴處長相識，認為政府與民間的溝通，可以由此管道獲得下情上達。於是，便偕長官公署顧問李擇一先生前來看我，說明他所主持的公司，純屬民營機構，不應與其他日產同樣的列為接管對象。我認為政府重視民意，迭有昭示，義不容辭的便陪他們去拜望嚴處長，未獲許可。告以該處無裁決的權力，要我們去請示葛秘書長敬恩，我們只得進謁葛秘書長，誰知葛秘書長如出一轍的說必須請示陳長官。我們便「等因奉此」的去請示陳長官，陳長官毫不疑慮的說，此事須由主管機關依法查明處理。我們便像一個皮

球似的整個上午在長官公署的樓梯上被踢來踢去，踢不出一個結果，我們只得敗興而歸，此事政府對滿腔愛國熱忱的陳先生，自然感到大為失望。從此陳先生對政府的言論，由心灰意冷而逐漸趨於不滿，這是人情之常的反應，我們能寄以苛責嗎？

我們翻閱古今中外歷史，凡是一個有為的政府，或政績輝煌的時代，當局必能察納獻言，俯順民情。漢代之有文景之治、唐代之有貞觀之治，如無此何足以推崇於後代。台灣光復後，台灣同胞對政府，都擁有一顆強烈的嚮往之心，但後來未及二年，何以一變而為民怨沸騰，終於釀成了「二二八」事件。我們如檢討當時的情形，當局雖求治心切，但未能察納獻言，俯順民情，以致構成了無可彌補的隔閡鴻溝，這是事實，也是當局難辭其咎之處。我們讀到愛國詩人陸放翁「風雲未展康時略，天地能知許國心」的詩句，實為台灣光復後，若干未能酬其夙願的碩宿，對政府所持失望心情的寫照。

陳斡先生空有許國之心，當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後，三月十一日即失蹤，四十多年來不見下落，對台灣金融界而言，實為百身莫贖，難以補償的損失。歷史成敗，往往取決於片言一念之間，天地悠悠，悔將何及，徒留後代讀史者無窮的感嘆。今年適值陳先生百齡冥誕，哲嗣盤谷、盤東兩兄定於今日（十二）舉行追思禮拜，我在奉柬之餘，內心實為百感交集，追懷昔賢，已渺不可及，只望歷史能成為後事之師，能成為後代之鑒。

（原載八十二年一月十二日自立晚報）

感懷集 雜感篇

驚濤歷盡看台灣

——光復後來台四十七周年述感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舉國正在為抗戰勝利而歡騰的時候，我以中央社台灣特派員身分，從陪都重慶偕政府首批來台接收的前進指揮所人員，搭乘專機橫空飛越半個中國，經上海而抵台，採訪台灣光復的新聞，屈指至今忽忽已經四十七周年了。

十月五日，應為台灣光復的實際時間，因為五日已有政府人員抵台，次日復在前總督官邸（即台北賓館）舉行升旗典禮，中國國旗從此飄揚在台灣的天空，十日的國慶紀念大會在公會堂（即中山堂）舉行，而將光復節訂於十月二十五日，實因台灣地區受降典禮是在二十五日舉行。

十月五日與我同機同時抵台者，政府方面主要有葛敬恩、黃朝琴、李萬居、王民寧等人，新聞界有楊政和（中央日報）、謝爽秋（掃蕩報）、李純青、費彝民（大公報）四人，如今他們都已先後作古。

四十七年不算是很短，在這將近半世紀的歲月，充滿著動亂與變遷，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無論對國家或對個人，都是經歷很沈痛、很辛酸的歷程。現在一切雖已遙遙而去，但那些留在記憶中的情景，如一部波濤起伏無常的歷史電影，無不歷歷在目。四十七年來，世局的變化太多，台灣的變化也太多。以台北市來說，當時人口還不到三十萬，而

今卻已超過二百八十萬；當時全市小汽車還不到三十輛，而今卻已超過五十七萬輛。那個充滿日本情調，樹影婆娑的海島幽靜都市，而今風貌大異昔日，滿耳的煩囂，滿目的塵埃，滿街的車輛，行人摩肩接踵，一點也不幽靜。當時那些荒郊田野，如今也都分別的高樓聳立，寸土是金，成為群相角逐的場所。我雖久居台北，但三易其所，從庭院深廣的舊居，到大廈包圍的現址，也是歷經滄桑之變。那些連續不斷的記憶之夢，仍然不時的環繞著我。

回顧四十七年前，我們如走入歷史的隧道，細數當時人物，對台灣最有影響力的首推歷任主持省政的幾人，從行政長官陳儀，歷經省主席魏道明、陳誠、吳國楨、俞鴻鈞、嚴家淦、周至柔、黃杰、陳大慶、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以至現任的連戰，我以側身新聞界的關係，與他們都有交往與認識，建立了或深或淺的情誼。他們各人雖都有不同的風格、作為、與政績，但對建設台灣、愛護台灣的熱忱，並無二致。其中嚴靜波（家淦）、黃達雲（杰）兩位先生，至今因久病仍住院受診，每次我去探望他們時，看到衰老的臉龐，如為歷史留下了見證，想到往昔都曾為建設台灣而盡瘁，心中便有無限歲月催人的悵惘。

回想光復後的台灣，實為時代的寵兒。當時湖北省主席王東原訪台時，曾與我談到省政建設，他說台灣一省的預算，可以抵得大陸五省，單以農林廳一單位的預算，便可抵福建一省的預算，大陸各省戰禍頻仍，居無安日，怎麼與台灣相比，言下不勝感慨。後來大陸變色，台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幸賴政府勵精圖治，積極有為，終於建設這個以社會繁榮、民生樂利，足以傲視西太平洋的復興基地。而且自由民主的訊息，

在亞洲亦如海上的燈塔，大放異彩。

以政治而言，台灣光復之初，台灣同胞都從被迫害的日本統治桎梏之下走出，如撥雲見日，獲得自由。這種自由，自然十分的可貴。政府亦因深知大眾飽嘗亡國之痛，便儘量給予自由的生活。如日據時代被日人所拘的囚犯，不論罪之輕重，一律予以釋放，包括昔稱火燒島，現稱綠島的囚犯亦在其列。於是，政治層面形成了真空而全面解禁的景觀，但欲速則不達，自由畢竟不同於放任，須先以法治的守法觀念爲其必有的基礎，不能有損別人的尊嚴與權益，也不能憑一己所好，發抒不負責的言論。所以，要使台灣同胞都能瞭解自由民主的真諦，便須先經過長期的政治教育的培養與涉練，不是以速食方式便可以消化而得之的。而其負面的影響，光復初期，便因誤解自由民主，爲社會製造了不少治安上的困擾。現在回看四十七年以後我們的社會，從老一代到新生一代，是否都已廣受政治教育的洗禮？對自由民主的真諦，都已徹底瞭解？瞭解精神在那裏？規範又在那裏？解禁以後，自由民主的迴旋，給予社會各界的印象又是什麼？這是很值得我們檢討的嚴肅問題。譬如民主殿堂的打鬥風光，爲各民主國家所少見，於是被人嘲笑列爲世界十大新聞之一。令人不解的是，我們衰衰的民意代表，究竟對民主制度缺乏素養，還是因作秀心態的作祟，蒙蔽了一切。民主政治需要反對黨的制衡，這是絕無疑義的事，現在的反對黨，雖已漸成氣候，但必須保持反對黨應有的風格，爲國爲民而努力，贏得民衆的支持，豈能一味表現爲反對而反對。

談政治的言論自由，我們如追溯四十多年的情形，與今日相較，真是不

成比例。聞名中外的《自由中國》雜誌停刊事件，如取當時的原文再來一讀，不禁撫卷長嘆，今日的言論，如退到四十多年前，又將如何處理？雷震（《自由中國》負責人）如尚健在，必然自嘆落伍。誠然，這是戒嚴與否截然不同的兩個時代，何足訝異。當時各報小心翼翼，如履春冰，如蹈虎尾，不容半點失誤。衆人皆知的以「中央」誤爲「中共」，便如滔天大禍，主管非自請處分不可。民國四十年初，我在主持中華日報時，某次竟將頭條新聞標題的「蔣總統」三字，誤刊爲「蔡總統」，真令人提心吊膽，幸而及早發現，不至釀成大禍。某次又將「大陳義胞抵基隆」的「抵」字，誤爲「押」字，手民惟恐禍將及己。凡此種種，可惜無人選編成書，以傳後代，亦屬新聞史料的缺失。

再說省籍問題，光復之初，台灣同胞視外省人如親人、如嘉賓，相處極爲融洽。二二八事件以後，省籍兩字，始爲人所注視。後來因二二八的史料被塵封，視爲禁忌，於是省籍兩字，人多避談。其實，此為政府與民衆缺乏溝通，處理不當的偶發事件，因被一些失意的政客之流造勢利用，遂有野火燎原之勢，爲歷史留下了難以彌補的傷痕。解嚴以後，有人復以此作爲政治攫取的籌碼，於是提到省籍，便令人十分敏感。蔣經國先生生前常以台灣人自居，就是希望消弭此一不正確、不正常的觀念。所謂省籍，實則只有增加隔閡，只有破壞和諧團結，絕非台灣之福。行政院郝柏村院長最近在立法院，談到省籍問題，也認爲易於啓人以分化滲透的機會，危及群體的安全，沈痛而有見識。

四十七年來，飽覽世局，歷盡滄桑。使我深感政府若干措施的失敗都出於人謀不臧。如能處理得當，歷年來真不知可以減去多少糾紛。二二八

事件，就是明顯一例，如能適當的溝通，疏導、便不至如後來之不可收拾。檢討政府方面當時失察。至少有下列四點可作為前車之鑒：

（一）政府來台接收的人員，很多以接收大員自居，言行中便有令人不屑的優越感，對滿腔熱忱以迎漢官威儀的台灣同胞，自然熱忱大減，轉為失望。

（二）政府高層次人員，無論操守、學養、能力，多數都足以信任。但低層次的基層人員，水準並不一致，表現互見瑕疵。我們如瞭解他們在各機構中所佔人數之多，便知與廣大民衆接觸最多的人，就是他們。許多基層班底，我懷疑他們不知什麼是政府的形象。

（三）政府處事很多缺乏主動性積極的作為，知於未萌，防於未然。一旦問題發生，只有被動的去應付，處理不慎，便會肇事生端。當初難塞民怨悠悠之口，就是缺乏洞燭機先的人士。

（四）政府主管雖不乏明智碩學之士，但處理公務往往考慮太多，躊躇不前，慎謀而不能斷。我們無意責以顛預，或官僚習氣太濃，只是行政效率深受影響，此為一般民衆所不能諒解的。

遙想光復初期，台灣同胞之可愛，一為真誠無偽，一為守法克己。因為真誠，所以歡迎政府來台的接收人員，掀起高潮，表達了愛的最高點。因為無偽，不擅包裝，如對政府不滿，不加細察，也會直覺的聽從別人的話。至於守法克己，克己是我們傳統的美德，守法多少還是受了日人高壓統治的影響，養成不肯多說的習慣，成為沒有聲音的一群。

至於遭人非議的台獨問題，本質上，台灣與大陸是一體的，民族的資源

見於文化，而台灣與大陸的文化也是一脈相承的。台灣的文化不僅導源於大陸，根亦在大陸。大陸已被中共政權所統治，中國未被中共所統治的只有台澎金馬等地區，如果台灣不知自保，不知團結，不知自由民主的可貴，必將禍至無日。今日台灣，熱衷政治者如喻之為舞台，這個舞台，無論誰在演唱，執政黨也好，在野黨也好，都須先保住這個舞台，這幕戲才唱得下去，如果舞台被毀，自然戲班也必然慘遭拆夥了。陳資政立夫先生曾告大陸來訪的記者，他認為中國統一惟有以中國文化的力量，旨哉斯言。我們如翻閱歷史，當知古今中外歷史的教訓，武力不可恃，最後還須仰賴文化的力量。台灣與中國文化既為血脈相連，不可斷，亦不能斷。聖經所謂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我們這個社會已經夠亂，豈容瘋狂之徒的存在，為我們自絕努力的路。

再說引為自豪的經濟，目前台灣外匯存底已達九百多億美金之鉅，為全球之冠。英前首相余契爾夫人月前訪台時，盛讚我們的經濟奇蹟後，認為奇蹟不可能永遠的保存，保持奇蹟，必須繼續不斷的努力擴展，語重心長，發人深省。回想光復之初，政府經濟政策並未成功，因為戰後民生凋敝，物質匱乏，政府未能為民衆有力的解決實際困難。中央政府遷台後，處境岌岌，幸而領導階層深謀遠慮，集中各方的智慧與力量，終於排除萬難，突破逆境，為中國歷史創下了經濟出現奇蹟新的一頁。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聲名，從此遠播海內外。彼岸大陸，望塵莫及，有人便提出「經濟學台灣」的口號。像這樣因經濟起飛的蛻變，國家機運亦為之轉變。然而，我們亦不容否認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人性的弱點，無不由此而暴露無餘，尤令人憂心的是功利主義的乖張與誤導，流弊所至，只知重視現實，只知愛慕虛榮，急功好利，造成社會大眾對價值觀念的

偏差，昔日我們可以傳統的道德規範，作為行為準則，而今則早已失去約束的力量。整個社會如被物質所充斥，導致風氣日趨奢靡，大眾對生活享受的標準與要求，從都市到鄉村，都在不斷的提高，相競成習，成為經濟掛帥下畸形的發展。農業時代，我們習聞飢寒起盜心之語，如今竊盜案無日無之，盜心絕非為飢寒，飢寒也不見於今日台灣社會。他們所追求的無非金錢揮霍，物質享受而已。我們一向崇尚勤儉，奉為傳統美德，如今這種精神，也早已為社會風氣所否定，連同道德觀念成為遠離現實的空谷傳音了。所以，我們雖為經濟繁榮而喜，亦為其負面的影響而憂。

再者，台灣的建設，我們不可抹煞另一種力量的貢獻，就是教育。台灣教育普及，義務教育的就學率，佔百分之九九點六九，這是大陸各省瞠乎其後，難以相提並論。因為教育普及，人人都能說國語，人人都有閱讀能力，國民知識水準，自然隨而提升。政府推行耕者有其田後，農民生活又徹底的改善，農村兒女榮獲碩士、博士等學位，已屬常見。過去大陸時代，如福建省莆田一縣能有幾十名留學士、兩位大學校長（一為上海大夏大學歐元懷、一為福建協和大學林景潤），便認為教育水準為全國各縣之冠、引為自豪。此在台灣，並不稀罕。各縣市每年都有留學士榮歸故里，單是鹿港一個鄉鎮，人口不過數萬人，博士便有數十人之多。台灣如果無此濟濟人才，從十大建設到目前的六年國建，便無法廣攬龐大的學以致用的專才，我們亦難以邁向現代化國家的行列。

但是，也有人稱台灣為貪婪之島，這是病態，其一病在我們的社會大眾太自私、太短見，目光如同麻雀，所見都是汲汲於眼前的利益，很少真

正的具有立足台灣，放眼天下的胸襟。那些實事求是，富有奉獻精神的人，因為他們聲音太小，或沒有聲音，反而未獲得應有的重視。其二病在社會風氣敗壞，前行政院長孫運璿若干年前有鑒於此，便要求我們共同來建設書香的社會，希望大眾除了追求金錢之外，也需要追求文化。談書香，我們自愧不如日本，日人很愛讀書，到處都可看到他們默默的捧著書。而我們則對聲色之娛，一揮千金，毫無吝色，卻不願意去買書，平時也不注意進修，很多人離開學校後，便不去接觸書本。改進這種現象，如化濁流為清流，清理源頭，絕非一朝一夕之力，便能奏功。

綜觀全局，四十七年來，台灣雖在國際風雲詭譎，驚濤駭浪中得以屹立，政治民主，經濟繁榮，都在開創未有之局，誠屬非易。目前政府復在中共對我外交施以孤立的壓力時，推展務實外交，能以實際力量，爭取實際效果，不尚虛言，尤為可貴。然而，當此社會轉型，憂患未已之際，我們努力的途徑，無疑的只有團結，只有摒除歧見，不料從政府到民間，從團體到個人，我們卻不難發現不少與此背道而馳，其中挾以本位主義、派別意見、私人權益、過去恩怨等因素，亦有缺乏倫理觀念，罔顧道義，鉤心鬥角，必以得之而後快，甚至無視國家利益，與民衆福祉，能不令人怒焉憂之。

此外，新聞事業因我忝為老兵，關心尤切。從光復後的獨家新生報，以迄目前的各報爭奇鬥豔，互見千秋，四十七年的歷程，林林總總，心中藏之，無日忘之。今日盛況，個人的感受，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民主社會，新聞自由，終於獲得實現，各報言論報導已廣受重視。憂的則是記者們雖展出渾身解數，但並未如想像中提升報紙的水準與品

質。目前言論有時竭諷刺挑剔之能事，其放任較之當年二二八前部分報紙為尤甚，只以時代開放，允許妄用自由，無人為之約束耳，然亦究非報業發展應有的健康常態。記者面對此一趨勢，如何堅持原則，堅守立場，以公正之筆，為社會存正義，不改其應有的風格，只有等待考驗與檢討。我們認為理想的記者，雖處萬變而不變其風格。

最後談到大陸問題，談統一，我們雖有國統綱領可資遵循，但這條路是極漫長的，極坎坷的，需要有超人的遠見與耐心，具備大智慧、大氣魄、大擔當的政治家，始能負此大任。決非如過去兩年來台灣若干人士，走幾趟北平釣魚台賓館，與中共顯要握握手，或大陸那些貴賓來台北市暢遊龍山寺，彼此談談台灣掌故，便可找到我們所企求的答案。只望有朝一日，負此大任的人物，廓然出現於廟堂之上，掌握新形勢，開拓新境界，能以非常人的才智，完成非常人的事業，為國家，為社會，奠定了民意所歸的千秋大業。但此絕不可設限於小圈子、小角落，自我陶醉於方寸之地，忘其源本。否則，等於慢性自殺。這是生於斯，成於斯的人，都不容昧於當前的情勢。

遙望大陸山河，來台後雖曾數至大江南北，只因隔絕已逾四十年之久。想想大陸的風光、民情、鄉土，只有增人無限的懷念。如再回去看看，或可領略中共統治下，那塊古老的土地，究竟改變到怎樣，留下了什麼。當年作家郁達夫在《感傷的行旅》一文中曾感嘆說：「江南的景色處處可愛，江南的人事事事可哀」，只恐屆時也有同樣的感傷。

四十七年的歲月，在我望八之年的生命歷程中，只過一半，另一半卻在那遙遠的大陸，那個金色年代，不少的悲歡哀樂都留在那裏。如今面對

著這個動亂的世界，彷彿永遠難得寧靜，還不如讓我們回到這個驚濤歷盡，情如故土的台灣，與台灣憂樂相共。

(原載八十一年十月五日中國時報)

吾國與吾黨

——寫在十四全大會開幕前夕

李總統登輝先生不久前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以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分詞嚴義正的對黨幹部說，國民黨就是中國國民黨，無所謂台灣國民黨，對於澄清流言，具有啓示與矯正的作用。台灣國民黨這個名詞，對中國國民黨而言，黨的精神，不僅被漠視，也可說是類似中傷之詞。中國國民黨是建黨在海外，國父當初便有「華僑爲革命之母」一語，正說明國民黨成立時，力量是寄託在華僑的身上，激於中華民族正氣，凝聚華僑的力量以革命，而革命的目的則在救中國，推翻帝制。愛國者與有志攬轡澄清之士，乃能八方響應，聞風而起，滙成沛然而莫之能禦的力量，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義無反顧。國民黨的精神，貴乎在此。所以，國民黨黨員，從莽莽神州遍及全球各地，絕不是局限於某一地區。目前國土雖處於分裂狀態，但台灣有黨員，大陸有黨員，海外有黨員，自由地區有黨員，共黨專政地區也有黨員。每一地區都有黨員為黨而奉獻，何來台灣國民黨之稱哉？

台灣光復將近五十年，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政府遷台，大局雖處於逆境，但國民黨基於不能放棄對國家所負的責任，痛定思痛，積極的改造革新，堅此百忍以圖成。今日台灣之有為舉世矚目，經濟繁榮，社會富庶的局面，我們得之不易，不能不歸功於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政府

勵精圖治。將近百年的中國國民黨歷史，在台灣忍辱負重的努力雖佔去了很重要的部分，但國民黨的根，仍在大陸，就像台灣同胞祖先的墳墓都在大陸，他們無論遷來茲土數百年或數十年，身上還是流著中華民族的血，同樣的根仍在大陸。

民國締造，中國國民黨在革命的歷程中，曾有無數黨員參加國民革命軍，為國家而捨身取義，為歷史而留下了光榮不朽的一頁。繼之對日八年抗戰，中國國民黨也有無數黨員投入戰爭的行列，軍民傷亡達數千萬人，奠定勝利基礎，台灣始能回歸祖國的懷抱。歷史雖已渺不可及，我們不能永遠活在歷史的記憶裏，也無需為歷史歌頌、或留戀歷史。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中國國民黨自然也在變。來台將近五十年的動亂歲月，國民黨執政期間，國家經歷數不盡的衝擊與考驗。有些變數，不禁令人感慨係之，譬如說，台灣光復之初，不少台籍人士，原屬日本國籍或用日本姓名，相繼的改為本國化，人們都樂道我是來自福建漳州、泉州，或我是來自廣東梅縣，如今卻變口：「我也是台灣人。」蔣經國總統在世時，也是如此說。當初家家戶戶都爭掛國旗、爭購國旗，視國旗為無上的崇高，如今在公開場合反而遭人焚毀，蹈之視若無睹。當初國語講習班的招牌林立，人人爭習國語。如今雖人人都能講國語，有人卻棄而不用，鼓其如簧之舌，講台語以自耀。當初從知識份子以至市井小民，紛紛申請加入國民黨，以此為榮，如今若干身為國民黨黨員，往往對人支吾其詞，反而不願曝光身分。當年黨國元老，死後相率於墓碑上刻有「中國國民黨黨員某某之墓」字樣，如今台灣雖荒塚壘壘，卻未發現有此字樣。這些演變，都是事實，我們無需為這些演變掩飾。

如果是失敗，我們便須坦誠承認。失敗並不可悲，可悲的是將失敗的事實掩飾，不去追究失敗的根源，自欺欺人。我們認為任何失敗，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這是說失敗須先檢討自己，追究失敗的種子，失敗的因素在那裏。過去大陸像風捲殘雲的失敗，原因雖多，黨的分裂，亦難自辭其咎。當時各據一方，暗中較勁，陷於地區權勢之爭，敵雖未至，而已先揖其門，豈能不敗。今日的情勢，我們自問如何？上次立委選舉受挫，已為國民黨亮出紅燈，如不及早認真的、徹底的檢討，仍然因循固執，粉飾以圖一時之安。只恐另一次失敗，又將重見覆轍。果能自我警惕，自我省悟，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對今年年底縣市長的選舉，或有裨益。我們實不容忽視此中變數。

回憶台灣光復時，日本留在寶島上的軍民共約四十餘萬人。次年（民國三十五年），政府規定分批由基隆高雄兩港搭船予以遣送回日。我在台北目睹日人一批又一批在風雨中整隊搭火車往基隆，無論日僑或日軍，他們如在承受戰敗的命運，嚴守紀律，從不氣餒。當時我便在想，一個戰敗國，有此軍民，顯示他們仍有其不可侮的潛在力，豈能久居人下。果然不出二十年，日本一躍為世界經濟大國，各國皆瞠乎其後。後來每年舉行的世界七大工業國高峰會議，代表亞洲的是日本，而非昔日戰勝國的中華民國，我們能漠視這個事實嗎？無論國家，政黨或個人，敗不足畏，敗便須敗得漂亮，敗得坦然，能有信心，能有毅力，終於挺起胸膛站起來。歷史上既沒有永遠的勝利，也沒有永遠的失敗，這是我們應有此共識的。

中國國民黨忠貞的前輩黨員，他們對國家、對黨所持的一份執著不移的

忠愛，來台後，都有陸放翁「死前恨不見中原」的沈痛心情，有的願埋骨於高山，死後仍盼遙望故國，有人願灑骨灰於大海，死後仍盼魂歸故國，黨有老成，令人無限懷念。後起雖不乏青年才俊，他們的愛國忠黨，絕不後人。但是，黨內卻因突顯著年齡、歷史背景、觀念、認知等不同因素的差距，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構成意見分歧，甚而互堅壁壘，並未像李總統所說的能發揮「生命共同體」的力量。自然，絕非國民黨之福。於是忠黨人士都以極度的關心，殷切的期待黨內都能集中意志，團結一致，能為大局著想，相忍為黨。誠如蘇東坡評論賈誼所說：「非天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今日國民黨何患乎無才，而這些槃槃大才何以發揮其智慧最高點，能為國家、為黨，所取者遠，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必有所忍，集千萬人為一心，取以自用，實為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另一值得重視的問題，就是國民黨所信奉的三民主義很少在黨員心裏生了根。主義的思想精神，並未融入黨員們平時的言行。若干黨員入黨以後，一旦發現與個人權益牴觸，便不惜退黨，見利忘義，這是什麼黨員。如果黨的精神，蕩然無存，我們還憑什麼力量在劇烈的競爭中接受挑戰？

在野黨曾宣稱沒有萬年的執政黨，這是中外皆然的事實。但是，政權捨取操之於民意。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英國的工黨、保守黨，都是以民意依歸而輪流執政。國民黨目前處境，確已面臨險急存亡的保衛戰，如何保持既往的光榮歷史，當有待於能否精誠團結。

鄉先賢幽默大師林語堂生前曾用英文寫成「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的名著，享譽國際，漢譯為「吾國與吾民」，對中國的人民、文化、德行、心靈、社會形態、藝術、文學、人生哲學等，都有詳盡的描述，字裏行間流露不少愛國愛民的情操，而且提到個人主義，缺乏公共精神為國人的通病，至今仍如針對時弊，發人深省。我最欣賞的是他在自序中說：「人類對於真理的領悟，只在稀有的一剎那，這領悟的一剎那，倒是永存的，而不是私見能永存。」

國民黨現在處此險急存亡之際，圖存就是取決於一剎那能否領悟團結的重要，那是真理。我們如不能及時掌握林語堂所說的「一剎那」，黨內仍然分裂，仍讓私見存在，前面將是絕路，黨的前途將斷送於此。千秋功業，亦盡毀於此。

涉筆至此，使我想到先太岳嚴幾道遺囑中有「兩害相權，己輕，群重」之語，語重心長，對國民黨現況來說，無異肺腑之言，但願愛黨人士都能三復其言。

(原載八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中國時報)

老人與寶島

——兼寄參與國民黨十四全會群賢

台灣四面環海，海予人的感覺是，海天一色，一望無際，滄海橫流，流盡人間的千古歲月，也流盡人間的千古人物。

美國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以《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一書，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揚名於世。予人的啓示是，人生除了少數叱咤風雲的時刻之外，大都是一片孤寂，文中的主題是勝者一無所得。如今作者早已憤世遙遙而去，只有海依然一片孤寂。

台灣號稱「寶島」，我們面對著這個海，經歷驚濤駭浪，狂風暴雨的震撼，與生聚教訓之後，終於呈現著海闊天空，豐衣足食昇平的一面。但人們似乎只知道這裏擁有財富，擁有經濟繁榮，早已淡忘當年也有一位「老人」，爲他所關愛的斯民斯土投下了心血。只是他也已遙遙而去，離開我們已經十八年，——我們當年奉之如高山仰止的先總統蔣公。他的一生，爲國家、為民族所建立的豐功偉業，雖然永遠照耀著歷史。但如今對他的推崇，對他的懷念，似乎都如滄海橫流，歸於孤寂。

遠在日本，當年朝野那些白髮蒼蒼的碩宿老人們，他們感懷今昔，便曾慨言日本之獲得復興，能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實拜蔣公在日本戰敗後，爲謀永久和平，「以德報怨」之賜。

追溯寶島，當年光復之初，那些身歷興亡，飽覽滄桑的老人們，也曾感激涕零，認為如果沒有蔣公的領導對日八年浴血抗戰，與開羅會議所持的灼見，台灣將無法回歸祖國的懷抱，台灣同胞也將無法享有自由的生活。

那些滿懷感激的老人們，欣見光復歡騰之後，經歷將近半世紀的無情歲月，都已先後老成凋謝。寶島的海，雖然碧澄不變，海浪在同樣的驚濤拍岸，但是，老人們那些懷德的聲音，卻已遙遙而去。

遙想當年，蔣公首次蒞台是在台灣光復後的次年，——民國三十五年。我們在台北市中山堂萬民歡呼中歡迎他，恭聆他的訓勉。他對台灣重歸祖國，極為興奮，並以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相期許。那種赫赫威儀，恢恢器宇，奕奕神采，殷殷言辭，為台灣同胞留下了仰慕而深刻的印象。

政府遷台後，當時的台灣如在風雨飄搖中，岌岌可危。蔣公雖面對著逆境，但對國家的前途，仍然充滿信心，昭示國人，堅百忍以圖成，希望建設台灣成為復興基地。如今凡是六十歲以上的人，都能記憶當時台灣的情景，人口只有六百多萬人，生產機構仍在停頓狀態，物資匱乏，百廢待舉。市面所見車輛，寥寥可數。有人且稱為文化沙漠，街坊很少看到有什麼新書出版，人們只靠報紙充為精神食糧。大陸撤退後，雖有軍民大量的湧至，一時充滿著戰亂避難的景象，但他們仍忠於國家，以蔣公為精神支柱。

蔣公復行視事後，政府勵精圖治，不遺餘力，廣集眾人的智慧與力量，積極進行土地改革，厲行三七五減租，後來經濟快速的發展，實肇於此。這是出於蔣公的高瞻遠矚，希望從此展開三民主義現代化的建設坦

途。

民國四十八年「八二三」的金門砲戰，憑蔣公的指揮若定，終於確保台海的安全，台灣得以成為亞洲「自由燈塔」。至今人們只知讚賞金門的風光，與憑弔砲戰的遺蹟，當年局勢的艱危，似乎早已被人遺忘，都視為這是渺不可及的歷史故事了。

大陸的失敗，因素雖多，但國民黨內部意見分歧，未能集中力量，團結一致，以致為敵人所分化，乃至整體的崩潰。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此為必然之理。國民黨痛定思痛，前事不忘，實為後事之師。歷史循環，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凡是國民黨黨員，都應知所省惕。所以，蔣公當時認為黨內必須徹底的檢討。民國三十八年，便在陽明山創辦了「革命實踐研究院」，遴選高層次的主管人員，予以儲訓，倡導力行哲學，冀以重振革命精神，為國家負起新的任務。民國三十九年，蔣公復在黨中央特設「改造委員會」，遴派黨內碩望之士十六人為改造委員會。希望藉此改造，國民黨獲致全面革新，呈現新的氣象、新的力量。自然，執政黨能有新的氣象、新的力量，這是國家之福，國家建設也可由此而開拓新的境界。

所以，蔣公一生為國為民，今日台灣的創造經濟奇蹟，究其根源，實由三民主義政策性的自由經濟制度為主導。而政策的形成，則出於蔣公的領導與秉持。台灣同胞「飲水思源」，當知昔日之啃地瓜、穿木屐，走向今日之坐賓士汽車，居大廈，以財富自擁自豪者，豈非盡屬蔣公德澤所賜？

君子務本，古人所重，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但這種美德，已

不再為今日的現實社會所重。環顧廟堂之上，袞袞諸公，很少不是受訓於實踐研究院，很少不是身受蔣公培育之恩，可說盡是吃國民黨的奶水長大的。然而，居高滔滔以言國家政策者，侃侃而談黨務發展者，為之動容，能有幾人仍談蔣公當年如何的為國為民、如何的造福台灣。黨內耆賢碩宿之士，殆多明哲保身，獨善其身，似未聞有此感慨之語。在下何人，豈敢喋喋多言，只以現實如污染空氣環繞著我，激於良知，心之所嚮，不願緘默。如視為頑固、落伍，亦無不可。

今春日本之行，最令人難忘的，就是我在日本民間發現有人懸掛著蔣公遺像，他們都知當年「以德報怨」者為蔣介石先生。誰知光復後將近半世紀的台灣，居然有人誣指蔣公為二二八事件的元凶，有些公共場所所建的紀念銅像也有被人毀壞。試問我們的歷史教育在那裏？我們的國民道德又在那裏？遙望慈湖，只有湖山依舊，默然與蔣公陵寢相對。人們對蔣公的敬仰與懷念，僅見於流於形式的捧著花圈禮拜，為傳播媒體增加一些新聞而已。就是中正紀念堂，巍巍乎只有欣賞戲劇與音樂的熙攘人群，幾忘此為何地。蔣公的遺著遺訓，束之高閣，能有幾人再如當年細心研讀？

這裏，使人想到當時如不是蔣公斷然乘艦從大陸來台，台灣後來的演變，是很難逆料的。在紐約，自由女神像聳立在港口，光芒四射，便可象徵美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在高雄——當時蔣公孤舟抵台即在此，我們如同樣鑄造一座蔣公的銅像聳立於港口，豈非在此亦可象徵「免於共黨統治」的精神。

我們面對著孤寂的海，蔣公不世的功業在歷史上是永遠不孤寂的。十四

全大會開幕在即，欣見各方先進熱心的爭取黨代表、中執委、中常委之餘，願與會諸賢達在此共申對蔣公追慕之忱，效法蔣公精神而力行之。

(原載八十二年七月十三日中國時報)

十字街口

——爲參與國民黨十四全會諸賢再進一言

國民黨十四全會舉行在即，最近兩月我在中國時報先後以「吾國與吾黨」、「老人與寶島」爲題，發表兩文，略抒己懷，並寄以殷切的厚望。環顧當前各級黨員熱中競選的表現，與黨內各種人事或意見分歧所衍生的問題，深感我們的黨員爲己謀者多，爲黨謀者少，愛己者衆，愛黨者寡。回想昔日黨員們以身許黨的革命精神，與黨爲國家所負的重任，四海歸心，群相擁戴的情形，真是感慨萬千。今日面對的問題，凡是忠於黨者，都無需忌諱諱疾，以文飾非，否則，捨棄逆耳忠言，只有自欺欺人。特就觀感所及，不揣愚昧，率直列舉左述各種事端，爲參與十四全會諸同志再進一言，並就教於黨內賢達：

——國民黨建黨將近一百年，演變至今，所呈現的是老大、是保守、是因循。所以，缺乏新生的衝刺力，動輒受制於在野黨。

——黨的對策與對外文宣，仍然流於八股，無法令人耳目一新。黨務發展，一切還是老套，缺乏新的架構，以此取向，沓沓泄泄，如不力圖革新，與人競爭，必然失敗無疑。

——各界對黨的反應，從基層到黨中央，一如官場報喜不報憂，或曰官僚習氣太重，或曰只在粉飾太平。最大的弊端，莫若怕說缺點，怕聞壞

消息，不知真相如何。革新云乎哉？

——黨內須改進的問題、癥結、阻力、困難在那裏，當局諸公未嘗不知，經常只求表面敷衍，不求徹底解決。於是，問題永遠的存在，不生變數，無非苟安於一時而已。

——黨在台灣所培植的人才，不謂不多，但若干學成歸國，或翅膀逐漸長硬時，便忘其本，不再為黨效勞，甚而離黨處於對立形勢，君不見今日在野黨若干重量級人物，過去是否喝國民黨的奶水長大的？這是政策失敗，還是不知識才、重才？

——黨的政策，雖非朝令夕改，但其持久性則常因顧慮太多，牽制太多，未能徹底執行，充滿無奈感、無力感，從未聞大刀闊斧，具有壯士斷腕的氣魄。因而導致向心力消褪，無視黨中央的決策。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就是說功過是非，不應有不一致的現象。主政者固宜如此，主持黨務，豈獨不然。如有偏差，非存私，即不公。

——革命的精神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始能扭轉乾坤，挽狂瀾於既倒。但國民黨各方的表現，往往知其可為、有為而不為。這是衰頹，我們需要振作，便須先掃除這些陰霾。

——國民黨遠離群眾，與群眾脫節。所以，群眾對國民黨不瞭解，便易為反對者所蠱惑。這是基層黨工捨己為人的服務精神不夠，未能留下良好印象所造成的。民國三十四年底，台灣光復不久，當時中央社單身宿舍，雇一日婦燒飯，被遣回國的前夕，雖已辭別，但翌日清晨，猶來叩

門，自稱下午始由基隆搭輪回日，還可繼續為我們準備早餐。此雖小事，這種服務態度，我們的基層黨工，能有幾人？

——國民黨似乎已失去保密功能，中常會若干重大措施或人事異動，上午甫散會，中午便已傳遍每個角落，某某贊同，某某反對，繪聲繪影，這是怎麼一回事？

——魏徵對唐太宗的諫言中曾說：「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我們黨的根是否堅固，還是已經腐蝕，黨局諸公，望能三復其言。

以上所舉，都是逆耳之言，所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一個黨員良知所賦予的職責。當局亦宜廣開忠諫之路，廣聞各種不同的聲音，庶可成爲一個真正的民主的黨。

國民黨為一個具有光榮歷史的政黨，光榮歷史能否賡續，有待於全體黨員的團結與努力。我們希望的是：

——國民黨要成爲一個有朝氣、有活力的政黨，黨員們便須有強烈的榮譽感，爲國家負起復國重任、爲國民謀求福祉的抱負。北伐時代，民衆聞國民革命軍將至，無不額手相慶、相互奔告。我們希望能重見這種光輝。

——加強黨的組織力量，如民意機構的黨團，有黨團之名、而無黨團之實，打的是缺乏把握的硬仗，許多重大民生法案，一拖再拖，影響深遠。

——國民黨是民主的政黨，黨內意見不怕多，也不怕有反對的意見。只要是善意的，都須有接納的雅量。因爲有容乃大，古有明訓，惟有容，

乃能成其大。但有容絕非只重表面，虛情作態，而是能得其真誠。

——領導階層能為黨舉才，先總統蔣公過去常引用曾國藩所說的「中興以人才為本」之語。我們現在是否有才難之嘆，歷史上蕭何之排眾議、舉韓信，憑其善用兵，終於擊敗項羽。武則天看了駱賓王罵她的檄文，且說「有此人才而不用，宰相之過」，這是何等胸襟。江山代有人才出，要在能否賞識與重用。

——要團結、要和諧，國家始有前途，這是關心大局者一致的心聲。黨的前途，亦復如此。古人說：「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亡周興，所異者即在此。當前的處境，「一心」實為我們兩百萬黨員對黨一致的期許。

今日面對這個多元化社會的變局，混沌錯綜，莫辨其非，孰重孰輕，何去何從，使我想到十九世紀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他的名著《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有一段發人深省的話。《雙城記》是以倫敦與巴黎為背景，描述法國大革命時人性迷惑的百態。作者在首篇說：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

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

我們大家在一直走向天堂，我們大家一直走向地獄。

我們未來的歲月，是最好，是最壞；是智慧，是愚蠢；是信仰，是懷疑；是光明，是黑暗，是希望，是絕望；是擁有一切，是一無所有；是走向天堂，是走向地獄。我們如站在十字街口，當此生死關鍵之際，只有把握時機，大覺大悟。

(原載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國時報)

思前賢，看今朝

光復後，我在民國三十四年清秋的傍晚踏入台北，便與寶島結了不解緣。近半世紀來，國家多難，世局多變，我以廁身新聞界，涉歷既廣，閱人亦多。近來或因進入老境，常像蘇東坡所說的「感時懷舊一悲涼」，撫事懷人，百感交集。前輩人物，最爲我難以忘懷的，就是已經作古的兩位黨國耆宿，一位是前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先生，一位是中央通訊社的創始者，也是首任社長蕭同茲先生。他們所秉持的清操、風範、氣度，一言一行，都足以爲後代的典範，發人深省。

張岳公爲中國政壇享壽最高的一人，今日台灣各界提到岳公，那種恢宏、坦蕩、雍容、謙和的風範，立即浮現在衆人的面前。岳公的一生，爲國家出力最多的就是對日本外交，晚年曾以所經歷的中日外交七十年，撰寫了一本專書，爲歷史作見證。我們如追溯當時中國所處那種被脅迫的情勢，忍辱負重，自然是不爲外界所盡知的。中日未斷交前，岳公會以特使身分訪日，返台的前夕，旅日華僑曾集體爲岳公餞行，濟濟一堂，約有數十桌。不料岳公鄰桌的某君，聞係我方駐日大使館高級人員，卻不顧一切，大放厥詞，指責岳公負責對日外交七十年，有負國人期望，愧對國人。此君借酒發洩，罵聲愈來愈高，同桌者隱忍而告岳公。但岳公始終處之泰然，不發一語。後來且與同桌講了一個典故。他說成都有彌勒佛寺，上懸「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顏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一聯。聽者無不欽佩岳公的修養，一時傳爲佳話。「能

容」、「常笑」，言之易，行之則難，除自身潛在的智慧外，還須看平時讀書內在的功力如何，腹內墨水的容量又如何。能容，即能忍，自古以來，便為學者所重視。蘇東坡作留侯論，認為張良之成功，就是得之於能忍。過去鄭資政為元任國防部長時，便引用蘇東坡所說：「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之語，在立法院大堂中擲地有聲的答覆了立委們的質詢。如小不忍則亂大謀，自然不是理想的政治家應有的氣度了。所以，多讀中國書，便可領悟忍的道理。曾國藩認為讀書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氣質，所見亦在此。書中不僅蘊藏著中國文化，也蘊藏著中國精神。

再說蕭同茲先生，他的一生事業在中央社，聲譽也在中央社，中央社鼎盛時代，揚名國際，足以與合眾社、美聯社、路透社等並駕齊驅，都是歸功於他的領導。所以，新聞界的老一輩至仍奉他為泰山北斗。他的風度，過去周至柔先生曾讚稱：三爺（同茲先生）的風度別人是無法學到的。我因追隨甚久、相知亦特深，這裏就其日常生活中的小節，略述數事：

第一，三爺從不求名，他在社長任內，雖貴為中國國民黨中常委，但不希望中央社編輯部於每週常會後所發的新聞有他的名字，認為中央社是公器，不可私用。過去很多顯貴，都喜歡報上有他的名字出現，我在主持中央社台北分社時，中央大員居正先生蒞台，某公便因隔日新聞報導歡迎行列中沒有他的名字，前來興師問罪，以視三爺，何啻霄壤。

第二，三爺之於中央社，情如父子，香港分社主任曾恩波生前稱三爺為「中央社先生」，其所代表精神，旁人未與焉。一旦割捨，情所不堪。

於是，親友們乃相約定期前往蕭府共餐或出外小酌，欲以相慰。而三爺從不介懷，離職後，據家人告，從無怨言，亦不提中央社，自然更談不到今日所謂情緒的「反彈」。

第三，三爺不屑世態炎涼，當周至柔先生任台省主席時，曾應美國務院之邀，前往訪問。當時松山機場送行者人山人海，都搶先與至公握手。三爺則獨處機場一隅，靜觀熱鬧人潮，無意去擠。他表示心到即「誠」也。後來黃達雲先生受命接任台省主席，台北各界人士爭相前往中興新村參加移交典禮，道賀者極衆。而以三爺與達公關係之深並未前往，卻邀台省耆宿林四爺（柏壽先生）與我同日上午到松山機場迎接甫自省府卸任的周至柔先生，至公頗受感動。

第四，三爺經常捨己爲人，曾國藩贈胡林翼有「捨己爲人、大賢之量」之語，三爺確有大賢之量。見其小者，如某次方城之戲，他已和牌，但發現下家某夫人，也是和牌，樂不可支。三爺便急忙將牌推倒，背後看牌的已故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先生，不解其故。後來始知三爺以某夫人是輸家，不如相讓。雖是小事，旁人不能爲，而三爺能之。這是最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事。

我們回到現實動亂的世界，環顧衰衰諸公，坐賓士車，招搖過市者有之，大鬧民主殿堂、張牙舞爪者有之，趨炎附勢，如群蠅相逐者有之，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能如岳公與三爺這樣大度大量、持之如一，不爲環境所動搖、所改變，處之泰然者，實不多見。

台灣的政局，自從各報競載內閣總辭及繼任人選等報導後，整個天地爲驟風急雨所籠罩，捕風捉影，論壇也被無端的激起了驚濤駭浪。如以舞

台劇比喻，我們身為觀眾，看到這齣歷史劇演到最高潮時，真是緊扣心弦，發於良知的憂國憂時熱忱，如漩渦激盪。現在，歷史劇已經落幕，觀眾對劇情的發展，從廟堂到里巷，無不引為談資。這是民主時代，也是民意爆發時代，自然有各種不同的聲音，但是，從此又引出了另一個眾所矚目，見仁見智的問題，就是對理想政治家的素養，議論紛紛。

我認為真正理想的政治家，至少須具備下列各點：一、有眼光用人，二、理想的智囊團，三、高明的政治藝術。能用人，司馬光在一千年前便曾說過：「為政之道莫先於用人。」歷史上，多少開國具有恢宏的氣象，多少盛世具有輝煌的政績，無不因有一群能臣為帝王用，然後成其不世之業。劉邦之用韓信拜將，韓信則稱劉邦為能將。能將，就是能領導群倫，知道如何去用人。蕭何、張良、陳平等曠世之才，乃能竭智盡忠，發揮到淋漓盡致。劉邦毫無政治資源可言，後來剷除開國功臣，也為人不滿，但他的用人智慧，卻不能不令人激賞。唐之開國，亦因李世民之能用魏徵、房玄齡、杜如晦一群能臣，始能開拓威鎮八方的鼎盛時代。其餘如文景之治、開元之治等盛世，無不有賴於重用人才。所以，先總統 蔣公亦曾昭示：「中興以人才為本。」至於智囊團，任何領袖或政治家，都有智囊團為之策劃，智囊團的成員，不僅要有飽學之士，還須看有無政治人格、政治道德與政治眼光。諸葛亮勸劉禪要親君子、遠小人。這是惟恐昧於明察，為小人誤國。已故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因智囊團為共黨份子所滲透，終於墜入紅色陷阱，難以自拔，此為一例。智囊團如缺乏眼光，或患短見、或圖一時之利，出些餽主意，欲益反損，便像工程犯了設計的錯誤，貽害無窮。歷史上很多事例，都是誤於在旁獻計的智囊團。前事可師，一個以領袖自許的政治家，不可不察。

所以，智囊團如不理想，小者為個人誤、大者為國家誤。再說政治藝術，最近郝柏村院長接受記者訪問時，自認政治藝術差了一點。何謂政治藝術？這是有異於權謀，權謀是政客之輩，翻雲覆雨，使詐而為之，應為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所鄙視、所不取。政治藝術，應是心中有誠，而能以調和為目的。張岳公所說的能容、常笑，非高度智慧莫能為，運用得當，與佛曰不可說，都是屬於政治藝術的表現。西漢的東方朔，應為此中高手，他能以最機巧、最精簡的言語，一語化解僵局，或排解難題，貴乎詼諧中寓有諷意，但仍不失其真誠。歐美不少政治家，如羅斯福、邱吉爾都能憑其機智，幽默一番，以言語代替人力解決問題，自然亦屬政治藝術。這種境界，真如諸葛亮的羽扇綸巾，指揮若定，成敗都可取決於談笑指顧之間。

當前政局擾攘，社會各界雖有各種不同的反應與批評，但期以化戾氣為祥和，精誠團結，努力建設，國家前途從此呈現光明的遠景，則無二致。名作家魯迅當年有詩云：「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如移用於今日，真可為在此兩千萬人心情的寫照，這是大眾共同的心聲與期許。

(原載八十二年二月廿二日中國時報)

卓越、遠見、天下

久居空氣污染的台北市，所見者滿目塵埃，所聞者滿耳噪音，空間如被煙霧所蔽，視野狹窄。最近因有日本之行，登機而上，環顧雲霞萬千，鳥瞰波濤洶湧，回首台灣，漸行漸遠。使人頓覺宇宙無窮，胸懷曠達，俯仰於天地之間，塵襟滌盡，想到蘇東坡所說的「渺滄海於一粟」，此身實在是太渺小了。旅篋所攜平日常看的《卓越》、《遠見》、《天下》三種月刊，其中不乏憂國匡時的論著，原擬藉旅途之暇，詳為細讀。不期三種名稱，如影交錯，在我的思維中很巧合的正勾勒了台灣光復後四十多年發展所突顯的一些問題。閉目凝神，一時或步入遙遠的歷史隧道，或面對風雲多變的現實世界。這份遐思，如遊離於長空，如環繞於左右，又如發於良知的塊壘，揮之不去。回台以後，風雨不寐，特為之補記。

以「卓越」而言，過去先總統 蔣公常引用曾文正所說的「中興以人才為本」之語，這是萬古不易、放之四海皆準的名言，中外古今，莫不皆然。尤其是挽狂瀾於既倒之際，存亡成敗，都是取決於有無卓越的人才。在台灣，當年處於風雨飄搖，幾已危在旦夕的形勢，後來撥雲見日，化險為夷，終於成為亞洲自由的燈塔。雖然出於政府當局堅定信心，取以強勢的領導，其中最不容忽視的就是有兩大支柱的力量在擎持著，一為經濟力量，一為教育力量。領導人物，或高瞻遠矚，或精心擘劃，有的已為人知，有的則不為人知，他們的卓越貢獻，都是功在國

家。台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政府雖圖治心切，但若干措施，或迫於情勢，或出於人謀，事與願違。台灣行政長官改組後，陳長官公洽於離台前夕（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特邀我作了兩小時多的長談，提到當時政府各機關主管時，我以他主政閩台兩省先後十年的幹部以何人最爲卓越相詢，當時在我心目中以爲必屬嚴靜波（家淦）先生，他却坦然指爲包可永。我復以嚴處長靜波（時爲財政處處長）如何相詢。他說，嚴確爲一位最理想的幕僚長。按包爲陳公洽主閩時的建設廳廳長，出身於交通大學，留美回國後，曾在母校任教一段時期。他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則爲工礦處處長，負責接管日人所留下的各種生產機構。當時台灣被盟機轟炸以後，很多生產機構都是滿目瘡痍。光復後，原毀的加以修補，很快的便能恢復生產。一面調整機構，積極的著手物資儲備等工作。無疑的，都是台灣的資源，與推動經濟發展無不有關。後來台灣經濟的取向，就是循此路線，邁向開發，日益昇華。所以，包可永實已制其機先的爲台灣奠下了鞏固基石。只是爲人所忽略，不爲人所周知。政府遷台後，對台灣經濟最有卓越貢獻的人，自然首推至今猶令人懷念的尹仲容，尹氏亦出身於交通大學。李資政國鼎稱他爲「出身電機工程，成就却在實業與經濟，不但精研理論，更長於實務，懂得配合動態之環境，尋求切實有效的解決途徑，勇於接受新的觀念與知識。」可謂知人之言。尹氏歷任財經首長，從台省生產委會、中信局、經濟部、外貿會、美援會到台灣銀行，都是在國家最艱危之際，負有金融穩定與經濟發展的重任。平時唯傲骨嶙峋，但敢作敢爲，勇於任事，無視外界的褒貶，一心一意，真正的爲國家做事，謀國之忠，實所罕見。所以，有人稱他爲「台灣經濟發展之父」，洵非虛語。我們今日經濟建設有此舉

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當知飲水思源，其來有自。

至於教育建設，雖為台灣建設中很重要的一環，教育普及，有助各種建設，但是我所懷念的却是開風氣之先的傅斯年。傅氏出長台灣大學後，雖為台大提高了學術地位，聲名遠播，最重要的還是為台灣帶來了富有朝氣與活力的學術自由風氣。傅氏當年希冀將北大的學術自由風氣，也能轉移到台大，重見於光復後的台灣。用心之專，所見之遠，不得不令人敬佩。當時台灣的確為之氣象一新，莘莘學子也都能廣受其澤。而他的誨人不倦精神，一以貫之的為國家教育而奉獻，始終不懈。不料不屈於民意代表羞辱之詞，竟以身殉。對教育界、學術界而言，都是百身莫贖，無可補償的損失。當時台大全體學生的輓聯為：「嫉惡如仇，以歷史為經，以民主為緯，正義永彰，繼起斯文望我輩。愛才如命，為學術而生，為教育而死，典型猶在，共揮熱淚哭宗師。」不知出於誰的手筆，傅氏的一生，的確是很沈痛、很傳神的描述而出。但在四十多年後的今日，我們的社會已在大幅度的改變中，台大畢業的青年們，人才濟濟，雖不乏國家棟樑之才，但回想當年以「繼起斯文望我輩」自許，環顧當前，究有幾人仍有如此使命感，毋負傅氏在天之靈。

蘇東坡評贊韓愈曾有「匹夫而為百世師」之語，匹夫就是平民，平民雖在古代，還是受到重視。現在貴為民主社會，像這樣進步的社會能有幾人足稱百世師，舉世滔滔，只恐惟有傅氏當之而無愧。如今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緬懷傅氏，能不倍增仰慕之忱。

再談「遠見」，一個傑出的政治家，都是具有遠見，高瞻遠矚，見人之所未見。先總統 蔣公當年安內攘外的主張，就是遠見，如非局勢乍

變，未安內便先攘外，中國或不至遭此後來歷史所罕見的浩劫。勝利後，蔣公寬大為懷，昭告國人對日本必須以德報怨，此亦所見者遠，所慮者深，深望中日兩國和平相處，維護亞洲永久的和平。這種遠見，必將為治史者所肯定。在台灣，當初大陸撤退，人心未安，陳辭公（誠）受命於危難之際，主持台灣省政，為國家留此復興基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其施政最高的原則，厲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促成農業與農民收益增加，佃農生活改善，導致農村社會安定，以農業支持工業發展，為後來的台灣締造了經濟繁榮的局面，當時亦憑陳辭公持有遠見以成之。雖然，此皆出於國父遺教，然如非陳辭公的大胸襟、大擔當，能從遠處著眼，運用其鐵腕，為人所不能為而能為之。所以，陳辭公為國盡瘁，出殯之日，台灣農民們無不以感其德，蒙其澤，路祭巷哭之哀，有人喻為農民們對陳辭公的情感，無異蜀人之於諸葛亮，其所受之擁戴，當時的台灣，實為前所未見。

台灣的地主們，如板橋望族耆宿林伯壽、鹿港辜振甫，為配合政府土地政策，便首先響應，慨然將祖先留下的大批良田，全都付與耕者，亦非有遠見所不能。環顧當前的社會，到處充滿著功利主義的色彩，汲汲以圖者，非功利而莫為，能不令人感慨無窮。

至於談「天下」，李登輝總統對友邦人士曾稱：治國的理念是天下為公，這是國父當年所昭示的理想最高境界，這種崇高理想，中外傾慕。我們恭聽之餘，當知體仰總統所持的宏願。中國雖在專制時代時，孟子亦有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語，即在北平故宮養心殿，至今仍可看到「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的對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愛國之士，無不以此爲披肝瀝膽所期許的心聲。何況今日的民主時代，國人都知天下乃大衆之天下，天下事大衆便須傾身而爲之。秉此理念，我們都應爲追求這個理想而努力。回想抗戰時期，三民主義青年團在陪都重慶成立時，門口懸有「欲做官者莫入此門」的聯語，以天下爲己任，勗勉青年，而青年亦能知所自勵，奮發有爲，置個人利益於不顧。那種國家至上的氣勢，精神所聚，所向披靡，與今日社會所見者，相去實遠。今日所見者，立足台灣，所想的不外是個人的利慾薰心，所見的不外是台灣一隅的繁榮社會。真能胸懷天下，爲國家捨己而奉獻的人，能有幾人。從小處來看，環保問題，便可以小喻大，考驗個人的道德觀念與行為，能否爲社會公益著想，能否具有己飢己溺的意識。此次赴日，我曾深入鄉間，看到日人對環保問題的重視，政府有計畫，人民有守法精神，大家有公德心，令人爲之汗顏不已。爲什麼別人能，我們則不能。我們曾自認爲是很有智慧的民族，但也不否認是缺乏公德心，很不守法的民族。二十一世紀，都稱爲中國人的世紀，我們放眼台北，街頭的車群人群，爭先恐後，毫無秩序可言，民主殿堂的拍案驚奇，扭成一團，仍爲傳播媒體引爲世界奇觀。我們真沒有資格談以天下爲己任，只知自往臉上貼金，其欲不令人抱杞人之憂，豈可得乎？

我的故鄉福建簡稱爲「閩」，這個閩字，過去有人戲稱，福建人秉性好內鬥，很像門裏裝著蟲，關起門來，自相殘殺，但仍跳不出那門框。台灣現在二千萬人，其祖先多半自福建渡海而來此。如今高唱立足台灣，放眼天下，能否摒除祖先的遺傳，不存偏見，自強團結，一致對外，我們惟有拭目以待之。

個人來台忽將五十年，身歷世變，有看不盡的變在演變著。但堅信我們在此的人愛這個國家並沒有變。我們只望江山代有人才出，國家有更多的卓越人才，更多有遠見的政治家，為國家導向光明之路。普天下的子民都能為愛國家竭忠而奉獻。

(原載八十二年五月六日中國時報)

遐思

從中山樓到國會議會殿堂，從廟堂之上到里巷之間，袞袞諸公，泛泛小民，喧嚷終日，透過各種傳播媒體的報導，我們聽到的聲音，看到的文字，彷彿都是怎樣的選總統，怎樣的糾葛議事之類的新聞。其實，我們總統的任期尚未屆滿，修憲的目的也不是完全為著選總統。我們國家的前途、大局的前途怎樣，卻很少人去關懷、去注意，似乎早已消失於一片混亂中，連微弱的呼聲也難覓。

台灣確因經濟的發展，社會日益繁榮，民主的潮流，言論日益自由。這就是時代進步的動脈嗎？誰都無法抗拒，也無法逆料這裏所發生的事物。繁華是有負面的，自由也有負面的，而我們卻如在凸顯兩者負面的氣壓下生活著。四十年前，我們還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口號，十年雖在風雨飄搖中過去了，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努力方向，隱約地仍然存在著。而今我們的生活空間，好像沒有方向，我們的感受，只有奢侈、只有暴戾、只有虛浮、只有渙散，缺乏勤勞，缺乏祥和，缺乏誠篤、缺乏團結。我們的國家前途、大局前途，仍然一片蒼茫，無人去關懷、去注意，何者為輕，何者為重，也失去了應有的權衡和取向。社會任何的角落，似乎都在功利主義掛帥的旗幟下指使著、擺佈著。

因而很多亂象也從而產生，令人感慨的是，很多足以妨害國家發展和建設的事端也都無形的在此潛伏著、衍生著。政府為遷就民意，許多事件，舉棋不定，或朝令夕改，非惟不能取信於民，公權力、公信力也打

了折扣。有人或認為這是步入民主時代無可避免的現象，殊不知這是似是而非、本末倒置，徒令天下滔滔，所為者、所爭者，都是為逞一己之私慾，置國家前途、大局前途於不顧。屈原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我們豈能重見於今日。雖然，時代潮流所趨，民意民怨都不可忽視，須知古人所說的「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一切能相忍為國，才是我們共同所期待的境界。也許這是我的遐思，但願能於我們這個喧嚷終日的社會見之。

(原載八十一年三月卅一日自立晚報)

談大老與大器

中國是一個泱泱大國，我們對於這個大字，在意識上都認為這是崇高的、宏偉的、有容量的、有擔當的，絕不是常人所易與的。在這些大的字彙中，最近使我聯想到大老與大器。大老兩字，原出於孟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之句，所指的是伯夷、太公二人，此二老是何等偉大的人物，翻閱中國歷史，能有幾人足以相提並論。後代雖時移事遷，價值觀念也不一致，但能以大老相稱的人，畢竟是鳳毛麟角，絕不是車載斗量。大老之令人敬佩之處，就是總統府故秘書長張岳公生前常說的「養望」，都已經臻於最高的境界，言養則大節凜然，具有松柏不凋於歲寒的情操，所見者、所為者無不是從大處著想。言望則衆人望之如泰山北斗，不以高名為己榮，雖歷經風雲之變，仍然老成持重，不以落寞而寡歡，遠世俗而能益見其高。其對國家、對社會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漢初蕭何，無愧國之大老，當時力排衆議，為國舉才，就是能從大處著想，但是終其一生，淡然自處。唐初魏徵，風骨嶙峋，言以興邦，亦屬國之大老。漢唐之所以盛，國有大老，實為不容忽視的主因之一。洎乎近代，最令人敬佩的如北京大學故校長蔡元培、南開大學故創辦人張伯苓之於教育界，開風氣之先，為國家造就不少人才。當時雖處江湖之遠，仍見其時有憂時憂國之心，尊之大老，自可當之而無愧。所以，大老絕非泛泛之輩，就像左傳所指的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至於大器，當然是指足以負大任、濟大難的國家卓越人才。稱為大老，

自然都具有大器的胸襟與才識，但是有大器者，未必都配得上稱為大老。環顧天下懷抱大器者多矣，我們雖不以將來都能成為大老期許，而目前如不知自惜其才，用得其所，只知孳孳為個人的名利角逐，而不知為國家、為社會多做些有益的事，未免令人扼腕嘆息。如今是一個充滿競爭的時代，天生我才必有用，如有大器而不得大用，或淪為私利，或淪為作秀，非惟對人力資源是一種浪費，對社會也會構成負面的影響。想到古人所說的「國以賢興」之語，言念及此，能不感慨係之。

(原載八十一年七月廿九日自立晚報)

容量與民主

我們中國人品評個人的品德修養，器度是十分被重視的褒貶重點，能成大事業者，必有大器度，能有大學問者，必有大器度。反之，斗筲之器，或不能忍一朝之忿者，都成不了什麼氣候。器度，所顯示的是行為的容量。所以，謝前副總統東閔，便曾引用古人所說的「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取以勗勉國人。希望大家都能有很大的容量，共體時艱，不計眼前得失，能從大處來著想。否則，大家都容不得人，長此以往，絕非國家之福。

放眼世界各國，談容量，見於大者，以美國大選為例，選前所表現的都是劍拔弩張，各不相讓，而且竭詆毀之能事，那裏談得上什麼器度，但一旦勝負揭曉，那種昇華為民主精神的容量，失敗者，從未聞以失敗為羞恥，恢宏磊落的胸襟，反而坦然向對方伸出道賀之手，不嫉視，不虛偽，民主精神之可貴，實在於此。而其小者，如日本人過去篤信武士道，事事必以佔為己有而後快，處處必以勝利者自居。那種短小的器度、容量，醜態畢露。瘋狂的戰事，終於注定失敗。又如美國南方那些越界潛入的墨西哥人，與無知的黑人，看到別人的高級寓所或名車，入夜便以油漆塗之，以洩其佔有慾失落的憤慨。如此劣跡，還談什麼器度、容量。

回顧我們中華民族，素以泱泱大國自稱。今日台灣，外人都盛讚我們自由民主社會的進步，為亞洲各國所未見，國人聞之，似乎其樂陶陶，忘

卻此身究在何處。揆諸實情，談容量，談民主，我們能否足以與外人媲美，言之可愧。我們這個社會，實在太開放、太自由。記得胡適之先生生前曾說過：「容忍比自由更為重要。」因為自由不是放任，不能侵佔、損害他人的權益，一個民主社會的國民，更應懂得自由的真諦，自知如何約束，如何容忍。但我們眼前這裏所見的只有以民主之名，譁眾取寵，街頭亂嚷，惡形惡狀，不一而足。現在立委選舉在即，看看別人，想想自己，但願我們的參選人士，都有大器度、大容量，以國家形象為重，摩拳擦掌之餘，都能三思而行之。

(原載八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自立晚報)

思往事，論千秋

我到台灣，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以中央社特派員身分，偕前進指揮所人員由陪都重慶一起搭機抵達台北的，也是來台記者群中最早的一人。當時的感受，與置身日本無異，因為從滿街的路名、店名到木屐聲，看的、聽的，都充滿了日本風味。但是，入鄉問俗則不然，從衣冠到禮儀祭典、民情風俗，無不是保持了與隔海相似的中華文化的特質。最令人難忘的是，當我在政府尚未接收以前去參觀小學時，那裏的教師們還是日本人，他們仍舊口稱中國為「支那」，當場便有學生起立駁斥：「我們是中國人，不是什麼支那人」，理直氣壯，至今如聞其聲。當時給予我的啓示，日本軍閥雖在銳意經營，統治了台灣五十年之久，它所攫取的只是台灣的物質，所改變的只是台灣的外貌。中華文化的「根」，仍在這裏民間孳生著，中華民族的血，仍在這裏同胞身上沸騰著。

如今，事隔已四十餘年，放眼再看台灣，正面的建設，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已為舉世刮目，外匯存底且已直追名列第一的日本，貿易總額至去年亦高達一千一百多億美元，儼然睥睨一切。但是負面卻有不容否認的隱憂，我們的文化建設如何？精神建設又如何？社會風氣的敗壞，道德觀念的淪喪，滿街爭先恐後的混亂秩序，每天殺人搶劫的悲慘新聞，到處瀰漫著暴戾之氣，為台灣構成了一幅極為醜陋的畫面。所以，外在的繁榮風光，雖足以揚眉吐氣，為台灣炫耀於一時，內在的欠缺與不

足，我們卻不能不加重視，在歷史上爲這一代留下了空白的一頁。我們歷經憂患，飽覽滄桑之餘，對國家、對世局，心裏所祈求的將不是一時的，而是可向千秋交代的。

(原載七十八年八月九日自立晚報)

宴客的藝術

故總統府秘書長張岳公（群）在世時，曾與我談到宴客之難，他調侃的認為這是一項藝術，最完美的宴客應當具備七美。何謂七美，他指的是：（一）主人、（二）主客、（三）陪客、（四）佳餚、（五）美酒、（六）談吐、與（七）聲樂。七美缺一，就是美中不足，顯然有些瑜不掩瑕了。其中最難的當屬主人，他負有操縱全局之責，必須胸有成竹，對人對物對地都有充分的瞭解與鑒賞力，始能恰如其分。否則，只要一人向隅，滿座不樂，縱使最美的畫面，也被破損殆盡。

中國佳餚之精緻，很多人都認為這是藝術傑作，亦可代表中華文化。如岳公所說，宴客難乎綜合之美，佳餚如只填飽肚子，那裏談得上文化。當年曾任參政員的傅斯年，曾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除對宋擔任行政院長的財經政策、政治風度有所批評外，並指責其宴客缺少文化，認為『大可不請客，既請客，偏無話可說，最客氣的待遇是夾菜，此之謂餵客，非請客也』。餵客是極傳神的創詞，自然毫無文化可言。有人認為宋雖權傾一時，但不會宴客。惟有勝利後宴請美國魏德邁將軍，尚足掛齒。當時席設上海愚園路李擇一私邸。宴客所用餐具盡屬古器，設計精美，司廚亦為李府的福州大師傅。知者稱為這是替他上了最現實的一課。李為行政院參議，與宋有私交，與日本關係極深，又曾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顧問，光復初，宋伉儷來台時，即由李接待。

陳公洽（儀）任台灣行政長官時，他的宴客，陪客菜單地點始終不變，中央大員或外賓蒞台時，陪客總是長官公署各處處長，地點在台北賓館。有人便戲稱他的宴客如上軍事課，一二三四開步走，旋律太單調了。三十六年夏，他離台時，邀我談話，我即以此相告，他聞之默然不語。他主台期間，與外界隔膜，接觸面不廣，以致耳不聰、目不明。

我們從上面三人對宴客處理的差異，便可想見其爲人，思過半矣。岳公謙和練達，國之老成，深得人望，享譽享壽都非人所能及。宋子文則高傲自負，輿論至今貶多於褒。陳公洽更是剛愎自用，飲恨終生。人間到處是學問，亦可見於宴客，其不然乎？

（原載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自立晚報）

台北缺少了什麼

——歲暮抒感

天寒歲暮，風雨霏霏，對此情景，都有一些感觸，撫躬自問，在台北塵埃擾攘中住了將近半世紀之久，從壯年到老境，從艱危到安定，從落後到建設，從貧乏到繁榮，如走過歷史的隧道，不知經歷了多少的世局滄桑，人事盛衰。整個世界在變，台灣也在變，而我憂患在此，安樂亦在此，有時真有「此身雖在堪驚」的感嘆。環顧台北的人情風物，似乎比自己的故鄉更關注、更親切一些。台北那幾條常走的街道，與那些固定的生活習慣，都是熟識地環繞著我，一飲一啄，也從未產生什麼久旅未歸的落寞情懷。

也許，台北與我，已經延綿著安危與共、休戚攸關的情感。於是，我很關心地感到台北似乎在缺少什麼，從尊顯的廟堂之上，到蔽塞的里巷之間，到處都像瀰漫著缺少什麼似的失落感。尤其今年我因先後往遊日本及中國大陸，看得很多，想得很多，回台後，心裏憑添很多的感觸。幾次我在曲終人散，或午夜夢回的時候，回顧茫茫，這份缺少的失落感，仍然凸顯地存在著。因此，我在想：

——我們是否缺少守法精神，自從政府解嚴以後，我們都以民主政治自相標榜，友邦人士也以此盛讚我們。但是，我們的守法精神在那裏？在國會殿堂，還是在街頭。民主貴乎守法，貴乎接納反對或失敗的度量，

我們國會所見的是對罵不足繼之以肢體，豈可作為民主教材。民衆盲從，不問皂白，動輒走上街頭，強說這是過渡時期，這是陣痛，豈非自我解嘲。要之，守法不限於民主政治，即如國家建設、社會秩序、端正風氣，朝野各界無一非有守法精神不可。日本戰後所以重建，新加坡彈丸之地所以崛起，菲律賓實施民主有年，何以瀕臨傾覆，此皆與朝野國民能否守法有關。

——我們是否缺少祥和樂利之氣，我們自稱為愛好和平的民族，但我們所見所聞的新聞，卻無日不有私製槍枝、走私、兇殺、搶劫等充滿戾氣的報導。傳統的道德繩準，對人的行為，早已失去約束的能力，盜賊之心不起於飢寒，而起於虛榮貪婪，這是教育問題，還是功利主義的氾濫？遺害所及，社會風氣，人際關係，到處都是惟利是圖，不顧攫取的手段。於是，人間沒有祥和樂利，只有暴戾欺詐。

——我們是否缺少前瞻性的眼光與計畫，胡林翼曾說：「天下治，則輕小事，重大事。天下亂，則重小事，輕大事。」此語耐人尋味。重大事，就是具備前瞻性的眼光與計畫，所見者遠，所慮者深，高瞻遠矚，不汲汲於一時的損益。而小事所指的無非就是眼前的得失，個人的成敗。我們的社會所以亂，平時所爭者，多屬這些小事，專為自己造勢，出盡鋒頭，是非可以不計，利害不能不計，惶惶終日，捨大事而不顧。於是，令人追懷先總統蔣公當年對某一將領，曾作「小事精明、大事糊塗」的評語，這是輕重不明，禍福不分，有以致之。

——我們是否缺少真正的政治家，政治家有異於政客，政治家有遠見，有宏量，以國家利益為利益，不屑於私利。如北宋寇準被人稱為「有官

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這類人物，始可當之無愧。歐陽修對君子與小人的評語，亦可視為政治家與政客之別，他認為君子以道義忠信名節相交，以之事國，終始如一。小人則以利相交，利盡而交疏。小人的「利盡而交疏」，正是政客的寫照。政客雖無代無之，與世則無益。

——我們是否缺少大容量、大氣度的典型人物，此不限於政治人物，經國先生在世時，曾勉勵青年要「開大門，走大路」，這是何等氣勢、何等胸襟。顯示為人要有抱負，要有勇氣，不要拘泥侷促於一地。張岳公（群）對氣量亦很重視，他常以四川彌勒佛寺所懸「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的聯語示人，希望世人都能有此修養。所以，他認為凡事都須拿得起，放得下。質言之，這是風度、風格的表現，也是量的考驗。環顧今日台北，社會如有某種力量的激盪或承受，仍能拿得起、放得下，保持風度，不亢不卑，曠達自適的人，實在寥寥無幾。量是風度的內涵，有量，還須忍，小不忍則亂大謀，古今皆然。星雲大師對其名節受損，為人抹黑，曾撰「忍耐就是力量」一文（見本月份普門雜誌），他說在大陸時，中共說他是國民黨特務，欲加殺害，來台後，國民黨又說他是共諜，他只有「淡泊處之，默然以對」，可見忍亦不易。沒有量，自然不足以語風度、風格。所以，我們深望能成非常之功者，必須具備非常之量，不以小怨而損大事。目前社會所企求的是和諧、是團結，這需要量的包容、調和，然後臻於有容乃大的境界。

——我們是否缺少防範於未然的真知灼見，國際局勢雖瞬息萬變，未可逆料，但若干發展，有利於我，或不利於我，都隱然有其脈絡可循，亦

有其必然之勢。我們不乏國際問題或財經專家，對於世界變局，是否都能見於未萌，洞燭機先，預作未雨綢繆之計？一旦事發，演變至無可挽回時，雖欲臨渴掘井，則已爲時過晚。所謂「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我們卻時常昧於察覺。

——我們是否缺少泱泱大國的文化內涵，在台北我們無論看到的、聽到的、或吃到的，似乎都已到達有美必備，無美不臻。建國以來，無此之盛。我們目不暇給之餘，似乎並未發覺我們這個泱泱大國的文化在那裏？國魂又在那裏？這不是彩色可以包裝的，也不是金錢可以購買的。我在台北街頭逡巡至再，還是找不到這個答案。

以上拉雜所談，都是憑一時的觀感，秉乎良知之言。古人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泛泛之作，聊以抒感，以視齊東野人之語，庶幾不遠乎。

(原載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國時報)

講話的藝術

我國在春秋戰國時代，講話的藝術，最有凸顯的表現，如蘇秦張儀之流，逞口舌之能，便可拜相，都是古今罕見的人物。孟子雖富辯才，但講的是仁義，不適合於那個勢利的年代。屈原也有口才，惜太耿直，終於被人所害，投江而死。西漢時，賈誼、東方朔都擅辭令，賈誼雖報國心切，但自視太高，結果齎志而歿。反而不如東方朔能以詼諧寄諷諫之意，爲人贊頌。古人這些成敗之異，一言以蔽之，關鍵只在能否懂得講話的藝術。

近代名人中，如已故作家魯迅，雜文運筆如刀。傳聞當年離開廈門大學時，因不滿校方主張私校要多聽出錢人的話，便在校務會議席上，擲出銅元數枚作爲捐款，自稱我現在有說話的資格，大罵而去。像這樣作風，似乎令人難以恭維。二次大戰時，英國保守黨首相邱吉爾，以幽默聞名於世，最懂得講話的藝術，許多重大國際問題，往往能以一語破解僵局，這是智慧，也是藝術。

這種藝術，能否運用恰到好處，一語九鼎，令人叫絕，還是要看講話的是什麼人。民國四十二年，我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政軍高級幹部聯合作戰研究班第一期受訓，爲期三月，班主任是前總統府秘書長張岳公（群），受訓人員，都是一時之選。某夕，院方正舉行晚會，有學員數人，自行外出在陽明山管理局招待所宴敘，某學員大醉而歸，進入盥洗室時，舉手擊落臉盆臉巾，狼籍滿地，吵鬧徹夜，管理人員束手無策。

次日，岳公得知此事，於清晨步往升旗台時，見大醉某學員，便笑語：「昨晚你太辛苦了！」，「太辛苦」三字，使對方滿臉通紅，難以自容。岳公責人的藝術，真是絕妙。

如今民主殿堂袞袞諸公，爲民喉舌，質詢官方人士，每日電視都有精彩的鏡頭，有拍案驚奇，有橫眉怒目，也有嘲笑挖苦，不一而足，藝術如何，惟有待於公論。

至於廟堂之上，每有憂國安邦之言，其聲鏗鏘，爲世人所重視，講話的藝術，是否絕妙，恐亦有待商榷。

(原載八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自立晚報)

也談「除三害」

國劇中有「除三害」一齣，主角周處，好鬥成性，與一虎一蛟並稱三害，後來蓄志向善，殺虎斬蛟，三害乃除，這是一齣足以醒世勵俗的歷史名劇。環顧台灣，當前嚴重的影響社會風氣，似乎也有三害。但此三害並不見於形，像細菌一樣潛入人體，爲害匪淺。三害者何？一曰現實，一曰短視，一曰傲慢，試爲言之：

先談現實，當今之世，居廟堂之高，處里巷之微，只是涉及現實，便無不先爲個人盤算。回憶光復之初，人情敦厚、風俗儉樸，人際尙存有農業社會齊之以禮的美德。而今則不然，大眾從平實走到繁華，走到虛榮，無處不是在變，也無處不是充滿功利主義。芸芸衆生，無不見利則進，見不利則退。這個利，也包括權勢，如川劇變臉，亦可忘其本、疏其親。人間倫理，視如無物，此非現實作祟而何？

再說短視，就是見近不見其遠，見小不見其大，見眼前不見其將來。缺乏恢宏的心胸，磅礴的氣概，與深遠的見識。日本即為患有短視的民族，發動侵華戰爭，幾遭亡國之禍。否則，今日中國大陸，當不至淪於共黨的統治。現在的台灣，不少人亦患短視。最近賄選的風暴，就是一例。他們好名到不擇手段，不惜鉅資，孤注一擲，冀以顯耀於鄉里之門。結果觸及法網，鋃鐺入獄，一生前途，盡毀於此。又如反對環保、核子建廠等問題，只知苟安一時，忽視未來建設：像這種失去理智的短視，後患無窮。

至於傲慢，也是人性弱點。高明如袁世凱，他的老師南通張季直，便譏以你的官愈大，我的輩份愈小。這種醜態，台灣今日官場，漠視長幼有序，到處可見。究其病源，無可諱言，若干政客，缺乏修養，墨水喝得不夠，一登龍門，遂得意忘形。而部分民代，逞質詢之能，目中無人，橫眉拍案，揮拳怒吼，蔚為世界奇觀。至於暴發戶的嘴臉，更因缺乏文化氣息，形象低俗。其他小人物，或男或女，只要暴得一時之名，傲氣沖天，都令人嗤鼻。

以上三害，因現實而短視，因短視而傲慢，三者互為因果，三害不除，豈我泱泱大國、禮義之邦之福乎。

(原載八十三年五月十八日自立晚報)

爲「勤儉」招魂

不久前我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田長霖博士在台北相晤，談到中國在美留學生，不禁感慨係之。他覺得目前中國大陸在美的留學生，很像三十多年前台灣去的學生，多數都能刻苦耐勞，勤儉嚮學。後來遇及不少由美回國的人士，談到台灣在美的學生，都認為那種勤儉奮發的精神，似乎已不多見，予人闊少爺浮而不實的印象。論職業，大學助教之類，他門多已藐藐乎不放在眼裏。

這裏，使我想起蔣經國先生主政時，他目擊社會風氣日趨奢侈敗壞，慨然以「勤儉興國」，一語號召國人。勤儉，的確是中國傳統的潛在美德，歷史上政治人物，如曾國藩，便很重視這種美德。曾國藩的謙沖力行，貫徹儒家的精神，過去最為老總統蔣公所推崇。如今大陸中共歷經鬥爭之後，也已成爲重新估價的衆所景仰人物，江澤民不久前便曾囑咐幹部去讀曾國藩傳記。曾國藩對勤儉的論點，認為「堅其志，苦其心，勞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又說：「能儉約者不求人。」環顧我們當前這個社會，我們談的是經濟繁榮，見的是物資充裕，芸芸衆生，幾不知人間尚有勤儉二字。以台灣前往大陸旅遊人士爲例，不少人腰纏美金台幣，勝於騎鶴上揚州，出手豪闊，使路人側目。

或曰，時代在變，價值觀念也在變，我們處於舉世嚮往經濟繁榮的今日，談勤儉，已經不合時宜。然而，我們緬懷近百年來散居世界各地的華僑，他們勤以得之，儉以守之，居患難，樂勞苦，成功的不二法門，

就是不出於勤儉二字。勤儉魂兮歸來。

(原載八十三年七月十九日自立晚報)

「青年才俊」與「專家學者」

民國五十三年，行政院青輔會成立時，與青年救國團如火如荼的展開各項輔導青年工作，那段時期，朝野聽到「青年才俊」，無不雀躍不已，彷彿國家希望，都寄託於他們的身上。後來青輔會為促進團結，號召海外青年學人為國效勞，每年舉辦國建會一次——聽取他們建國的獻言。於是，各界瞻仰青年才俊之盛，景象萬千，無不另眼相看。如今事隔二十多年，當時不少的青年才俊，都已成為國家的棟樑。只是青年才俊一詞，漸見沈寂，不再備受榮寵，有時反而成為戲謔之言。其故安在？或曰，此為當年錯覺，只要是青年，就是才俊，青年們亦每以此沾沾自負，豈不謬哉？

同樣的，「專家學者」一詞，不知始於何時，現在比青年才俊要響亮得多，只要涉及專業性問題，事無大小，都可請出專家學者，或研擬計畫，或指點迷津，如發現疑竇或紕漏，亦可挾專家學者以自重，甚而作為擋箭牌。於是，專家學者，睥睨一切，學問大得很，誰都不敢任意批評或妄語。有人只懂得皮毛，不問其真才實學，亦不惜以專家學者尊之，雖意在恭維，究非中肯之詞。抑且，我們這個社會，不知是否受「三代以下無不好名」的影響，亦有冒專家學者之名，而無專家學者之實，世人不察，往往即被蒙蔽，如曰欺世盜名，誰曰不宜。

以上所見，使人想起孔老夫子所說的「必也正名乎」，正名，就是任何名義，都須恰如其分，恰如其量，冒充不得，虛假不得，有其尊嚴性的

存在，無異名器，不可以假人，不可不慎。

(原載八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自立晚報)

傲骨與傲氣

自古相傳李白不能屈身逢世，因腰間有傲骨。古今名人，有傲骨者，應不止李白一人。傲骨有它可喜的一面，因有一股不為時勢或權貴所屈的正氣，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最好的寫真。我們在歷史上，從投江而死的屈原、擊鼓罵曹的禰衡，以至夷九族而不畏的方孝孺，可謂都是具有傲骨的人。從大處來看，民族的正氣繫於此，從小處來看，個人的節操亦見於此。我們常將氣節形象化的稱為骨氣，這個骨，就是傲骨的骨，代表著堅貞、正直、剛毅的精神，絕無一副搖尾乞憐令人噴飯的醜態。

我們雖讚美傲骨的正氣凜然，但並不欣賞傲骨的避人避世，遠離現實，表現過於消極。因為社會上有些亂象，惟有傲骨足以頑廉懦立，足以振聵發聵。只惜當今之世，我們欲見崢嶸的傲骨，並不多見。

傲氣則不然，傲氣雖見於傲骨，但有傲氣的人，未必都有傲骨。如當前經濟起飛，社會繁榮，若干自恃多財的暴發戶之流，便充滿著浮而不實的傲氣，或出於言，或暴於行，動輒自我膨大，實為時下病態。而其下焉者，則腰纏千金，揮霍作態，如至大陸旅遊，招搖過市，路人側目，尤為拙劣。我們認為傲氣最足以使國際視聽咄咄見怪者，莫若當今堂堂的民主殿堂，若干民代，口若懸河，拳如鼓槌，或謾罵，或拍案，甚至舉拳怒吼，無不顯示其傲氣沖天，目空一切。此皆只見於傲氣，而未見其傲骨。

誠然，凡具有傲骨者，無不挾有一股天地不可奪的強烈正義感，不能唯命是從，不能同流合污。凡事斷然有所為，有所不為。所以，由此也注定了一個人某些方面挫折的命運。

環顧我們這個社會，滿身傲氣的人，幾乎觸目皆是，而求之傲骨，殆已不可多得，不亦令人嘆息乎？

(原載八十三年九月廿三日自立晚報)

選戰三忌一願

台灣此次省市長選舉，盛況空前，確屬光復五十年來的創舉。基於我們能否落實地方自治，邁向民主政治的新時代，此次選舉便成為具有關鍵性的成敗考驗，一切動態都將關繫國際視聽，為世人所矚目。觀乎近來選戰所出現的鉤心鬥角，花招盡出，幾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勢，令人難以摒息。我們居於此，見於此，上自政府顯要，下至販夫走卒，都不免有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心情，靜觀其變。喜的是我們已經實踐民主政治，將可躋入世界民主國家新的行列。憂的是我們的選情，出奇制勝，怪異莫測，所言所行，是否真正的符合民意，不再為金權暴力所干擾，以致騰笑異邦，國家蒙羞。忝為一介選民，又是來台已經半世紀的新聞界老兵，身歷滄桑，眼觀世變，對台灣實擁有一種休戚相關的情感。因此，特就一己良知，略貢蕞蕘，以供投入選戰諸君子的參考。

個人認為選戰無論怎樣的戰雲密布，聲嘶力竭，基本上至少有三個不可動搖的天經地義原則，無論執政黨、在野黨或無黨無派人士，身入其境，都須共同的約束避免。此即選戰三忌，不容我們有半點疑慮，何謂三忌？

其一，選戰必須心中有國家、有民族，無論時代潮流怎樣的變，社會情勢怎樣的變，我們都須顧到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尊嚴，國家是自己的，民族也是血脈相連的，都不容受損，這是每個國民應有的認同。我們如果將責任交給一個沒有國家民族觀念的人，何異盲人騎瞎馬，亂闖亂

撞，這是極為危險的事。此輩縱使在選戰中僥倖獲勝，國家安全可虞，前途莫卜，將來恐亦難免留下了「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現代悲劇。如屬選民無知，豈可犯此大忌。

其二，台灣光復後，從戰後滿目瘡痍、百廢待舉，到目前以經濟掛帥，社會呈現一片繁榮的盛況，這是政府傾其全力與全民一心一德共同努力的結果，中間曾穿梭了一條漫長的艱辛困苦歷程。選戰有識之士，飲水思源，當知羅馬非一天造成，便須看得遠，站得正，能以原有的基礎，為促進經濟發展、加強地方建設，再創佳績而努力，始為光明磊落的正途。如果只逞口舌之能，雌黃信口，顛倒是非，不擇手段，以求勝利，其結果不僅將破壞原有的建設基礎，經濟成長亦將受嚴重的萎縮，貽害莫甚，實為選戰大忌。

其三，選戰不可損及倫理道德，這是關係一個民族的文化水準問題，國民有沒有倫理道德的觀念，也可由此見其端倪。台灣光復之初，教育並不普及，被人譏為文化沙漠，很多農村子弟，無力升學。如今則不然，農村到處都有留學生，到處都有得到博士學位的人。文化水準、倫理觀念，都為之提升。如因選舉與人爭執，便指著鼻子罵人祖先，禍延三代，這是什麼文化？人皆有祖，豈君獨無，人皆有子孫，君又如何？縱然有幸當選，架勢不凡，豈能一輩子都戀棧其位？須知做官之日短，做人之日長，沒有近慮，却不能沒有遠憂，此忌不可不察。

人生如戲，台灣彈丸之地，只有一個演戲的舞台，無論什麼人在演戲，演的是什麼戲，是忠貞的戲，還是跳樑的戲，這個舞台必須完整的保持著，不能拆台，也不能拱手讓人。否則，什麼戲都是演不下去了。

很多人批評執政黨，這是常態。姑不論其出發點是否別有居心，須知民主政治，就是吵吵鬧鬧，充滿著不同的聲音與意見，任何執政黨，如說完美無缺，不留讓人批評的餘地，這是謊話。如果以甲易乙，換個其他的黨執政，便可以至善至美，到達沒有缺點的境界，更是癡人說夢。所以，執政黨不是萬能的，也不是萬年的，主要須問這個黨是否對國家有貢獻，是否為人民做了什麼事。

再說我們的願望，我們既以民主政治自我標榜，民主的精神在那裏？這是全民都須有此共識。簡言之，民主就是理性的少數服從多數，具有接受失敗的容量與風度。以美國選舉總統為例，他們當塵埃尚未落定時，候選人劍拔弩張，各不相讓，但是，一旦勝負揭曉，他們無不是保持禮貌，伸手道賀，心中不存什麼芥蒂。這種君子之爭的美德，我們中國古代早已有之，如今反而禮失求之於異邦，未免令人遺憾。所以，我們竭誠的預祝此次選舉，無論誰勝誰敗，都能秉持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兼具寬容禮讓的修養，金權暴力的陰霾，也都已煙消雲散，勿使選戰再成為外人談話的笑柄。我們的選民，事業上無異是這家大公司的股東，應該都有責任感的去關心這家公司的發展，也等於關心自己的權益。能如此，投票只憑良知，不計恩怨，無關私誼，如惟恐亂之將至，棄而不顧，攜家遠走，豈非杞人憂天，決非我們所願見。我們所期待的是，台灣前途，風平浪靜以後，呈現一片曙光。展現的是，更民主、更富有、更有文化水準的寶島。

(原載八十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國時報)

數點梅花天地心

——春節讀王力行著《無愧》有感

春節期間，難得清閒，閉門家居，細讀以記敘前行政院長郝資政柏村先生『政治之旅』而名噪一時的遠見雜誌總編輯王力行所著《無愧》一書，頗有所感。自己身為新聞界一老兵，對時局、對國事，雖已歷經世變，仍有一種出於良知的客觀關切之情，以此書而言，便油然而產生了下列幾點感想：

第一，談軍人組閣，台灣光復半世紀以來，當以陳辭公（誠）始，當時國家的處境，與今日顯有不同。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風雨飄搖之際，社會遠不如今日的繁榮安定，陳辭公上有層峰的支持，而立法院袞袞諸公，多為飽經戰亂之士，其對政府施政所秉持的制衡作用，亦不如今日之咄咄逼人。所以，陳辭公得以運用鐵腕，展其抱負，踐其理想，為台灣建設奠定後來發展的宏基。郝氏之組閣，與陳辭公無論就世界局勢，國內情況，社會輿情，與人事脈絡而論，不僅迥然而異，且其本身處境之艱，與各界殷望之切，亦較陳辭公時代為尤甚，加以各種牽掣、阻力、與責難，無時或已。然郝氏猶能遺大投艱，力負重任，獲得朝野一致讚譽，政績彪炳，實為歷史留下可貴的一頁。

第二，《無愧》一書問世後，引起朝野各界與海內外普遍的注意，第一版二次印行，為數便高達四萬五千冊，間仍在不斷的加印，這是出版界

所罕見的現象。我們於此，足以昭示社會大眾對國事政情的關心，憂患相共的意態，已非過去農業時代各人自掃門前雪所能比擬，亦可說明我們的國民已邁向民主時代，都在爭相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是令人很可喜的。

第三，西方國家很多的政治領袖人物，當他們離職以後，都紛紛的為自己撰寫回憶錄，從邱吉爾到雷根，都不乏其人，他們為歷史作見證，這是很常見的事。而在我國，却為少見，如郝氏這樣出將入相，為國勤勞的人物，他不為自己留下紀錄，却出於新聞記者之手為之，記者的筆，已經擴展視野，超越過去所循規的範疇。江山代有才人出，不覺前賢畏後生，這是值得我們欣慰的。

第四，任何類似傳記，屬於報告文學的作品，對書中的品評人物或記敘，都不免有是非之爭。《無愧》一書，洛陽紙貴、群相爭睹，豈能獨免，是是非非，則非本文所欲論列。我們有感此書出版後，讀者們的反應，不論正面或反面，都不像西方有些國家，只要新書一出，便有人專事揭人之私，吹毛求疵。我們的民族性，畢竟有其傳統的醇厚、純良的一面。

第五，郝氏在此書中所見自稱大是大非，與忠黨愛國的情操，令人敬佩。其抱負、其氣度，恢恢乎匯成一股磅礴正直之氣，使我想起陸放翁詩中所見「許國肺肝知激烈，照人眉宇尚崢嶸」的人物。郝氏就是具有這樣典型的人，中國每個朝代，都有這樣的人物，今日則於郝氏見之。

第六，《無愧》一書，談到李總統登輝先生之處甚多，但總統府迄今尚保持緘默，不作一語，以別是非。即如春節前總統邀宴資政的尾牙席

上，郝氏亦在座，李總統只剴切地期望大家凡事要忘掉過去，放眼未來，向一定標竿前進。輕描淡寫，以數語解答一切是非。這是政治藝術，也是政治智慧。政治家最可貴的就是這種泱泱乎見其大者所具氣度的風範。過去總統府故秘書長張岳公（群）是很重氣度的人，他常讚美四川彌勒佛中有「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的聯語，所指即此風範。

第七，此書涉獵甚廣，但言政治尙未包涵二點，一為政治是現實的，現實到極點時，就是冷酷。一為環境是常在變的，如台灣光復時，若干台籍高層人士，沾沾自稱，我是福建漳州人，或我是福建泉州人，如今時移境遷，則稱我是台灣人。以言冷酷，中外歷史，皆不乏先例，雖骨肉至親，亦所不免。如台灣光復後，行政長官陳公洽（儀）當初滿懷熱忱，希望傾其全力，建設台灣，不料二二八事變，沮喪而歸。陳氏當時在老總統蔣公面前，備受禮遇，且以「畏友」尊稱，其結果竟悲劇下場。以言環境，則因政治基於現實的需要，環境之於人，必然會改，必然會變，其理至明，逆勢而行，徒見勞而無功。

當我讀此書後，如有所悟，竊以為一則肝膽相照，坦誠敢言，一則謙沖自抑，能容能忍，這種境界，未嘗不是民主國家的好現象。看看窗外的景物，已是冬盡春來，一片欣欣向榮的光景，天地化育萬物的本能與厚澤，似乎永恆的不變。想到昔人讀書之樂，有「數點梅花天地心」之句，郝資政的風格，恰如梅花迎風耐寒而挺立於天地之間，那種清拔的神韻，令人激賞。但梅花綻放的花朵，也在迎春，就是象徵著天地之間生機勃發，生意盎然。我們瞻望前面走的路，際此冬盡春來，還是寄以無窮的希望。

(原載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國時報)

夏威夷重遊有感

今年三月初我曾到夏威夷暢遊一週，這是我第三次前往。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民國四十六年）應美國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之邀訪美路過，第二次是一九六二年（民國五十一年）內子華嚴與我應西德政府之邀前往訪問，經美返台途中，也是路過那裏。而此次則是應台灣和信企業集團正副負責人辜振甫、辜濂松之邀，參與該團在夏威夷的大島（BIG ISLAND）巨無霸飯店（HILTON WAIKOLOAVILLAGE）為研討業務所舉行的一年一度高峰會議，使我一償重遊之願。

三十多年的動亂歲月，整個世界在變，無論政治經濟社會的層面都在變，夏威夷自然也在變。這個變，感覺最敏銳的，就是硬體新興的建設，當我們的飛機由台北經東京到檀香山著地後，首先出現眼底的是一望無盡，高聳入雲的宏偉建築物，與環繞著驚濤拍岸的景色。入夜以後，萬家燈火像為這個島上披上了閃爍的珠衫，成為名副其實的不夜城。陽光下那些建築物，却又凸顯著爭奇擅勝，幽靜中不時洋溢著動態之美，美國人似乎較別的民族更奔放、更有衝刺力，都市建設也隨之展現新的風貌。三十多年前，我在這裏依稀地記得有蔚藍寧靜的海空，婆娑多姿的綠樹，與淡雅疏落的屋榭，印象頗為荒涼，如今星移物換，我們已經無法領略當時具有清新樸實之美的海國風光了。

和信集團在火山岩的大島上以鉅資購得被人稱為巨無霸的飯店，這個島在夏威夷群島中是最大的島，約大於檀香山所在地歐胡島（OAHU）的

七倍，由檀香山飛行半小時便可到達。飯店佔地之廣，超過五座大型的巨蛋球場，依傍突兀剝脫的火山岩而建，景色絕勝，設備精巧。見其大者如：內含兩處十八洞的高爾夫球場，客房一二四二間，長達一公里滿佈藝術品的迴廊，人工開鑿的運河，還有列車（SWISS TRAIN）遊舫在三座搭房之間行駛，供人遊覽，並可與海豚同游共樂。規模之宏，至為罕見。從管理到維護，處處都需投下大量的人力，員工總數高達一千餘人。我們在此小憩，不僅飽覽周圍的海嶼風光，也可體會科技昌明、經濟繁榮的今日，旅館配合觀光事業的發展，已經進入新的紀元。整體取向的脈動，以專業知識與專業精神為其主導，各司其能，各盡其職，雄踞一方，為旅館事業大放光彩。雖說是科學的，但不像科學只是機械的。那裏從業人員，有具博士學位的，也有憑豐富工作經驗為人所不及的，都無愧以專家稱之。

這個巨無霸飯店，原為日本人以數億美金投資所建，當初不能不欽佩其有眼光、有魄力，充分運用觀光資源，拓此遠景。只因經營不善，輾轉周折始由『和信』以拍賣方式得之，經營的重要，可見於此。

我在夏威夷暢遊之後，心裏頗有所感，觀光不失為現階段新興的事業，但發展必須旅館配合，成功與否，則在人為。人為的先決條件，一為法治，一為專業。放眼亞洲地區，從日本到香港、到新加坡，只要遵守法治，貫徹法治，整個社會必然構成井然有序，呈現新的發展趨向，非惟有裨觀光事業的發展，亦可帶動地方的繁榮。否則，法治蕩然，社會動亂不已，縱使我們有更好、更多的觀光資源，只恐徒托空言，寄希望於空中樓閣。夏威夷這方面的成就，使我們自嘆不如，自慚形穢。我們的

社會，搶案日有所聞，令人驚心動魄，或已早被人視為缺乏安全保障，加以交通秩序混亂，車輛橫衝直撞，行人爭先恐後，更為人所詬病。這是我們必須自我反省與檢討的。

再說專業，使我想起老報人成舍我先生曾說：「讓有錢的人來出錢，讓有經驗的人來辦報」，今日思之，此語確實入木三分，有經驗就是指有專業的知識與能力。有錢固然有助事業的發展，但有錢並不是萬能，有錢便可隨心所欲的觀念，早已為時代潮流所淘汰。夏威夷的巨無霸飯店，如不是集專家們的智慧與力量，便不易到達無美不臻，有口皆碑。所以，不但經營理念需要專家們的真知灼見，就是開拓市場、管理方法，亦無不需要專家們的集思廣益。日本人其始也鉅，不能發揚蹈厲，踵事增華，期以百年之基業，是否即缺少專家指點，足以引人省思。

如以台灣觀光資源而論，似乎並不遜於夏威夷，以墾丁公園、鵝鑾鼻等處為例，先天資源，並未物盡其用，人盡其力。後天建設，盡屬人為，而我們所見的只有那些有礙觀瞻的違章建築與攤販不斷地在破壞天然環境，令人無限惋惜。旅館事業雖有異於觀光事業，但如缺乏足以號召國際夠水準的理想旅社，作為觀光調劑小憩之所，未免美中不足。

我因久居台北市廬，很少遠行，此次夏威夷所作一週之旅，獲益非淺。從旅館事業到觀光事業所得的觀感，始信人間到處是學問，而學問涵蓋之廣之深，亦非個人心力所能兼容。想到杜甫有「轉益多師是汝師」的詩句，轉益多師，這個益與師，今日都得之所見所聞，不僅一己發於內心的啟示，亦為我們服務於社會應有的共識。

(原載八十三年四月三日中國時報)

一樣膚色兩樣情

——由北京到黃山旅途述感

離開中國大陸將近半世紀，自從兩岸開放探親以後，很多親友們都回去看看劫後的家園，也有些團體紛紛來函，盼望我能回去參加他們各種很動聽的研究或聯誼的會議。但我始終未爲所動，在我總認爲這是感慨多於歡樂的長途旅行，如能不去，身心反而獲得休憩與安靜。於是，年復一年，便這樣蹉跎歲月的打消動身的念頭，依然在台北過著自己散淡的日子。

上月神州月色近中秋的時候，在內子華嚴與由美返台的次女文可慇懃與設計下，我卻鼓足勇氣走了一次大陸，事前不告知任何人。目的地只限北京、黃山，縱使自己擁有濃郁的鄉土之愛的福建也沒有去。北京，這個現已恢復了明清舊名而曾有過八百多年建都輝煌紀錄的古城，那裏有淵博的中華文化精英，那裏有璀璨的中國歷史陳蹟，那裡還有數不盡屬於中華民族的遺產，如今雖已物換星移、前不見古人，但我仍不能不去瞻仰一番。看看心裡所懷念的，是否保存無恙，是否也遭受了無情政治的污染。那份蟄伏了數十年的北望中原的潛在情感，雖無所求，總是希望能以現實見證一切。何況古城還有我身受其教的兩位師長，不能不去看看他們的暮年老境。

這兩位師長，一位是現任中國動物學會、鳥類學會兩會的理事長鄭作新

博士，他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相當中研院院士），精研鳥類，早著盛名，至今仍是首屈一指的權威。世界雉類協會中國分會主席，也是他擔任的。今年十一月間台北市舉行的第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已請他率團參加，惜因年老體弱，屆時未知能否蒞會。他是我大學時代的教務長，對我頗多偏愛。一別忽已半世紀，彼此相逢，都難免有歲月催人老的感嘆，他今年已是望九的老人。臉上的皺紋已遮蓋了昔日的光采，雖患有心臟病，還是那麼健談，不但從記憶中找回了當年豁達的氣度，也從他的言談中肯定了老一輩所傳承的中國固有道德的倫理觀念，長者之愛，師生之愛，那麼真誠、那麼親切。

另一位師長是蕭乾先生，他是早已聞名中外的中國散文家、譯著家，也是新聞界老兵，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學術地位很高，為大陸文壇領導人。台灣商務印書館去年曾發行蕭乾選集六冊，寶島文壇對他應該是不陌生的。當他還在燕京大學肄業時，曾任我的初中國文老師。最近幾年，我們互有書信往還。同樣的，憂患歲月在臉上留下了皺紋。我們分別半世紀，欲慰無語，握手歛歔，說不盡心裏的離情別愔。他與夫人文潔若女士，老而彌健，每日二人晨起必散步，活動筋骨後，便進行合譯愛爾蘭詹姆斯名著「尤利西斯」，此書在中國從未全譯，譯畢將由台北時報公司獨家出版。

我與兩位師長促膝夜談，都是離不開「敍舊」兩字，敍舊之外，什麼也不談，從未觸及兩岸現實問題。我已窺見二老的心境，頗似王維自稱「老來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舊是充滿懷念的、情感的、也是充滿傳統固有的道德觀念的。如說這是包袱，我們便不會相見為歡，也不會產

生依依惜別的悵惘。所以，無論世界怎樣的變，時代怎樣的變，仍然改變不了這種中華民族與血液同流的人倫人性之愛。這種愛，便在兩位師長心裏發光，我們希望這點光，能如薪火相傳，代代相傳，傳在新生一代，永不熄滅。

北京這個古城，訪問二老之餘，我們也暢遊了故宮、天安門、天壇、十三陵，八達嶺的長城等多處名勝。我深感中國人值得驕傲，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舉世無匹，光芒萬丈的各種遺產。中外慕名前往北京觀光的人，每日流動人口據說可達一百萬人以上。中共應付這種人潮，為賺取外匯所作的努力，連帶的繁榮市面，整頓環保，安定民生等工作，也不容否認的有其可觀之處。歷史為我們留下了不少可痛可悲的事蹟，如果歷史上沒有戰爭，中國可能早已建設為一個現代化富強的國家，然而，無情的戰爭砲火卻塗改了一切。我們不禁想起國父「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言。救中國，要和平，中共如能崇尚和平，全力投入國家建設，以和平覓取統一途徑，以和平閃耀中華民族的光彩，中國人不是足以傲然挺立於世嗎？

從北京飛往黃山，黃山是歷代多少騷人墨客及畫家所嚮往的名山勝地，中共為使其成為國際聞名的觀光地區，確曾投下了不少的心力。但因黃山的後天條件不如北京，似乎只重表面宣傳，憑藉圖片以自炫而已。如遊客安身的旅社，便不敷使用，黃山山麓附近的居民，困惑於觀光客多財，他們的居處，都成為臨時旅社，雜亂無章，大礙觀瞻。我們登山住入西海大飯店後，入境隨俗，次日遊山，便完全由一年輕的導遊小姐率領，上午攀登三小時，下午原定往返五小時，不料抵達高峰「光明頂」

後，導遊經驗不足，下山不久便暮色四合，迷失方向，後來難以自主的好像掉入了黑夜的陷阱。因為缺乏引路亮光，天黑人倦，十分惶恐。此時卻意外的遇上兩個當地青年，他們表示願意背我下山。他們來路不明，身處此境，實不敢貿然試之。後來發現他們有打火機，費盡口舌，以高出原價二十倍的錢，買來引路，誰知這支打火機已報廢，既燙又不發光。他們不但缺乏同情心，反而在旁嘲笑，嘲笑我們「不花小錢，要花大錢」。那種笑聲，十分令人反感。後來遇上一對迷路的粵籍情侶，原來我們都是西海大飯店的旅客，在他們電筒引路下，我們終於走出了那條黝黑的崎嶇險路。

中共目前雖以大陸山川壯麗炫耀於世，招攬國際遊客前往觀光，但在接待方面，無論軟體的、硬體的，都缺乏周詳的策劃，制度也不健全。尤其國內機場行李過重，索價漫無標準，予人不良印象，這是很值得檢討的。

我在北京訪晤兩位師長，所見都是充滿老人之愛，和祥溫煦，如坐春風；深感中國社會還存在著傳統的愛的一面，並未因時代變遷，便喪失了這份崇高珍貴的愛。然而黃山所遇的青年，似乎走出傳統，出現在另一個世界，他們在嘲笑中彷彿隱含著一股莫名的恨意。文革去今雖遠，遺毒是否仍在青年的身上尚待清理？

（原載八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國時報）

豬年私願

今年是生肖屬豬的豬年，豬生而木訥篤實，不桀黠，不奸詐，愚而耿直，蠢而馴服，自苦其身，全部為人類而奉獻，確有它可愛的一面。豬年，在下特提出幾點私願，就教於高明有識之士：

第一 選情早已塵埃落定，有勝有負，此為競爭無可避免之變數。然至今關心時局者仍對選情觀察入微，反應敏銳，展望今年選立委，明年選總統，好事之徒，如繪劉伯溫的推背圖，神機妙算，盡在寸毫之間，天下盛事，未見如選舉之動人心魄也。於是，高談闊論，百家雜陳，按圖索驥，呼之欲出。但願有志參選諸公能為國家想，非為一己圖。彼美友邦，稱台灣為經濟奇蹟，而民主則為畸型，走過了頭，其然，其不然乎？

第二 民主殿堂，羣賢雲集，揮拳則山岳崩頽，怒吼則風雲變色，已非獨家新聞。炎黃子孫以此雄風有損傳統的美德、嗤之以鼻，見而色赧，如欲再登世界十大新聞的舞台，恐已無望矣。新春在望，但願袞袞諸公此後多費精神於審查法案，少費力量於肢體衝突，澤及萬民，一變國際觀瞻，則幸甚矣。

第三 台北市街頭塞車之苦，早已揚名中外，與民主殿堂揮拳，同為寶島奇觀。君不見選戰方酣之際，復見車陣列隊遊行，浩浩蕩蕩，幾與乾隆皇帝出獵鏡頭，先後爭輝。不僅此也，如遇稍不稱意，大如反核，小

如打架，都可集隊遊行，或請願、或示威，路人側目。但願豬年街頭從此平靜無事，呈現一片祥和之氣。

第四 台灣地區槍殺案、販毒案、搶劫案、走私案，層出不窮，幾已無日無之。作奸犯科之徒，不少竟屬英俊少年，誰無子女，天下為父母者見之，能不同聲一哭。究其病源，無非社會風氣太壞，為功利聲色所害，遂墮萬劫不復之地，但願菁菁少年及早改過遷善，自惜有用之身。

第五 國有老成，但願老成為國謀，世有俊傑，但願俊傑為世用，從此金權自斂，黑道銷聲，共享太平之福。

第六 當此豬年，萬象更新，但願有人像豬的精神，吃的是糟糠廢物，自己却做了美餚原料，捨己為人，其庶幾乎？

(原載八十四年二月六日自立晚報)

選災

災者，禍害也。我們熟聞天災、火災、水災、旱災等災難之名，選災之名，悠悠千載，未之聞也。

選災者，顧名思義，因選舉而產生之災害，選舉為民主政治制度之產物，民主國家奉為金科玉律，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無不由選舉而產生之。巍巍乎其大哉，選舉之擁有力量，雖足以毀滅扶桑三島的原子彈，亦不足以抗衡之。當今之世，談選舉，舉世無不推崇美國為負天下之重望，美國總統之產生決於選舉，可以否決國家大政的參眾兩院議員亦產生於選舉。每當選舉之際，各黨壁壘分明，勢不兩立，拔劍張弩，如臨大敵。一旦勝負揭曉，一切回歸常態，步入正軌，勝者不驕，敗者多能坦然於胸，不存芥蒂。現代國家能否貫徹民主政治制度，其國民有無如此光明磊落的風度，殆可為其試金石。

然而，橘踰淮則為枳，這種合於時代潮流的民主制度，移植寶島後，似乎便變了質，改了型，以致騰笑異邦，引為談資。台灣為有別於大陸共黨專政而實行民主政治的地區，歷年選舉頻繁，群相矚目。目前省市長選舉，雖已塵埃落定，但年底的立委與明春的總統選舉，都將接踵而至。最近從廟堂之上，以至社會每一角落，忽隱忽現，彷彿到處都可以看到為選舉鋪路的足影，到處都可以聽到為選舉密商的私語，其亦選舉文化之謂乎？放眼斯土，是否有志投身選舉，必可驗之背後有無黑手，有之，動作頻頻，或則譁眾取寵，或則指鹿為馬，其所謀者，外則託不

負選民之名，內則求爭取選票之實，其不知能有多少人爲國家利益謀，爲人民福祉謀。過去向以監視政府，有無浪費公帑的民代，今則不顧國庫負擔，只問選票多寡，逞口舌之快，支票滿天飛，處處討好選民，形成選舉掛帥，本末倒置。

我們深慨所見都是負面的，先則槍殺尋仇，戾氣沖天，繼則訴訟日增，法院門庭若市，所耗人力財力的社會成本，難以數計。如此令人頭昏目眩、五花八門的民主社會，究有多少人能爲選舉而喜，謂之選災，不亦宜乎？

(原載八十四年三月二十日自立晚報)

附錄

——二二八建碑碑文

台灣光復後之第三年，不幸發生二二八事件，為台灣之痛史。台灣自清末乙未割讓，受日人殖民統治歷五十年，復經戰火破壞，生民疾苦，一旦重光，其引領以待祖國政府之重建，為民謀福祉者，既殷且切。當時行政長官陳儀雖有心建設台灣，然其措施多未察民情，不解民瘼，疏於宣導，昧於溝通，以致形成隔閡，民怨叢生。於是嚮之希望，皆成失望，終於以抗爭宣洩其不滿之情緒。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台北市延平北路發生查緝私煙誤傷路人事件，遂成反抗導火線。翌日，群眾遊行示威，甚而到處尋人毆辱，秩序大亂，由台北而蔓延全省，幾至不可收拾。三月八日，國軍抵台鎮壓，其間執行多因誤導，被捕判刑或遇害，所在多有，其最令人難抑於情者，則為黨同伐異，任意株連，殃及無辜，沈冤莫辨。世之言此事者，無不引為千古遺恨。解嚴以後，政府為關切受難家屬，化解歷史傷痕，行政院於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成立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復於八十年一月十七日邀集社會公正人士與歷史學者另設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每月集會研討，以學術研究精神，廣羅資料，實地採訪，歷時一年有餘，撰成報告，公諸於世。專案小組並於八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與民間碩宿及受難家屬代表組成二二八建碑委

員會，籌畫建碑紀念，意在貫徹悼念，撫慰、和諧、寬容、公義、光明、團結之願望。建碑地點擇定台北市新公園。八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舉行破土典禮，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落成。設計圖係據海內外應徵作品二百餘件中選用，經費由政府與民間共籌。緬懷穆穆斯民，遠來斯土，生於斯，育於斯，成於斯，卒於斯，或先或後，皆非異路，同舟共濟，豈容相伐。所望後之來者，懍於歷史教訓，懲前毖後，敦睦互勵，其亦有裨後代子孫乎。

附註：本文係應行政院二二八建碑委員會之邀，並經前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委員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李雲漢（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三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賴澤涵（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四位先生共同參預意見所撰之初稿，旋因二二八受難家屬代表對本文內容持不同見解，遂成有碑無文。